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第二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 9.75印张 190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0册

书号 3230·53 定价 1.0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序言	谭震林	(1)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陈丕显	(5)
第一章 转折		(5)
第二章 突围		(17)
第三章 会合		(28)
第四章 新起点		(36)
第五章 北山事件		(44)
第六章 反“清剿”		(56)
第七章 扎根		(72)
第八章 反搜山		(82)
第九章 大发展		(94)
第十章 “两面政权”		(105)
第十一章 梅岭事件		(118)
第十二章 突变		(129)
第十三章 谈判		(139)
第十四章 集中		(150)
第十五章 下山		(157)
后记		(168)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二)		(170)

七、遵义会议前后.....	(170)
八、长征途中.....	(178)
九、从东征到陕北边区政府.....	(187)
十、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193)
十一、在延安军委总部.....	(203)
十二、到东北.....	(211)
十三、在军调部执行小组.....	(216)
十四、在东北军区.....	(222)
十五、开国和回乡.....	(230)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罗 明	(234)
一、所谓“罗明路线”的由来.....	(234)
二、反“罗明路线”的经过及其恶果.....	(252)
三、在福建反“罗明路线”与在江西反邓、毛、 谢、古的关系.....	(258)
四、反对“罗明路线”的实质.....	(260)
五、几点经验教训.....	(268)
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271)
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黎 玉	(277)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序言

谭震林

陈丕显同志写了这篇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录。他要我替这部回忆录说几句话，当作序言。我说什么呢？要说的话是很多的，可是事隔这多年，我的记忆毕竟不如从前了。

但是，我兴味浓厚地读了丕显同志这部回忆录。这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记录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它离开今天都快有半个世纪了。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献，事实上是一部战史，并不仅仅是一部回忆录。写得简明扼要而又很完整，生动活泼之中却十分严肃；它本身就有历史意义，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九三四年中国南部的秋天。

当时，蒋介石集结大量兵力，亲自指挥，并由纳粹德国将领任顾问，以堡垒政策逐步地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逼。而我党领导人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其结果是我红军主力的各个部分都无法发展扩大，也不能转入抗日战争，只能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另行北上抗日。于是，在这种条件下，留下来的南方八省的红军，面对着强大的敌人，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夏天的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一个历史新阶段才出

现。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这部回忆录展示了南方三年战史的来龙去脉，它的发展的全过程，它的重要侧面和事件，写出了历史的具体情况，还形象地再现了许多普通的战士以及英雄人物。他们出入于崇山峻岭之中，茅草密林之间；他们勇敢、机智，洒热血、抛头颅，忠于党，热爱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开辟了一条革命的胜利道路。

在这部回忆录里，有不少篇幅写到陈毅同志的际遇和行动，他的英姿丰采，音容笑貌和许多讲话。陈毅同志的语言是生动的，诙谐而又发人深省，一针见血，极有性格。在陈毅同志留下的诗篇之中，特别有一篇《赣南游击词》，是以形象思维吟唱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战斗生涯的。丕显同志在这部书里，尤其在第六章第八章里，用了许多具体的事迹和生动的范例，为这一篇词作了周密的诠注。这就使读者更能体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何等的艰苦，如何地重要了。

正是红军主力的北上抗日，南方八省的游击战争，加上东北义勇军的浴血抵抗和长城线上的保卫战斗，打响了全国性的抗日枪声，又有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紧密配合，使得蒋介石日夜被抗日烽火所围困，既不能阻止红军主力北上，更无法抑制游击区革命群众的英勇活动，最后不得不参加在全民抗战之中了。

正是南方的游击战争，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并在尔后的三年中，保存和卫护了革命的火种，使它不灭地燃烧，终

成燎原之势。它飘扬起鲜红的旗帜，坚定了人民的信心，在百折不挠的血战中，为我党锻炼了一批骨干，逐步发展而成为伟大的革命武装。正如长征的主力红军是八路军的前身，南方游击队后来成为新四军。

这部回忆录是一千个日日夜夜的活生生的可泣可歌的记录。读者可以看到红军游击队怎样在远离党中央的敌后，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了面临着的一切困难问题，怎样依靠着人民群众的力量，粉碎了装备优良的超过我三五十倍的敌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

丕显同志以赣粤边斗争的亲身经历为主，结合各地游击区同志的回忆素材而写出的这部回忆录，是一部好书。当时，中央指定的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是在这个地区的。党的领导核心机关也就在那里，丕显同志也正好在那里，所以他记述他亲身经历过的斗争是可以代表南方八省游击战争的相当部分的。然而他很少写他自己，而更多地塑造了领导者的形象以及战士和人民的群象。这部书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写的，具有相当的概括力，寓一般于个别之中，能使读者对当时重要的决策如何形成，革命群众如何贯彻执行它们，从而对于三年战争的全局，有所认识。

然而当时各个游击区都有它们自己的一些特点和重点。比如有的地区，是集中兵力向四面八方出击的，在蒋介石的主力达不到的地方，消灭了许多地主武装。这对蒋占区人民是有力的鼓舞，自己虽也受到一些损失，却推进了抗日运动的发展。另一些地区，是属于老区了，是十多

年来的游击区，那里的地主武装和保甲长几乎全部控制在我们手上，我们的行动主要对付蒋介石的主力军，这些主力军的行动总是有弱点的。我们及时掌握了这些弱点，就能不失时机，一个个地消灭敌人的主力。

当年我是和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在一起的。我们始终在闽西和敌人周旋着。虽然各个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给敌人切断了，但我们大家都经受了共同的严峻考验，遭遇是相同的，始终患难与共，是互相支援着的，呼吸相通，同声共气。所以读了这部书，当年的战斗情景又展现在我眼前。我感到有责任将它推荐给读者。

红军的长征用了一年时间，行程两万五千里。南方的游击战争用了三年时间，斗争的艰苦也是无奇不有的。但我们的指战员从不在困难面前低头。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建立革命军队以来一直没有放松过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革命的军队是在革命的实践中考验自己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如此。青年同志读一读这部回忆录吧，这对我们艰苦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将是有益处的。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一日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陈丕显

第一章 转 折

—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赣南，正是秋高气爽、桂子飘香的时节。可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却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红军主力被迫作战略转移。悲壮的气氛弥漫于中央革命根据地。

对于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是在非常匆忙中作出决定的。决定作出之后，既没有向领导干部说明情况，更没有向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作好动员。相反，他们以所谓军事上要保密，强调要等红军主力渡过赣江，进入白区以后，才准许宣布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因此，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何日出动？将去何方？是否很快就会回来？红军主力走了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将怎么办？这些人人深切关心的问题，可谁也不知道。甚至当时身为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同志，也不知道。大家都被闷在鼓里。

陈毅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兴国战役中，坐骨中弹受伤后，就一直住在医院里。他的坐骨碎片如不开刀取出来，伤就难以治好。医院里虽然有爱克斯光机的，却没有电，照不成片子就开不了刀。他住院已一个多月，这问题还解决不了。

十月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来到陈毅的病床前，探望他，并告诉他：红军主力就要走了。中央决定让项英和你们一些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要你留下来是因为你能打仗，懂得军事，可以帮助项英，而且你伤势未愈，不能远征。现在你的伤到底怎么样了？他这样问，才发现陈毅需要拍爱克斯光的片子，但没有电，不能拍。恩来同志立即派人去把电台的一架发电机抬到医院里来。这架已经包装好准备随军长征的爱克斯光机器，被重新解开，马上发电，由医生拍了照片，看清碎骨部位，当场给陈毅做了手术。

就在探望中，周恩来给陈毅讲了中央的决定：

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党的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伯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同志组成，项英同志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司令员，并兼政委，贺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陈毅同志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

十月十日晨，我红军主力的指战员们，眼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告别红色的土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留下的同志们和长征的战友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夹道送别亲人，千叮万嘱，泪洒衣襟。

十月十二日那天，阴霾满空，炮声隆隆，陈毅半躺在病床上，心情异常地焦急。正好项英派来了担架，即刻把他接回机关。项英给他传达了中央的部署，并且和他商讨今后的斗争大计。当时留下来的红军，计有：

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七团、十一团；

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

赣南军区的六团；

闽西军区的三个团；

杨（殷）赣（州）军分区的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团，加上各县独立营；

以上共有武装力量三、四万人。瑞金、会昌、于都、宁都等县的“三角地区”已经划定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持的阵地。他们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

陈毅听了项英的传达，也说了他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

当时蒋介石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主力红军；另以十几万大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

权“死灰复燃”。瞬息之间，黑云压境，敌军群集，大风暴随时可能袭来。可是项英同志认为形势很好，还要继续硬打硬拚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陈毅同志却认为，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现在要赶快部署打游击。项英则把陈毅的清醒估计，说成是他“情绪不好，悲观失望”。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但是对那种不清醒地估计当前形势，不承认反革命力量暂时强大，看不到革命低潮到来的错误认识，才大失所望呢。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当时我只有十九岁，原任闽赣省军政委员会团代表，不久前才回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共青团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不久，又调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当时共青团也称少共）。本来我以为我会跟红军主力走的，没想到领导要我留下来。对项英，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陈毅，我看见过，感到他看问题敏锐，胸怀坦白，说话豪爽，待人诚恳，可亲可敬，很愿意在他们领导下工作。那次是他们第一次商讨，我并没有在场。但是事后得悉，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对形势的估量和斗争的部署，他们是存在着原则的分歧的。

项英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想象中的红军主力大捷上。他说：“红军主力会在湘西或湘黔边连续打几个大胜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敌人将会被吸引到那里去。待红军主力回师，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已失的革命

根据地。”

陈毅提醒他说，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他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留在这里专门对付我们。我们不能依赖红军主力，应当独立自主，作坚持斗争的打算。因此，陈毅提出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他说：“红军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都有病，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

陈毅同志是说得很有道理的。记得一九三五年新年在中央分局驻地，我看到了瞿秋白同志。他身患疾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他正在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嗽着。当时我感到十分怅惘，象他那样的身体，怎能坚持打游击呢？

但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要“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把“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作为部队的中心宣传口号提出来。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他还打算搞军事学校、兵工厂，迷恋于旧的形式，企图再搞起个大的革命根据地。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象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各个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却把地方的许多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将那些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用来充实红军第二十四师，要同敌人打硬仗。他说：“我们有主力第二十四师，再加上七个团，

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陈毅不赞成这种做法，说：“请不要忘记，正是这种死打硬拚的战术，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搞垮的。”他认为过去那一套大规模根据地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全都要收起来，大家背起快枪打游击去，不要让敌人找到目标。

项英不以为然。他是书记、司令员兼政委，重大问题最后必须由他决定，他没有及时采纳陈毅的意见。在这转折的紧要关头，竟然错过了大好的时机。那时，国民党的军队因为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吃过苦头，被我们打怕了，一时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贸然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急进。加上他们对红军主力的转移，曾作过种种判断，担心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北路敌人仍然用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战法，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而南路敌人则已撤回广东。这个时机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完全可以加以利用，实行分散打游击的转变。

这个时机被错过了。特别遗憾的是，项英还按照“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原来的意见，一度把政治军事形势秘密封锁，使干部和群众不晓得面临的局面多么严重。有些同志根据以往的经验，天真地以为红军主力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会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凯旋归来。工农剧社的演员还天天忙着创作、排练，准备演出，庆祝胜利。他们操琴、练歌，唱的是“胜利的号炮”（这是歌词中的一句重句）。那时，我们还参加过工农剧社的晚会，有民歌、独唱、舞蹈和话剧，天下着雨，群众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看演出，真是一派“升平气象”！

二

形势不出陈毅所料，一天天地紧张起来了。

十月二十六日，敌人侵占宁都。

十一月十日，敌人侵占瑞金。

十一月十七日，敌人侵占于都。

十一月二十三日，敌人侵占会昌。

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县城全部陷入敌手。

接着，敌人从北、东、西三方向内紧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方法，将广大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企图将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区“清剿”，进而彻底消灭我们。

敌人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绝灭人性的“清剿”。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坚毅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人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被反动派杀害的人数达七十余万。

那些穷凶极恶、暴戾恣睢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恶霸地主趾高气扬、气焰嚣张地对贫雇农说：“你们红得一世？”贫雇农响亮地回答：“你们白也白一生勿得（意思是也白不了一世）！”他们坚信：“只要穷人不妥协，总有一日见红天。”

这时的项英同志依旧傲视敌人的暂时强大，仍然集中兵力，要和敌人死打硬拚。十一月二十一日，当侵占瑞金之敌向会昌进攻时，项英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

独立营集结在会昌谢坊左侧的湾塘岗，伏击了东路的敌第三师。这一仗虽然歼敌半个旅，但也削弱了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失策的是暴露了自己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的目标，给敌人造成了四面合围的机会。敌人集中了四个师的兵力跟踪红二十四师，使我们陷于更加困难的被动局面之中。

湾塘岗战斗的教训，迫使中央分局进行了新的布置，派出得力干部到各地区去领导斗争。张鼎丞同志回到闽西，钟循仁同志去了闽赣，胡海同志回到东固。另外一部分干部调往地方武装，以加强各地区独立作战的能力。但是转变只是局部的。

不久，南路敌军由广东边境回防赣南，从东、南两面向我“最后坚持阵地”进攻，与北路敌军配合，南北合围，拉网夹击。我二十四师、独立三团和十一团，在狙击战中未能取胜。后在牛岭战斗中，以五个团的兵力去攻打一个团上下的敌军，却被各个击破，遭到惨败，所谓“最后坚持的阵地”也失守了。

十一月底，在中央分局的会议上，陈毅提出了要迅速地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接着，形势更加严重了，项英终于同意陈毅的意见，并要陈毅起草个指示发下去，部署各地转入游击战争。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和贺昌三位同志保持领导，其他成员都分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个游击区。分局和一部分部队，赣南省党政机关和部队，则转移到仁风地区，待请示

中央后再确定行动方针。

陈毅写出了指示。但这时已是年底，许多地区已被敌人隔断，无法联系，指示精神就没有传达下去。

三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大风暴来临了。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和赣南省的机关和部队已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仁风地区，形势非常紧张。战士和群众正在山腰上，在深谷里挖战壕、筑工事，埋藏物资，坚壁清野。

有一天傍晚，我向山腰上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是国民党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到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的话的。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经站在他的身旁，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们能不能赶走它？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真该检查检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袋有问题。

这时，一个久经风霜的老战士老党员黄兴洪说话了，他说：“大炮说的脑袋问题很值得注意。但是，到底谁个的脑袋有问题，需要辨别。我看大炮的决战呵，反攻呵，都是他自己的马列主义，是否也需要检查检查呢？”

唐大炮显然被激怒了，他立即反驳，什么是我的马列主义，什么是你的马列主义？黄兴洪吸一口旱烟回答：讲道理我不行，讲打仗还可以说一点。我们白手起家，创造了根据地，靠的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发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我们声东击西，都是成功经验。现在把各地部队拉到这里来集中，让敌人包围我们。没有游击队牵制敌人，我们这样硬拚行吗？

两人一争，我很受感动。我就说，目前的环境是困难的，你们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我看是要面对现实，才能战胜困难。兴洪同志的意见我以为是对的。唐大炮未免过分乐观了。到底怎样行动，仗怎样打？听候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吧。他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人民中有威望，是群众信得过的领导人。

我回到营地后，那晚上睡得很迟，翻来复去睡不着，我脑袋里也尽是傍晚的争论问题。唐大炮是学生出身，他看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指示，说的话也并不是乱说的。黄兴洪同志是瑞金武阳附近的农民，经过长期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锻炼，他是我们赣南军区直属团的一个连长，他提出部队过分集中的问题，值得深思。那晚上我百感丛生，但我至今还鲜明地记得我是反对唐大炮，赞成黄兴洪的意见的。

第二天清早起来，就听到东南方传来了隆隆炮声，敌人已迫近我们的指挥中心了。我赶到了工农剧社那里去开一个会，因为忘记了开路条，半路还给儿童团的岗哨喊住，受了他们一顿盘查。

会议一开始，由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作报告。我记得他说的是“目前的战争，要求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来一个大转变”。

我真没有想到在一夜之间，局势已急转直下。转折点终于到来了。

我开完会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见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他已派了几个通讯员去找过我了。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一间屋子里，给我传达了党中央头天发给中央分局的两份电报。正是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党中央的声音越过崇山峻岭而来到了。

党中央的一份电报中说：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党中央的另一份电报指示：“反对大兵团作战的方针”；“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等等。

蔡会文同志对我说：中央分局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的电报指示。陈毅同志说了，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英同志已接受了陈毅意见。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将部队分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的具体部署是：

(1)独立红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过封锁线转至闽赣根据地。如有可能再转到博生县(宁都)以北,开展游击战争;

(2)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随陈潭秋、谭震林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同志的队伍会合,坚持闽粤边的游击战争;

(3)由汪金祥同志率红三十四师的四个连,到寻乌南部和焦岭、平远、武平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4)由李天柱、孙发力等同志率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区,向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同志取得联系;

(5)派红二十四师的两个连向于都南挺进,建立于南游击区,并与信(丰)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6)由龚楚(后叛变)、石友生率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约九个连),从南安江、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7)由徐鸣同志率红军独立第三团,到湘赣边传达指示,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

(8)留红军独立第六团在赣南,由蔡会文、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的赣南军区指挥,进行游击战争;

(9)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直接统率红七十团(周建平为团长,杨其为政委),在根据地穿插游击,并与各根据地取得联系,指导工作。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委员陈毅、贺昌同志,随红七十团行动,其余机关工作人员,派到各地和各部队去工作。

最后,蔡会文同志对我望了一望,象征求我意见似

的说：“你跟我一路走，你高兴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危机已经达到了顶点，转折的过程已告完成，最后的突围就开始了。

第二章 突 围

“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重围突破万千重，挥戈直指油山中。”

事隔四十多年了，每当我回忆起我们最后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情景时，当年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同志写的这首激情澎湃的诗，便又在我耳边萦绕回响。

一九三五年二月，装备很好的敌人，数十倍于我，四面麇集，形成坚固的包围圈，步步向我进逼，形势越来越危急。中央革命根据地各路部队，在统一指挥下向外突围。留在仁风山区的最后还有两路兵马：一路是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率领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另一路就是我们赣南省党政军机关率领的独立六团；此外，还有二千多名重伤员。因他们行动不便，势难一同突围，只好进行疏散，择地埋伏。可是，他们斗志旺盛，要动员他们疏散，这工作相当难做。经过研究，项英同志就请陈毅同志去解决这个难题。陈毅同志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又善于做说服工作，而且他本人就是伤员，

由他去动员疏散是最合适的。

陈毅同志拄着拐棍，步履维艰地走到伤员们的住地。大家看到拐步而来的陈毅同志，心里就非常高兴。陈毅同志首先亲切地问候大家，然后心情沉重地向大家讲，中央革命根据地暂时失败了，非转移不可，但中国革命肯定要胜利。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险恶，因此，对伤员要进行疏散、转移，同志们可以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打游击也好，种田也好，待革命形势好转时，欢迎大家重回部队。接着又讲：同志们疏散以后，要特别珍重，我们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万一遇到敌人，要不怕牺牲，不幸而非牺牲不可时，也只能牺牲自己，千万不能叛变。我们牺牲了，只要有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要坚决相信胜利不属于反动派而一定属于人民。伤员们听了，都难以抑制自己的内心激动。有的说：“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留下来。”有的说，“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就有办法对付敌人。”在面临如此严重危险的时候，只有最坚强的战士，才会有这种英雄的气概。

接着，陈毅派人把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请来，把重伤员交给他们，亲切地说：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藏起来，掩护好，治好伤。他们都很年轻，要他们给你们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

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连的，他们听了陈毅出自肺

腑的讲话，纷纷拥上前来，把伤员当作自己的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半天功夫，两千多名重伤员就疏散完了。除对每个伤员发给几块银元和一些药品外，陈毅还给接待伤员的群众每家送去五斤盐。那时敌人封锁很严，盐是很珍贵的。

三月三日午后一点多钟，赣南省军区司令部吹起了紧急集合号。我匆匆地跟着大家奔向司令部对面的一个山坡上。这里有高大的松树，稀疏的毛竹，还有数不清的杂乱的灌木和茶梓，是个天然的林荫地带。在这里听报告，不易被敌机发现，比较安全。

这次到会的人特别多。司令部、政治部、直属团队都到了，还有少先队、儿童团和一些基本群众。

项英、陈毅都讲了话，他们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险恶的，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杀开一条血路，突到敌人包围圈以外去，开展游击战争，争取新的胜利。

我们这最后两路向那里突围？项英、陈毅、贺昌等领导同志曾在一起作过分析。陈毅向大家介绍了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定的突围方向——到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去。那里敌人虽强，但我群众基础也很好。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那里建立的。二十二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里又成立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李乐天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同志任特委副书记，他们带着特委机关和一支游击队，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这时，陈毅深情地望着我们每个人的面孔，从容地说：“红军的干部战士都应该是革命的

英雄。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困难的时候更要当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从困难中锻炼出来的，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

二

三月四日，我们赣南党政军机关率领独立六团这一路突围部队一千八百多人，离开仁风山区开始突围。我也在这一路中间。

突围前，作战经验丰富、机敏勇敢的蔡会文司令员对大家说：这次突围的任务很艰巨。由马岭到观音渡一线的敌人是广东军余汉谋部，在数量上五倍于我，装备很好。他们用堡垒严密控制的地方，正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们要冲过云河、马岭和牛岭这三个主要关口，尤其是牛岭敌人的第三号堡垒，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部队才能通过。

蔡司令员决定：以一部分队伍为先头部队，并指定重机枪连到牛岭就要抢占制高点，以掩护先头部队，拿下敌人第三号堡垒；省军区司令部、省级机关和警卫连，编在队伍中间；另一部分队伍，在后面担任后卫和做收容工作。

接着，蔡司令员把在高虎璠战斗中立功的、光荣连的一班班长余虎同志找来，推着他的胳膊对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说：“啸仙同志，你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体不大好，行军不大方便，我给你多找了一个警卫员。”余虎一个立正敬礼。啸仙同志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三月四日下午，部队刚出发，就遇上了倾盆大雨。我

们在黎板桥吃过晚饭后，没有怎么休息就继续前进。夜里，天空布满了乌云，没有一点星光，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走进了山谷，又翻过了山腰，沿着羊肠小道蜿蜒前进。当走近一个村庄时，突然响起了“啪”、“啪”的枪声，我们先头部队马上向两旁散开，作好战斗准备。后来，侦察班进入村庄搜索，才知道那是一些流氓地痞组成的“靖卫团”，误以为我们是白军，鸣枪以示“欢迎”。

蔡司令员听了侦察班的报告，笑了一笑，说：“在白军进攻时，神神鬼鬼都出来了。好吧，我们来个‘顺手牵羊’，把他们一网打尽。”黄兴洪连长说：“已经解决了。俘虏了二、三十人，还有几支烂枪。请司令员指示如何处理。”蔡司令员说：“为首作恶的从严，胁从的从宽。”

队伍继续前进。

天黑、路滑，山路实在难走。有的同志爬上去又滑下来，但没有叫苦的。队伍到达马岭附近时，已是凌晨三点多钟。稍事休息，吃了点干粮，即进入战斗准备。

东方刚刚露出曙色，战斗就打响了。我们以猛烈的火力压住敌人的堡垒。机关枪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先头部队如龙似虎，猛打猛冲，迅速地越过了牛岭、马岭这两道关口。

但是，当紧跟在他们后面的省党政军机关这一部分队伍越过牛岭时，却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敌人凭借他的优势兵力和堡垒群，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击，弹如雨下。接着，敌人从堡垒后面蜂拥而出，象疯狗似的猛扑过来，把我们的队伍拦腰切断了。

在众寡悬殊的情势下，很多同志倒在血泊中。年轻英俊的蔡司令员，沉着而机智地指挥作战。他命令早已抢占牛岭以东高地的重机枪连，用炽烈的火力从侧背打击敌人，接应后续部队前进；命令狙击班从西面斜刺里插向敌人的第三号堡垒，坚决把它摧毁。

出发前调到狙击班的唐大炮和战士们，匍匐前进，登上山坡，趁敌人寻找目标的间隙，紧冲十来步，迅速接近堡垒。唐大炮把绑在一起的两颗手榴弹塞进了三号堡垒。随着轰隆一声，三号堡垒就哑然无声了。

“这下干得够本啦！起码五十个。”唐大炮手里拿着一挺快慢机枪，朝着溃退的敌人大声地说。

他的话音刚落，“嗖！”的一声枪响，我们英勇的唐大炮应声倒下了！

悲恸呵！唐大炮牺牲了。狙击班班长拿过唐大炮遗留下来的武器，向反扑过来的敌人一阵猛扫。这个突然的反击，顿时使堡垒前敌尸累累。敌人这时已感到侧面的严重威胁，就用机关枪、步枪向三号堡垒的缺口密集射击，子弹象飞蝗一样，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我跟着蔡司令员，时而匍匐，时而前进。突然，他举起手臂，往西一挥，发出命令：“朝这个方向冲，猛冲！”黄兴洪连长和警卫班的战士们照着蔡司令员指挥的方向，拚死杀开一条血路，占领了东面的高地；然后用机枪、步枪组成的火力，接应后续部队突围。

正在这个时候，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不幸负伤了。他个子魁伟，本来目标就不小，加上骑着一匹白

马，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先是他骑的马负伤，他迅速地跳下来，带着同志们向敌人猛烈扫射，一鼓作气冲过了第一号堡垒和第三号堡垒。当他们冲出山坳到达信丰的唐村时，不幸，他的左腿被一颗流弹击中，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这时，他的警卫员准备架着他走。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的手搭上自己的肩膀，警卫员便中弹倒下了。刘伯坚就向蜂拥而来的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光了，他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黄昏，枪声渐渐稀落。经过一天的激战和急行军，马岭和牛岭已经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天黑了，雨还在下。象头天晚上一样，没有一点星光，找不到任何可以辨别方向的天然目标。蔡司令员凭着风雨刮来的方向，看着指北针上微弱的荧光，来确定前进的路线。我紧紧跟在蔡会文同志的后面，幸亏他个子高，依稀看得见他的身影。我就跟着他的身影前进。羊肠小道上满是泥浆、断树、草丛和石块，战士们一路跌跌爬爬地向前走去。天色将明，部队来到一座密林里，蔡司令员命令停下来休息，布置警卫班在山上警戒，侦察班下山侦察。这时，大家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顿时感到饥肠辘辘，寒气砭骨。经过一天激战，又走了一夜的路，无力的双眼，不时地自动瞌下来。大家随便吃了点干粮，就地铺一层松毛作床，弄一块石头作枕，倒头便睡了。

天亮了，侦察班和跟随阮啸仙同志的警卫员余虎，从山间小径飞奔而上。余虎见到蔡司令员，抽噎着断断续续地说：“报告司令员，我们首长牺牲了。”他的两眼深陷，

满脸血污，泪和着血滚滚而下。

蔡司令员听了一惊，跨前几步，紧握余虎的手，忍着悲痛说：“什么？快说！”

“首长长期带病，身体本来虚弱，连日急行军，十分劳累。当他走近牛岭时，气喘病又发作了，不得不停了下来。战斗开始时，首长带病指挥，鼓励战士们奋勇作战。忽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胸口。他喘着气，高呼‘为革命战斗到底！’倒下了。我摸摸他的脉搏已经停止跳动，地上流着一大滩血……。”

蔡司令员望着远方，脸色阴沉。他轻声地说：“圣地埋忠骨，浩气贯长虹，阮啸仙同志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同我们永别了。让他们留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吧！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阮啸仙同志是在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的，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政治教员。他参与领导了广东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他先后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委任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他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地为党工作，以至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经过几天几夜的战斗，我们这支一千八百多人的队伍被打散，只剩下八十多人了。我对蔡司令员说：“你这个司令员，变成个连长了。”他用坚毅的眼光望着我，笑了笑。

我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夜行晓宿，行进在桃江之畔的丛山中。这一带是白区和游击区的交界地，到处有

反动地主的堡垒；“靖卫团”在前面拦路，强敌在后面跟踪追击。敌人在盲目搜山，乱放冷枪，为自己壮胆。入夜，地主武装的岗哨活动起来，庄庄火把通明，处处鸣锣呐喊，有时还放上一阵土炮。蔡司令员指挥部队避实就虚，翻山越岭，朝西南方向前进。夜深了，我们继续不停地走着。饥饿疲乏，又是黑里摸路。我的双腿再也撑不住了。忽然脚尖好象碰到了什么东西，摔了一跤，倒清醒了不少。忍痛爬起来，强使双腿不断向前移动。大家都很疲乏，往往走在后面的同志撞了前面同志的脊梁，只觉得脑袋里“咕咚”一响，猛然醒来，才晓得自己还在走路。

天将破晓，远处传来鸡鸣。我们从山径陡坡走下平地，浑身觉得轻松得多了。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离这里不远就是桃江了。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挠红军渡江，把渡船都破坏了。我们找到当地的老表们，他们说：“我们这里过去红军常来常去。前些时候，地主豪绅回来，说是红军被消灭了。这就没有天理了，我们就是不信。果然你们红军回来了。”

在老表们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几只渡船。大家高兴极了，饥饿、疲乏、瞌睡，一古脑儿飞散了。

黎明，我们在王母渡顺利地渡过了桃江。一过江，就是赣粤边游击区的边缘了。蔡司令员展望桃江两岸，仰首高咏：

三月渡桃江，
江水滔滔不绝。
休道人饥马乏，

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

破贼围千叠。

指顾油山在望，

喜遂风云合!

部队在挨近赣信公路的一个小山包里停下来休息。经过几天的连续行军作战，战士们疲劳不堪，往地上一倒，就睡得“鼾声起，梦儿迨”了。

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抬头望见蔡司令员在屋场外挺直身子踱来踱去，频频向四处探望。啊！他不顾疲劳，亲自负起警戒任务呢！

我悄悄地走到他面前，低声地说：“你也应该休息一下了！”

“阿丕同志，我们可找到了大龙区委。余虎已经出去联系了！”他面露喜色，好象根本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只管告诉我这个使人振奋的消息。

过了片刻，余虎引来大龙区委负责同志，蔡司令员和我会见了。他指点着山影对我们说：“那些高高的山峰就是我们英雄的游击根据地油山！只要两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油山的中心区了！”

油山，梦寐以求的油山，在那蜿蜒不尽的梅岭山脉中，已经隐约可见了。大伙儿的眼角上挂着喜悦的泪珠，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大龙区委负责同志还亲切地说：“这里是游击区边缘，

有我们的群众，他们已给你们弄来一些吃的东西。”

果然，不一会工夫，我们吃上了群众送来的米饭、稀饭、山芋，大家已经挨了几天饿，吃起来感到格外香甜。

刚吃罢饭，区委负责同志又送来了十几包香烟，笑嘻嘻地说：“我知道大家很需要这个东西，是托人往大庄里弄来的，可惜只弄到这一些。”

“好极了！你真想得周到啊！”

战士们分吸了香烟，精神一振，轻声地说笑，沉浸在一片欢乐中。

经过一夜休整，黎明时部队继续行军。越过赣信公路，进入了长安区。沿途都有交通员和群众带路。逢山爬山，遇水涉水，夜行晓宿，向着赣粤边的中心地区行进。途中，蔡司令员口占《突围行军纪事》一首：

料峭春寒浓，
强敌跟踪，
夜行山谷月朦胧，
林密坑深惊敌胆，
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
士气豪雄，
餐风饮露志若虹，
倦卧茅丛石作枕，
若醉春风。

第三章 会 合

又是艰苦的长行军。一天下午，我们终于到达油山，与原来坚持在油山战斗的同志们会合了。虽然大家满身是战火的烟尘，但是眉宇间依然闪现着坚定的、胜利的光辉。油山的同志们抢上前来替我们背东西，一边走，一边问长问短。许多同志的眼角里挂着晶莹的泪花。附近的群众，也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拥上前来，热烈地欢迎我们。

在苍茫的暮色中，部队来到一座密密的丛林里。赣粤边特委机关就设在松竹掩映的几间房子里。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少共特委书记刘新潮等同志，都在特委机关附近热烈地欢迎我们。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特委机关还见到了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见到了曾纪才同志。我们紧紧地握手，互相拍着对方肩膀，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离开仁风山区的这些天来，我们一直为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的安全担心，谁知他们却先我们到达油山，悬在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我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诉说，可是由于过分激动，嗓子里象是被什么东西哽着，一时又说不出话来。项英、陈毅同志对我们表示亲切的慰问，陈毅同志还豪迈地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們消灭在仁风山区了！嘿，我们却在油山上说话啦！”大家都为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房子里充满着胜

利的喜悦。

二

这时我们才知道项英、陈毅等同志的突围情况。他们和贺昌同志以及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带领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是在我们赣南省这一路突围之后，不久就离开仁风山区的。

他们突围前，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情况非常危急。但是，项英、陈毅同志仍决定先发个电报向党中央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部队分路突围的部署。

三月四日下午一点钟，最后突围的部队集合起来了。但直到三点钟，电台的呼号还没有叫通。报务员急得汗水淋漓。贺昌同志很着急，带着两个营先走了。出发不久，就遭到敌人的伏击，部队被打散了。后来，贺昌同志转移到会昌的石含村，把打散的部队收拢起来，他对大家说：“现在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干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心的时候，是考验对党对人民的忠心的时候。每个同志都要不避艰险，冲出重围去！”

刚收拢来的部队，奋勇地渡过了会昌河。可是，他们一上岸，就被埋伏在岸边的敌人包围了。部队打了很久，还是打不出去，最后又被打散了，贺昌同志身负重伤。这时，敌人逐渐逼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同志高呼“红军万岁”的口号，用他枪膛里剩下的最后的一颗子弹，举枪射向自己，显示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贺昌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曾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中共中

央北方局书记。党的五届和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局委员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政治部主任。牺牲时，仅二十九岁。

电键哒哒地响着，时间一分一秒地在移动，天渐渐地阴下来了。项英、陈毅同志一直守在电台旁边，守到下午四点多钟，电台的呼号还没有叫通。仁风山下响着敌人的枪声，部队焦急地等待着。

下午五点钟，电台突然发出强劲的呼号，电台终于叫通了！电键紧张地跳动，把突围的部署报告了党中央，同时收到了中央的回电。可惜，由于密码换了，电码翻译不出来，还是不知道中央回电的内容。于是，项英、陈毅同志命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此，便同中央断了联系。

晚上，项英和陈毅同志带着一个营出发。刚起步便遇上倾盆大雨。天黑、路滑，走几步，跌一跤；走了两个钟头，一问，才走了五里路。

好容易下了山，走到一个庄子前面，便和敌人遭遇了。三百多人的队伍被打散，项英、陈毅同志也被分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会合在一起，部队也集合到二百多人。他们就东奔西走，和敌人绕圈子。到了晚上，又和敌人碰上了；部队再次被打散。这时，有个家伙叛变了，敌人把他的口供印成传单，用飞机散发。传单上说，项英眼睛近视，夜里不能走路；陈毅腿受重伤，不能行走。要是抓到他们，赏洋五万元。

三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轻部队压力，缩小行动目标，部队决定由另外几位同志指挥。项英和陈毅同志则带着少数警卫战士，另行突围。

项英、陈毅等同志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准备在山下暂作隐蔽。这时无意中碰见一个人。他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棍子，头戴一顶破钢盔。他沿途拿着这个钢盔煮饭，所以钢盔外面有烟灰。他见到陈毅同志，一把抓住，叫声“首长啊，首长！”便放声大哭起来。他就是曾纪才同志。一九二九年陈毅同志在赣粤边组建红二十二军时，他是赣粤边牛颈区区委书记。当时，他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参军，带动许多青壮年也来参军。红二十二军开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他又被调回地方，担任当时新建的代英县的县委书记。

陈毅同志紧紧地握着曾纪才同志的手，亲切地安慰他，劝他不要哭，问他怎么到仁风山区来的，他说：“我在代英县当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了我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把我的职务也撤了，罚我到红军里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为担架队长。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叫我押一批土豪劣绅送往外地，走到半路，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土豪劣绅跑了一半。这一来可糟了，更加证明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了。红军主力走后，地方上不要我，给我一张写明是个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看了都不肯收留。

这里推，那里推，眼看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了。”

“为什么不回家乡去？”陈毅同志问。

“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怎么办？家乡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害了，房子也叫反动派烧了。我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什么去处？”曾纪才激动地讲了他的遭遇，接着说：“听说红军主力走了，老首长留下没有走，我想找到老首长也许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县城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长退到仁风山来了。我拿着这个钢盔，一路讨饭，讨到了饭，就用钢盔热一热吃。平时就把钢盔戴在头上遮风雨。现在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总算找到老首长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

陈毅同志怀着战友的情谊，劝慰他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了，将来会总结经验教训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也就不用计较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打游击好了。”

曾纪才同志的眼睛里流露出朴实和热诚的光辉，感情深沉地说：“革命中发生的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失去了，很惨痛，我来算这个帐不应该。要挽救失败，希望将来重新做个结论。”

陈毅同志爱抚地望着这个为革命任劳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亲切地说：“那当然，我虽不能代表党中央，但我将来可以向中央讲，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项英、陈毅同志把他们的突围计划告诉了他，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

他说：“路我熟哇。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

偷渡。我有把握。”

当天夜里，项英、陈毅等同志便由曾纪才同志带领，从仁风山区向油山转移。

这时候，仁风山区到处是敌人。他们便钻进大山里躲藏起来。在山上，他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的喊叫声，只有落雨的时候才清静一点。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山上躲了一天。等到敌人收缩时，才趁机下山，混在一群挑担赶墟的老百姓里面，偷偷地渡过了桃江，到了王母渡。这里离曾纪才同志的家乡很近，他想回家去摸点情况。项英、陈毅同志问他，你家里的人不是被国民党杀害了吗？他说：剩下个老丈母娘还在。他们都认为他应当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并愿意和他一道去。这天夜里，他们几个人从隐蔽的地点摸黑走了十来里路，来到她的家门口。曾纪才上前敲门，说他从河东那边来，谁知敲了半天，她始终不答理。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留话说，希望她看在已经牺牲的女儿的面上，明天早上能到他们隐蔽的地点见见面。

第二天天麻麻亮，曾纪才的丈母娘提着个竹篮，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寻到他们隐蔽的地点来。曾纪才见她身后没有什么人跟着，就出来和她招呼。她见到自己的女婿，就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告诉他：自从红军主力走了以后，国民党常常冒充回来的红军，半夜敲老百姓的门，谁要是开了门，全家就遭殃。她说，昨晚虽听出是你的声音，但是生怕上当受骗，几次想开门，终又忍住了。曾纪才引她和项英、陈毅见了面。见面时，她劝他们白天不要

出来，晚上可到她家里来休息。说罢，她把竹篮里的饭留下来，便悄悄地回去了。

当天夜里，他们摸到她的家里，吃了顿饱饭，从她那里得知长安墟有个木匠是地下党员，还靠得住。他们一口气走了八十里路，找到那个木匠，通过他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他们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历尽艰苦，几经辗转，终于胜利到达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此后，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项英、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了赣粤边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油山便成了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中心区域。

陈毅同志到达油山后，几次对我说：“这次行动，多亏了曾纪才。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左’倾冒险主义在肃反上搞左的一套，把他搞错了，但他对党从不抱怨。”

四

当我们在油山同项英、陈毅等同志会合的时候，胜利的喜悦同沉痛的心情是交织在一起的。谁也不会忘记，我们赣南省这一路突围部队，出发时有一千八百多人，到达大龙时，只剩下八十多人！以后，陆续来到油山会合，总共才三百多人，而大部分同志被打散了，或者壮烈地牺牲了。大家对牺牲的同志，无不表示深切的悼念，特别是阮啸仙、贺昌两位领导同志的牺牲，更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陈毅同志满怀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写了首《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

环顾同志中，
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
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
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
独我得生全。

在我们到达油山后不久，又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刘伯坚同志牺牲了。原来，他在突围途中，因伤重被俘，他抱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决心，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国民党就把他解往大余。先解到粤军第一军军部，关押在大余县监狱里，后来又把他转移到伪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移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镇静自若，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他留下了气吞山河的《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这首用生命写成的诗，是从心底里喷涌出来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在壮丽斗争中的慷慨高歌，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的钢铁誓言！今天我们展诵其诗，如见其人。他那矢志共产主义事业的情怀，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三月二十一日，刘伯坚同志在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年四十岁。他在就义前，写给亲友的遗书中，把自己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他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而自豪，他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民族能得到解放”，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

刘伯坚同志于一九一九年在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联学习。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党派他任冯玉祥先生领导的西北军总政治部部长，为北伐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在策划宁都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后人诗赞他：“西北军中驰令誉，红军帐里足良猷。百战何尝计苦乐，劳生为解万民忧。”

第四章 新起点

一

油山地处赣粤两省边界。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

那高插入云的峰峦，挺立着参天的古树，漫山是青翠的竹林，齐腰深的茅草。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早在一九二五年，这个地区就有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六年冬和一九二七年春，南康、信丰、赣县、上犹、崇义、龙南和南雄等县，先后建立了工会和农民协会。“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一部分部队经过这里，给群众留下了部分枪支弹药。到了一九二八年，这些县先后建立了工农红色政权，扩大了革命武装，其中的红二十六纵队后来就成为陈毅同志组建的红二十二军的一部分。

一九三〇年三月，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同志率红四军转战到这里。毛泽东同志在大余县第十四中学召开会议，进一步推动了赣粤边区的革命斗争。

年年征战，岁岁烽烟，直至一九三一年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赣粤边区就成了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屏障。到长征开始时，这里也给予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以有力的支援。

而当我们突围部队到达油山之后，它便成为敌人瞩目的中心了。

在军事上，敌人以超过我们三、四倍的兵力，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包围和封锁。在政治上，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整顿保甲制度，实行“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保连坐法，张贴“凡通‘匪’、济‘匪’、窝‘匪’者，一律格杀勿论”的反动布告，妄图切断

群众与游击队的血肉联系。在经济上，他们控制墟场集市，采取各种限制买卖的措施，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里。

因此，敌情严重，环境恶劣，斗争残酷。但是，在敌人的内部，也不是无隙可乘的。广东军阀、驻赣绥靖司令部的司令官余汉谋，想利用“剿共”之机，把赣南变成他的势力范围，而蒋介石既想利用他“剿共”，又暗中防备他再向北扩充势力，因此，余与蒋介石之间，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间，矛盾重重，经常发生摩擦。我们就在这几种敌人势力的接合处的缝隙间，利用矛盾，穿来穿去，神出鬼没，开展活动。我们在油山地区先后开辟了五个游击区：

油山区——位于江西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处。这里山岭连绵，形势险峻。山谷里散布着小村庄和水稻田，世代居住着劳动人民，这是赣粤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北山区——在南雄西北帽子峰的周围。这里有很大的原始森林，走上几天都看不见天；

信丰、南康、赣县区——中心在大龙，大部分为丘陵地带，人口相当稠密；

南山区——在龙南、全南、信丰和南雄交界处；

上犹、崇义区——在赣粤湘三省交界处，大部分是森林地带。

我们这五个游击区，既远离长征的红军主力，又跟南方八省的其他游击区完全隔断，就象大海里的几个“岛屿”一样。

二

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流毒尚未肃清，在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着死打硬拚的盲动主义情绪。突出的是原信康赣雄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后叛变），曾经以极左的面孔，别有用心地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了，我们在山里打埋伏是可耻的，不如拚掉几个算几个。”这种主张实际上是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早在我们上油山之前，他曾经不顾实际，坚持正规红军大部队活动的方式，把军分区的部队，摆开了队伍，吹号集合，点名出发，要和敌人硬碰硬。结果，大队人马一行动，很快就引起敌人的注意，马上派重兵来“剿”，搞得游击队天天转移，很被动。

当时，也有的同志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存在着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主张消极打埋伏，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坐等新形势的到来。他们说：“红军主力不派队伍回来，我们就不能和敌人作战，作战就要失败。”

当革命处在低潮的时候，出现这种悲观失望情绪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一些同志的心目中，这次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失败，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失败，把一个好端端的苏维埃共和国葬送了。希望在于长征的红军主力。可是，自从红军主力离开遵义以后，现在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一点消息也得不到。游击队困顿空山，人少地薄，能否坚持下去？坚持下去究竟有没有

前途？

记得当时国民党报纸称陈毅同志为“陈毅股匪”。有的同志就问：“‘陈毅股’是谁？”陈毅同志答：“那就是我。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过了几天，国民党报纸又改称为“陈毅散匪”。那个同志又问：“‘陈毅散’又是谁？”陈毅同志答：“还是我。”那个同志奇怪地说：“你怎么改名字了？”陈毅同志笑笑说：“‘股’的资格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标小，少麻烦。”

三

一九三五年四月，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刘新潮同志和我，带着侦察排，从油山转移到北山。不久，又在油山脚下的长岭，召开了一次军政干部全体会议。陈毅同志针对指战员中的悲观失望情绪指出，红军主力转移，我们突围到油山，这是革命的低潮，暂时的退却。但是，“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因为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攻华北，他们占领了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斗，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的。”

陈毅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给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描绘了一幅光辉灿烂的前景。他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只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现在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十个人的队伍，几十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个人的队

伍，几百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和发展了，与北方的红军主力配合，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就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他还风趣地说：“现在我们还不能下山，总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但他也提醒我们：“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的。”

陈毅同志也反对盲动主义情绪，不赞成同敌人死打硬拚。他说：“如果跟敌人硬拚，拚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并强调说：“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陈毅同志还提出了迅速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作风的问题，并且针对一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的同志习惯于正规的一套做法，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等情况，陈毅同志提出了虚心向本地同志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本地同志向外来同志学习。他说：“两方面的同志各有长短，要加强团结，交流经验，互相取长补短。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一方面要

防止脱离政治的倾向，加强政策学习，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转变老一套的作风，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迅速适应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胜利。”

项英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央革命根据地虽被失掉，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悲观情绪是错误的。”他还针对指战员中存在的游击主义倾向，强调说：“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策。”

项英、陈毅同志的讲话，象是拨开了油山的云雾，使我们在众说纷纭之中看清了光明的前途。我们看到了全国革命斗争的风云，感到心胸开阔，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也大大加强了。

长岭会议一致通过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并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面，设立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三南等县委；县委以下根据实际情况，成立区委、工委和支部。少共组织，也按党的系统逐步建立起来。

长岭会议的工作方针是在反对盲动主义和反对悲观失望情绪的基础上制订的，在贯彻执行中间继续遇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阻力也并不奇怪。记得有一天晚上，项英、陈毅同志在一间老百姓的堂屋里，召开了军事干部会议，到会的二十多个同志在一盏微弱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听着

陈毅同志的发言。陈毅同志根据长岭会议的方针提出了调整部署，分散打游击的意见。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讲完，那个以极“左”面孔出现的向湘林霍地站了起来，说他不赞成把军事力量分散，并再次搬出他那套“拚掉几个算几个”的主张，重唱“现在革命不是低潮”的老调，还说什么“红军主力马上就会打回来，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然而，这套货色很少有人赏识了。大家纷纷说：“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又是集中，又是正规，算了吧，我们吃够了这个苦！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按照我们会议的方针办。”向湘林只好把他那套货色收起来。

长岭会议作了分兵的部署：

由蔡会文同志率两个大队，到崇义、大余边境，向湘东南的汝城、桂东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红七十一团和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其中一个大队到崇义的文英、古亭一带建立游击区，使北山与蔡会文部联成一片；另一个大队到红石寨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由黄成则（队长）、张日清（政委）同志率一部分队伍，向三南（全南、龙南、定南）发展，同时加强大龙地区的工作；还在油山地区留下部分队伍。

项英、陈毅则坐镇北山，直接领导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开展游击战争。我留下来，随他们一起活动。从此，我就同患难与共的蔡会文司令员及由他率领的部队分开了。

长岭会议确定的工作方针和措施，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具体运用。长岭会议成了我们的新起点。

第五章 北山事件

长岭会议以后，鉴于油山地区情况紧张，我指挥机关转移到北山地区，设在那云雾缭绕，高不见顶，莽莽苍苍，遮天蔽日的帽子峰一带。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加紧军事“清剿”；另一方面，利用叛徒进行破坏。“北山事件”，就是敌人利用叛徒龚楚破坏我指挥机关的一个大阴谋。

龚楚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的参谋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奉命带领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从于都南方突围，经南康、油山、大余、北山等地，到达粤北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后，就可耻地叛变了革命，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他在叛变投敌时，亲手打死了与他一同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出重围的七十一团政委，作为他向敌人卖身投靠的见面礼。为了邀功，他又向敌人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他的这种卑劣行径，果然得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赏识，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拥有三十来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来破坏我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龚楚把他那支卫队伪装为“红军游击队”，顺着他原走过的路来到北山的天井洞。他们在那里转了两天，不见红军游击队的踪影，也不晓得我指挥

机关的所在地。

正在这个时候，余汉谋派了由土匪周文山率领的一支百十人的反革命武装，朝天井洞方向窜来。龚楚当即命令他的“游击队”煞有介事地进行“迎击”。他们乒乒乓乓假打一阵，演了一场“自打自”的丑剧后，那些土匪武装很快就被“赶跑”了。

龚楚以此为资本，到处吹嘘这支被他们“击溃”的军队，是余汉谋手下由周文山率领的精锐部队。

当时，在天井洞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并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加上龚楚又扮演了这出假戏，就误认为他是与周文山匪帮英勇作战的“兄弟游击队”。驻在天井洞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同志、驻在天井洞对面山上的游击队长兼政委贺敏学同志、游击小队长“猛张飞”，以及我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发生了接触。龚楚乘机大吹大擂他们在湘南扩大游击区的“战绩”，声称他这次回来，是为了接项英、陈毅同志过去，加强对湘南游击区的领导。大家感到龚楚的这支游击队，作战勇敢，值得学习；可是，见他们服装很整齐，除少数长枪外，全是一色快枪和驳壳枪，讲的一口广东话，又产生了疑窦。龚楚见此情景乃决意迅速动作，以先下手为强，决定以开会为名，把游击队集中起来“一网打尽”。

龚楚通过何长林，擅自发了一个要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参加会议的通知。一些游击队干部接到通知后，就陆续来到天井洞。贺敏学同志问龚楚：“会场的警戒布置了吗？”龚楚点点头。原来他早已派武装把会场包围起

来了。当贺敏学同志进入“会场”时，见四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感到味道不对。他转身要走，不料四支驳壳枪已对准了他。他猛力推倒敌人，奋身逃跑，身中三弹，滚下山岗。

在会场里，龚楚撕下画皮，大放厥词，说什么当共产党游击队没有出路，劝大家投降。同志们听了，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都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朝外冲。但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打也打不出去，许多同志当场牺牲了。只有“猛张飞”等六、七位同志带伤冲出会场，逃离虎口。他们强忍着伤痛往山林里跑，跑不动了，歇一歇又走，走不动了，歇一歇又爬。伤口的血在流，身体又饥又乏，但是他们仍以无比顽强的革命意志，极其艰难地朝着我指挥机关驻地方向爬行。爬了两天两夜，当他们几乎要昏厥过去的时候，被我交通站的同志救了起来。他们报告了天井洞发生的变故。

何长林没有逃出会场，而被逮住了。龚楚狞笑着对他说：“我是国民党剿共司令，你把项英、陈毅住的地方讲出来就不杀你，还可以给你官做。”何长林经不起威胁利诱，也可耻地跟着龚楚叛变了。

按照秘密工作原则，我游击队各个单位之间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因此，对项英、陈毅等同志的住处，何长林也只大体知道个方向，并不知道具体住在什么地方。但是，他马上向龚楚献计说：“我知道他们给养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的大梅坑买米。只要我们能在途中把他们截住，就可以想办法逮到项英和陈毅。”龚楚翘起大拇指说：

“好，你很忠实。只要抓到项英和陈毅，你就立了大功。”于是，何长林就把他们带到我侦察班出来买米时必经的岔路口守候。

我指挥机关侦察排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出身，革命立场坚定，作战机智勇敢。指挥机关的侦察、警卫、买米和采购物资，都由他们一肩担任。他们经常会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偷越敌人的封锁线，避开敌人的盘查哨，从山外买到粮食，运回北山帽子峰。

这天下午，侦察班的吴小华、丁上淮等五位同志在从大梅坑买米回来的途中，遇见了龚楚和何长林。

“你是哪个部分的？”在相距几十步远的地方，吴小华同志机警地问。

何长林已从问话中听出是吴小华同志的口音，却假意问：“你是吴小华同志吗？”

“是我。”吴小华同志答。

“你们辛苦了，又去买米啦！”

“是啊！何主任辛苦了。”

在这一问一答中，双方已慢慢地走近来。这时，何长林身后忽然闪出两个家伙，上前一把握住吴小华的衣领；另一个家伙也跳出来去抓丁上淮同志。丁趁势将肩上挑的米往敌人身上一甩，米倒了一地，扁担打掉了那家伙伸出来的手枪，立即飞身滚下山去。跟在丁后面的我侦察班三位同志，也急忙撂下米担，滚下山去。那个家伙朝着他们打了一阵子乱枪。

他们抓住了吴小华同志，把他佩带的手枪下掉了，还

把他身上的纸烟也给搜走。吴小华同志愤愤地骂道：“你们是反动派！是土匪！”

龚楚、何长林听了，不但没有动火，反而假惺惺地把撒在地上的米，一把一把地捧了起来，说：“白花花的米倒在地上，太可惜了。米珠薪桂，你们出去搞米多不易啊！”

何长林与龚楚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后，对吴小华同志说：“龚参谋长是刚从湘南根据地来的。”这时，龚楚带的那支卫队，已站出来跟在他的后面，何长林指着那支卫队说：“这些同志也是跟着龚参谋长从湘南来的。他们见到你戴的斗笠上写着‘铲共团’的字样，以为你们是敌人，就来抓你们，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原来，吴小华同志戴的那顶斗笠，是不久以前从“铲共团”手里缴获的，斗笠上“铲共团”那几个字，一时还没有来得及销去。

吴小华同志见这些部队的衣服很新，早就怀疑他们，内心里在盘算着怎样对付他们，便说：“既然是误会，那就把枪还给我。”龚楚吱吱唔唔地应付了几句。

何长林接过嘴说：“龚参谋长有重要事情向周同志和刘同志（当时项英同志化名老周，陈毅同志化名为老刘）汇报，请你给他带路。”

吴小华同志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你是侦察班长，怎会不知道呢？”两个叛徒收敛了奸笑，反问道。

这时，吴小华同志感到要脱身已很困难，好在丁上淮等四位同志已经脱离虎口。不如暂时应付一下，再寻脱身

之计。

于是，吴小华同志在前面走，两个叛徒和他们的卫队在后面跟着。距我指挥机关驻地只有两三里路了。吴小华同志站着不愿再往前走。何长林、龚楚问是什么缘故，他说：“我是侦察员，我的枪被你们收走了，空着手回去，怎好向首长交待呢？”

龚楚当即让他身边的一个家伙，把一支驳壳枪送给吴小华同志，吴接过一看，见里面压满了子弹，而且是支新枪，心中暗暗高兴。于是继续朝前走。

“司令部好多人哪，武器多不多啊！”龚楚边走边陪着笑脸探问道。

吴小华同志意识到这是在向他探听虚实，心想：山上担任警卫和侦察的同志，不过八、九个人，首长们都在山上，要是照实说了，岂不是暴露了秘密？不如将计就计，吓唬吓唬他们。于是，吴小华同志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司令部的人不多，总共才二十多人，但每人都有一支驳壳枪，百十发子弹。不过，前天下午，从河东那边开来了一支游击队，约有三百来人，有四十几支驳壳枪，三挺机枪，其余都是步枪。这三挺机枪架在司令部右边的山坳里，其余的人都驻在司令部附近。”

敌人听了吓了一跳。有几个马上把子弹推上膛，准备战斗。吴小华同志借机说：“快到家了，怎么还把子弹推上膛？”龚楚吆喝那几个家伙把子弹退了出来，并要吴小华同志带着他们继续朝前走。

当他们接近我指挥部的岗哨时，吴小华同志对龚楚

说：“龚参谋长，请你们暂时停在这里，等我先去告诉哨兵。人去多了，会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起来不好。”

“有你在，怕什么？”何长林说。

“有我在，也不顶事。司令部有命令：凡接近岗哨，不得超过三个人，否则，哨兵就可以开枪。”吴小华同志答。

龚楚听了非常恼火，但又不得不照着做。他命令他的卫队停止前进，只派了他的两个心腹，跟着吴小华同志前进。

当吴小华同志接近岗哨时，他想尽各种办法示意哨兵：跟来的不是好人。当他走到哨兵跟前时，喘着气，指着身后的匪徒说：“他妈的，他们都是反革命！”

哨兵朝坡下打了三枪，向指挥机关报了警。

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警卫战士，听到枪声，急忙离开指挥部住的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起来。

这时，吴小华同志也掏出枪来射击，但没有打响。原来敌人还给他的那支新枪，撞针早已卸掉了。

敌人也开了枪。吴小华同志和哨兵立即滚下山去，朝着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逃走。

敌人朝岗哨打了一阵子枪，却没有冲上山来。这时天近黄昏，龚楚仓促地命令匪徒撤走。

第二天，我们与吴小华和侦察班同志在隐蔽的地点汇合了。大家分析了情况，估计叛徒因怕山上真有那么一支河东开来的游击队，实力雄厚，不敢上来，就无可奈何地逃遁了。后来，派人到指挥机关驻的棚子去侦察，见里面

一切原封未动。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吴小华同志的“空城计”成功了。

项英、陈毅同志表扬了吴小华同志的机智勇敢，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同时估计敌人已发现了我们指挥部驻地，一定会对北山大肆“清剿”。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北山，向油山转移。

二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项英、陈毅同志的估计。叛徒龚楚与何长林，在他们的阴谋破产后并不死心。他们带着反动军队在我们指挥机关驻地附近日夜搜查；在北山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布下层层岗哨，严密封锁；张贴布告，悬赏捉拿项英、陈毅。后来又进一步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抓了起来，严刑拷打，有的则加以杀害，使北山党的组织和群众，遭受很大的摧残与损失。好在当时项英、陈毅同志早已和我们一起转移了。

在我们从北山转移回到油山的途中，要经过著名的大梅关。大梅关座落在赣粤两省的交界处，远看群峰耸立，绵延不绝，宛如天然的屏障。一条鹅卵石路迂回蜿蜒，直达关楼。路的两旁，青藤披蔓；油茶成林，古木参天。关口只露出一线蓝天。在关楼的南北两面，分嵌着“南越雄关”和“岭南第一关”几个大字。越过“南越雄关”往下一看，就是余汉谋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的大余县城。一条公路从大余县城伸出，弯弯曲曲地通向广东南雄。

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北山后，日夜穿行在深山密

林中。当我们接近南雄大余公路时，透过树丛，可以看到一辆辆满载军火和敌军的汽车往来奔驰，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二辆小汽车一掠而过，里面坐的多半是粤军第一军的军官。

我们避开公路上国民党的军车，趁一个月黑夜，悄悄地越过了公路线。在山里行军，也是避开大路，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我们的侦察员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在山里随处都可以找到前进的路。行军大多是在黄昏后起步，因为天太亮时怕被敌人发现；天太黑时又什么都看不见，不便于行动。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月光的夜晚，是最有利于行军的了。

行军中常常遇见陡壁。我们有时就抓住岩缝里的粗藤往上攀，身子底下是千丈深谷，稍一失手，就会有粉身碎骨的危险。我们就手拉手，互相搀扶。也有的时候，藤子太高，我们就互相站在对方的肩膀上，去抓住藤子往上攀。

遇到下雨的日子，山路更滑。当时我只有二十来岁，和一些年轻的战士一样，脚一打滑，马上就能抓住旁边的什么东西，把身子稳住。陈毅同志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又拖着一条负伤的腿，常常摔跤，有时一滑便滑到山下去了，我们打趣地说他“坐飞机”。

偷越大梅关后，我们在树林里休整了几天，才继续前进。从梅关下边前行五里，向右一拐，走进山坑，就到达仙人岭脚下了。

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仙人岭时，朝北一望，大余城一带万家灯火，好似点缀夜空的繁星，闪闪发亮；朝

南可以听见广东南雄方向的汪汪犬吠。仙人岭下面，树林茂密，而山顶上却只有荒草，无法隐蔽。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在背风的石坳里休息。大家走得实在太累时，便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了下来，不久便呼呼入睡了，直到东方露白才醒过来。醒来后，陈毅同志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

大家正在说笑时，突然发现一只斑斓的猛虎，就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山洞里。也许是当我们爬上山顶时，这只猛虎正在酣睡，当它醒来时，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侵犯我们。当我们拿起武器准备对付它时，它径自跑了。

不久，从山下大梅关镇传来了敌人的军号声和操练的口令声。这时，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则有暴露目标的危险。于是，大家就在石坳里挨到太阳西沉，夜幕降临，才向目的地继续前进。

陈毅同志曾写有一首《偷渡梅关》的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敌垒穿空雁阵开，
连天衰草月迟来。
攀藤附葛君须记，
万载梅关著劫灰。

的确，月夜攀藤附葛过梅关的这段经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北山事件”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三

“北山事件”的主要教训，是如何巩固内部，以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

项英、陈毅同志主张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坚决实行镇压。但是，要巩固内部，主要地靠教育、说服，靠民主解决问题。陈毅同志不只一次同我们讲：“对于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听到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干革命。”按照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对那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总是劝他们留下来坚持斗争。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或帮助他走。发给路费，帮他换上老百姓的服装，找好路线，派交通员送他通过赤白交界区，使他能安全到家。有的出去后被反动派抓去了，还千方百计去营救他，做到仁至义尽。有一次，陈毅同志在会上对大家讲：“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陈毅同志这么公开一讲，战士中间立即有人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北山游击队的一位侦察班长叫刘燕青，听

了陈毅同志的话坐不住了，站起来作了现身说法。原来，他表现还不错，无论侦察、作战，都很机智勇敢。但是，后来他经受不住困难的考验，动摇逃跑了。可是，过了几天，他又回到游击队来了。因为他毕竟是个被压迫、被剥削的贫雇农子弟，在党的多年教育下，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当他一旦脱离了革命队伍，就象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空虚、害怕，使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刘燕青同志讲了这个过程后，陈毅同志当即表示欢迎，同时对他的动摇逃跑，也作了深刻的批评。不少同志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原来思想动摇的，也说不走了。有的还是要走，但让他走后，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

巩固内部，还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早在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时候，项英、陈毅同志带出了一大笔钱，都是些金子。到达油山后，这些金子一直由他们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饰，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背后对他们的腹部指指点点。这在当时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陈毅同志反复作过考虑。分开背吧，给品质不好的人等于发旅费；继续瞒下去吧，已经瞒不住了。怎么办？还是展开民主讨论吧。一天，他们把队伍集合起来，索性把情况同大家讲清楚，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略为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

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干部、战士们说：“你们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了。”项英、陈毅同志建议分开背。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项英、陈毅同志说：“我们背不了这许多。”最后决定分给几个人背，顺利地解决了问题。以后打土豪得来的钱，也由大家分开背。

巩固内部，还要靠政治思想教育。项英、陈毅同志经常给大家作报告，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陈毅同志在做报告时，总是把问题彻底地讲清楚，既讲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也讲目前的困难是很大的，现实是困难的。只有对当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许多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有一次作报告时，他还特别强调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少数人动摇叛变并不奇怪。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第六章 反“清剿”

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敌人气势汹汹地向我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清剿”。

蒋介石以他的嫡系部队的第四十六师，驻扎在赣州、南康；并调动了广东军阀余汉谋的第一军三个师，军部设在大余；加上江西保安团等地方反动武装，调集的兵力共达三、四万人，分别部署了三道封锁线：

在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控制了所有的渡口，构成第一道封锁线；

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的公路沿线，驻军队，设据点，修碉堡，构成第二道封锁线；

在游击区周围的一系列墟镇，如南雄的乌径、大塘、邓坊、里栋，大余的黄龙、青龙、池江、新城，南康的贤女埠、龙回、禾稿、黄坭巷、李林，信丰的犀牛、黄泥排、大小窝、禾秋、九渡、小江、小河、崇仙，以及赣县的王母渡、大龙等地，都驻军扼守，构成第三道封锁线。

敌人以为布下了天罗地网，消灭红军游击队易如反掌。余汉谋曾向报界夸下了海口：“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还疯狂地叫嚣：“这一次‘清剿’，不把‘共匪’打死，也要把他们烧死，烧不死的就把他们饿死、困死。”

二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红军游击队组成“武装工作队”，以三、五人为一组，分赴各游击区，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群众支援和参加游击战争。

为了便于在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进行群众工作，游击队提出了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的口号，要求干部战士学会一门手艺，以做手艺为名，深入各地进行串连活动。杨尚

奎同志会编篾器，他就以此作掩护，开展工作。生人来了，问他是什么人？群众回答说：“请来的篾匠。”生人见他编的篾笼又细又密，也就相信了。赖文泰同志是个铁匠出身，经常挑着担子走屋场，串墟镇，通过为群众补锅补盆来进行工作。至于游击战士中不会做手艺的，就打赤脚，和群众一起劳动，帮助群众蒔田、割禾。这样，就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交朋友，结同庚，扩大革命影响，争取团结群众，逐步发展组织。后来，游击队还派了一些同志到西华山、漂塘等处的钨矿去挖矿砂，在矿工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

广大群众纷纷参加了不脱产的游击小组。仅在油山和北山游击根据地内，就组织了以党员为核心的游击小组五十多个。他们配合游击队站岗放哨，作侦察，搞情报，保卫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乌径，是南雄信丰公路上的一个大墟镇，是敌人认为最可靠的后方。当敌人开到山里进行“清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在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在一个万籁无声的黑夜里，突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隐蔽急行军一百多里，在天亮以前赶到了乌径。这时，反共靖卫团团总邱光华和国民党区长，还在镇公所里打麻将。守卫在门口的团丁，夜里喝醉了酒，这时正在酣睡。游击队摸清情况后，神速地打进了镇公所。当游击队员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红军游击队在离这里很远很远的深山里，怎么会跑到我们乌径来呢？”这一次袭击，全歼了伪靖卫团，打死了靖卫团团总邱光华。随后，红军游击队把写着红军游击队第×支队第×大队等番号的红绿标语，贴

遍了乌径镇。天色微明，群众看到标语，很快就传开了。有的还推波助澜，大张红军游击队的声势，搞得敌人手忙脚乱，草木皆兵，敌人只好连忙从山里把“清剿”游击队的力量调回乌径。

接着，攻打大余游仙墟。这一仗也打得非常巧妙。游仙墟有个又高又厚的土围子，土围子里的碉堡很坚固，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枪眼，在土围子外面又横着一条很宽的水沟。这年五月的一个夜晚，朦胧的夜色笼罩着游仙墟，游击队长曾彪带着队员们偷偷地来到了。他根据白天侦察的情况，让战士们在土围子附近山坡的树林里隐蔽着。然后他带一个班，大摇大摆地从离敌人土围子不很远的地方通过。通过时，又是大声咳嗽，又是打手电筒，想方设法逗引敌人。果然，土围子里的敌人朝他们开枪了。伴随着枪声，他就“哎唷”，“痛啊！”大声呼喊起来。随后，战士们拥上去，扶着他向山坡树林走去，边走边大声说：“不好了，大队长带花了，快背着走！”土围子里的敌人听了，信以为真，立刻打开土围子的门，越过那条宽沟，冲了出来。事先埋伏在山坡树林里的游击队员，见“蛇”已出洞，就猛烈开火，直打得敌人哇哇地叫。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班，缴获长短枪十余支，炸毁了碉堡，顺利结束了战斗，我游击队员无一伤亡。

大余西华山钨矿局有个矿警队，装备比较好。一天下午，曾彪同志带领十名游击队员，头戴斗笠，腰束布巾，扁担上套着绳索，吊着饭袋、烟斗，打扮成挑砂的短工，悄悄地来到矿警队驻地附近的树林里隐蔽起来。另外，派

了两名游击队员，装扮成卖花生、糖果、香烟的小贩，专门到矿警队驻地做买卖。天近黄昏，矿警队照例在操场集合，听队长训话。当矿警队长刚刚开口训话时，隐蔽在树林里的曾彪同志，扬起手臂，叭叭！飞过两枪，那个矿警队长应声倒下。枪声就是信号。游击队员闻声冲到操场上，把那些矿警团团包围起来，厉声喝道：“举起手来！”矿警们个个惊呆，不知所措，乖乖地举起双手，当了俘虏。曾彪同志手执双枪，向俘虏们讲话：“我们是红军游击队，奉命前来收缴枪支。谁胆敢抗拒，子弹就不留情！”游击队员们把那些俘虏赶到一间房子里，把门反锁了起来，然后扛出枪支弹药，散发了传单，张贴了标语，悄悄地离开了鹤矿局。矿工们见到标语传单，奔走相告：“游击队两枪解决了矿警队！”当时，余汉谋的军部就驻在大余县城里，他们得到消息，大为震惊，马上把派到北山“清剿”游击队的那些兵调回来，以安定人心。敌人哀叹说：“共产党真神呀，北山明明有一个团的游击队，就是找不到他们。”矿工们则兴高采烈地说：“红军游击队真神呀，搞得白军团团转。”

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南雄县委给游击队送来一份紧急情报：广东敌军有三辆满载军火的汽车，明天要从曲江开往大余。游击队得到情报后，连夜巧妙地穿过敌人的碉堡群，于拂晓前赶到南雄、大余公路边一条狭长的小山沟里埋伏下来，监视着公路上来往的车辆。第二天中午时分，果然有三辆军车在国民党士兵的护送下开过来了。离伏击地点只有百把米的地方，游击队就向军车猛烈开火，打得车

上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个抱头鼠窜，三辆军车全被游击队缴获。游击队一面忙着运送车上的军用物资；一面给三个司机做工作，然后把他们释放。临走时，红军游击队还给了他们一叠宣传品。那三个司机回到曲江后，红军游击队神奇般袭击军车的事，便象风一般地传开了，吓得一些土豪劣绅四处逃奔。有的逃到广州去了。在军车上，游击队还逮到一个从南雄回大余的土豪。这个土豪，花钱找门路，好容易坐上了有国民党士兵护送的军车，满以为此行万无一失，谁知半路上却碰到了这么个“倒霉”事，游击队员诙谐地给他起了个诨名：“老霉子”。

正当敌人大举“清剿”油山、北山游击队时，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同志奉命带领队伍乘虚南下，袭击了信丰崇仙，捕杀了反共团总张校麟和白师爷。接着，他们乘胜深入到青龙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青龙山山高林密，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地主山霸主宰一切。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采用“神出鬼没，出敌不意，麻雀战法，老鹰抓鸡”的战术，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民团，镇压了那些血债累累的土豪劣绅。

青龙山下的陂头镇，离镇不远的大刘庄，有个姓吴的保长，是当地的大恶霸。他一贯敲诈勒索，鱼肉乡民，无恶不作。游击队到南山地区后，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墟口路边，设岗派哨，盘查行人，同时，他自己经常变换住处，日夜由保镖保护。这一年中秋节前夕，一个老表向游击队报告，这个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的吴保长要回家过节。游击队对这个恶鬼的家，早进行过周密的侦察。中

秋节这天，十几个游击队员化装成卖柴的，走亲家的，夹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陆续来到大刘庄。天色渐暗，只见一个狗腿子歪着身子守卫在吴保长家的门口。游击队员小马提着根扁担，假装上前去问路，那个家伙带理不理。小马趁其不备，对准他的后脑勺一扁担打过去，那个家伙就象一截烂木头，“咕咚”一声，应声倒在门边。其余的游击队员早已放下竹筐和柴担，夺门而入，几个箭步就冲到吴保长的堂屋里。这个坏蛋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游击队这时会出现在他面前，他全家正围坐在八仙桌上吃团圆饭呢！游击队员大喝一声：“不许动！”吓得满桌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碗筷酒杯掉了一地，鸡鸭鱼汤溅了满身。一眨眼之间，那个吴保长转身没命地向屋后的碉堡逃，被游击队员一把揪住。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地磕头求饶。游击队员迅捷地收缴了他家的枪支，当场宣布他的罪状，立即就地枪决，并把事先写好的一张布告贴在土围子的高墙上。过去群众唯恐在这阎王殿前多停一秒钟，生怕招惹飞来横祸。可是，这天群众站在这里不走了，不一会就围起一大群，人们的眼睛都盯在“中国工农红军赣粤边游击纵队军法处”的大布告上。大家拍手称快，说：“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

三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尽量避免和敌人正面交手，以免陷入被动，遭受损失。但是，有些时候，或者是由于事先没有联系好，或者是由于时间没有算

准，或者是由于难以觉察到的疏忽，也常常要和敌人遭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立即分散，往大树林里、深草丛中、水坑里或乱石后边隐蔽起来。只要沉着坚定，敌人是不易搜到的。

可是，敌人也很狡猾。为了引诱我们出来，当官的就故意高喊口令：“哼，‘土匪’都跑了。集合，回去！”哨子一吹，人马杂乱，象是真要开拔似的。其实，一个连的敌人，只走了个把排，三分之二的队伍仍留在原地守候我们出来。我们也摸透了敌人的脾气，就是不出来。往往一、两个钟头以后，倒是敌人又沉不住气了。当官的跳出来一阵咒骂：“嗨，‘土匪’真沉着。告诉你这次真走了。”又吹哨子集合，果然带着队伍走了。但不一会，一个回马枪，又包围上来了。这时，我们还在那里，草不动，树不摇。当官的可发火了：“妈的，有本事的出来干！”骂完了，机关枪、迫击炮往山上胡打一阵，一边打，一边又叫：“看，那里一个，大石头底下，出来，出来。”再不，就弄个人假冒游击队员，说：“别打了，我讲，那边还有几个同志。”有时，我们的游击队员也可能在这乱枪中受伤，但不管伤多重，都咬紧牙关，忍住不哼。敌人施展种种诡计，胡搞一气，结果什么也捞不到，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有一次，我们从北山回油山的途中，突然与敌人遭遇。陈毅同志和他的警卫员，急忙埋伏在路旁水沟的芦苇里。国民党的兵是怕死的，他们在明里，我们在暗里，他们不敢来搜索。因为搜不到还好，要是搜到了，怕我们二拇指一动，他们得先吃“黑枣”。他们才不愿给当官的卖命

呢！但是为了应付长官，有时还是不得不搜一下。搜的时候，扬着头，假意搜上两遍，便报告说没有发现。于是，连长喊排长，排长喊班长，班长喊士兵：“某某某，再搜一遍！”某某某虚应故事，又搜了一遍，说：“报告班长，没有。”班长说：“什么没有，我看到他们钻进去的。”某某某说：“光喊我，你自己怎么不去？”这时，那个排长就骂道：“你们滚开，我去。”排长下来看见一只鞋子，就说：“这里一定有人。”他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同志盖得更严了。搜了一阵，他说：“妈的，跑掉了。”他把队伍带在路上抽烟。有的说：“倒霉，什么也没有捞到。”有的说：“老子搜到一个包袱。”他们把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有衬衫和书籍，便惊奇地说：“啊！共产党苦成这个样子，还念书呢！”陈毅同志和特务员一直非常沉着，直到黄昏时分，敌人去远了才从芦苇中出来。

有一次，我和油山区委书记丁祖贻以及交通员、警卫员一行四人，从南雄大兰地区检查工作后回到驻地去。因连天阴雨，山间小路实在难走，就拣较大一点的路走。当我们转过一个山头的拐角时，发现距我们约百来米的地面，有一支南雄“铲共团”的队伍。警卫员眼尖手快，叭叭地打了两枪，就从斜刺里溜走，躲进荆棘丛中隐蔽起来。我随着枪声转身同老丁等招呼了一声，也火速跨过左边的围埂，钻进了深山密林。敌人鸣枪追赶。当我刚上山腰时，就听得树叶瑟瑟作响，原来敌人已窜到山脚。我就从山腰爬到山顶，钻进更加茂密的森林里，观察着敌人的动静。当敌人追到山腰，因不知道我们的虚实，没有敢往更

深的密林里追，只对山腰打了一阵乱枪，就灰溜溜地撤走了，连隐蔽在他们脚跟边的警卫员也没有被发现。我们四个人走散后，却不约而同悄悄地摸回原来从大兰出发时的区委交通站。当我们重新会合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惜的是，警卫员在朝敌人打枪时，把我的那个旧阴丹士林布包和一只口缸，丢失在路边被敌人拾走了。当天下午，“铲共团”用枪刺挑着我的那个旧阴丹士林布包和那只口缸，大摇大摆地从大兰走过。大兰的彭祖庭同志，过去在红军队伍里干过几天会计工作，对红军游击队的感情特别深厚，同我更是十分亲近，他见到敌人枪刺上挑着我的那个布包和那只口缸，却不见我的影子，暗地里为我的安全捏一把汗。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重新见面时，他惊喜地说：“天啦！我还以为你牺牲了。”

四

在反“清剿”中，男女秘密交通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了保证出敌不意，夺取战斗的胜利，为了避免游击队因情况不明、行动失误而受损失，秘密交通员们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雨暴风狂，不避艰难险阻，奔波在高山密林间，来往于敌人的碉堡群中，英勇机智地传递着党的指示、机密情报和战斗信息。

信丰上乐的共产党员郭洪传，就是许许多多优秀交通员中的一个。他工作出色，经验丰富，并善于随机应变。有一次，他带着一份机密文件，从上乐送到坑口去，然后从那里带着项英、陈毅同志的回信，经宰子坑返回上乐。在

返回途中，他来到下坊屋场，环顾四周，见没有什么动静，便在一家老表的门口坐下来歇气。刚刚抽完一筒烟，就有人对着他呼唤起来：“老表，兵来了。”郭洪传马上站起来，挟着雨伞就走。他拐到屋场背后，见小河边有个钓鱼的小孩，正爬到果树上去摘果子，把钓竿丢在河边。郭洪传灵机一动，火速地跑过去，把文件和雨伞藏在深草沟里，拾起钓竿，悠悠然地钓起鱼来。反动派军队窜到屋场来了，东窥西望，对着郭洪传大声喊叫：“喂！见到一个撑伞的人没有？”郭洪传头也不回，慢吞吞地回答说：“有一个。刚过去了。”爬在果树上的那个小孩，马上接嘴说：“看，那个人正在对面那座山上奔跑呢！”敌人听了，连忙追了过去，郭洪传迅速地从深草丛中取出信件和雨伞，拐进另一条小路，回到了交通站。原来，当郭洪传撑着雨伞在秃岭上行走时，山下的敌人早已从望远镜里发现了他。随后，敌人就跟踪前来。可是，狡猾的敌人最后还是扑了个空。事后项英同志赞扬了郭洪传同志的英勇机智，并亲切地对他说：“洪传，当交通员要眼观四方，耳听八面，可不能有半点疏忽啊！”洪传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工作更加小心谨慎。

还有一次，被派到信康赣区工作的曾纪才同志，与一个秘密交通员一道，到一个地方去联系工作。不巧，他们和国民党士兵遭遇了，就连忙躲进路边的草棵里。敌人拚命地搜索，眼看就要搜到他们身边来了，那交通员就对曾纪才同志说：“今天是躲不过了，我们俩人只好牺牲一个。你是负责干部，应当赶紧走，由我出去把敌人引开。”曾纪才同志还没有来得及答话，那个交通员已勇敢地站出来，

迎着敌人走去，说：“不要搜了，我在这里。”敌人问他还有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什么地方，他用手指了指，说：“在东边，我带你们去。”他把敌人引开之后，曾纪才同志乘机脱了身。后来敌人发现上了当，就狠命地打他。他说：“再打也没有用，人家早跑远了，你们抓不着了。”这个交通员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这种“把死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的战友”的风格，何等崇高！

但是，在交通员中也有个别革命意志薄弱的，一旦陷入敌手，就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了，还带着敌人来搜捕自己的战友。这种为虎作伥的勾当，给秘密交通线带来极大的威胁，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为了谨防叛徒的破坏，领导上经常教育交通员要格外保持警惕，严格遵守秘密交通纪律和各项制度的规定。一旦交通员误期不归，领导上马上改变活动方式。有时指挥机关还要立即转移，正如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中所指出的那样：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

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五

敌人在“清剿”中，为了寻找红军游击队，曾总结了三条经验：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他们常常派出便衣侦探，装扮为打猎的、烧炭的、砍柴的和挖竹笋的，窜到山里探听动静。他们在路旁沟边察看有无我们的足迹，到山

顶上观察有无我们烧饭的火烟，躲在山林草丛里窃听有无我们说话或咳嗽的声音。他们一发现“情况”，马上向上级报告，调来国民党军队，把我们包围起来。

敌人的这些作法，使我们的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我们也有一套反“清剿”的办法。“有路不走，没路就走”，一般不走公路、大路，而是设法穿插过去；有时就连小路也不走，专找无路的山爬，不管山高坡陡，总是奋勇地翻越过去，以免留下脚印，暴露目标。特别是下雨天，为了走路不留脚印，我们干脆在水沟里走。在水沟里走时，决不能失落东西。否则，失落的東西顺流而下，敌人发现了，又会跟踪而来。至于行军必经之路，后面专门有人处理脚印。晚上走路，不点火把，不打手电筒。为了不致走散，有时每人头上扎一条白手巾，一个紧跟一个走，煮饭时，尽量做到“白天做饭不冒烟，夜里烧火不透光”。还严格规定行军不许大声说话，不得大声咳嗽。记得有几个同志，嗓子粗，说话的声音稍大一点，有的又爱开玩笑。陈毅同志就告诫我们：

休玩笑，耳语音放低，
林外难免无敌探，
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当然，我们有时也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例如，走路倒穿鞋子，故意留下“脚印”，让敌人跟“踪”寻找。到离我们驻地较远的山上点火，让敌人来“围剿”。有时故意在野草丛中丢锅，把“目标”暴露给敌人，让敌人在深山里捉迷

藏。

根据斗争的实践，项英、陈毅同志后来还提出了几条游击队的《秘密原则》和《行军规则》。

《秘密原则》是：（一）生火做饭不出烟，以免被敌人发现。（二）不出响声，说话小声。（三）进出不留脚印，走小路，走荒地，走水沟。（四）无直接工作关系绝对不往来。

《行军规则》是：（一）选择好时间，不任意行动。（二）行军时爬山走荒地，以免中敌埋伏。（三）过山坳要从山旁爬过。（四）随时注意路上所发现的各种迹象，以判断敌情。（五）夜间行军要一个紧跟一个，以免失去联络，绝对禁止打电筒。（六）行军间隔要短，与尖兵距离须在十米以外，以便发现敌情及时应付。（七）行军时绝对禁止高声说话。（八）不脱衣睡觉，时时捆好衣物，如有情况好迅速行动。

六

在反“清剿”斗争的那些艰苦日子里，项英、陈毅同志常常深入到北山、油山、信丰、南雄等地，听取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汇报，及时指导斗争。

一九三五年六月，陈毅同志腿上的伤口复发了，不能行走，当时药品的补给极为困难，八卦丹、万金油、仁丹、济公水，算是最好的药品了。他就在伤口上擦点万金油，用块布包扎起，不久倒也好些。

谁知到了九月，伤口再次复发。这一次痛得更加厉害，伤口已经化脓，腿跟红肿。但他不顾伤痛，仍坚持到

南雄参加县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一路上，他拄着拐棍，一跛一跛，步履极为艰难，特别是爬山越岭的时候，更痛的难受。天近黄昏的时候，好不容易走到了县委住的棚子。他趁开会的人还没有到齐，就在县委棚子东南角的杉树林里挤伤口。起初，让警卫员帮他挤。警卫员见他脸色变得象一张蜡纸，汗珠直往下滚，怎么也不忍用劲去挤。陈毅同志就说：“为什么不用劲啊！”警卫员说：“我用力你要抖嘛！”陈毅同志说：“那好，你去拿根带子来，我把腿子绑在树上，挤的时候就不会抖了。”警卫员找来了带子，陈毅同志坐在两棵杉树当中，把伤口复发的腿横绑在树干上，背脊靠在另一棵树上，警卫员两手按紧伤口，小心翼翼地挤着，血水沿着伤口一股一股地向外流，终于把脓血挤干，连负伤时碎在里面的一小块骨头也挤了出来。接着，警卫员帮他用盐水把伤口洗净，用万金油抹在用盐水煮过的布上，再用竹签子把它一点一点地塞进伤口里去。最后，在伤口外面用块布包扎起来，就算处理好了。警卫员见他浑身颤抖，脸上的汗珠再一次沁了出来，吓得连看也不敢看，而陈毅同志却谈笑自若，说：“这次挤干净，下次伤口就不会‘反攻了’”。果然，从这以后，他的伤口居然渐渐好了起来，而且再也没有发过。

敌人“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清剿”计划彻底破产了，只好把期限从三个月展为半年，以后半年不行，又展为一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了。

在我们红军游击队方面，却在反“清剿”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项英、陈毅同志曾把这些经验概括为这样

一些基本原则，即：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坚持公开斗争与半公开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的内线工作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在武装斗争中，必须坚持游击战争的机动灵活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敌人捉摸不定，而我们处处主动；善于运用夜袭的战术，努力做到把敌人搞掉，而我们一个不伤；利用地形地物打伏击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后来，随着游击战争的持久开展，各个游击队在游击战术的运用上，更是达到了“最精彩的阶段”。为了便于一般不识字的同志记忆，项英、陈毅同志还把这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仗，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中，对这些游击战术，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形象的概括：

讲战术，稳坐钓鱼台。
敌人找我偏不打，
他不防备我偏来。
乖乖听安排。

第七章 扎 根

一

严寒的冬季来到了，红军游击队的处境更加艰险了。

一九三六年初，我和油山区委的几个同志，到彭坑、黄种一带开辟工作。我们根据项英、陈毅同志关于“巩固老游击区，发展新游击区”的指示，和当地群众一样的装扮，蓝衣裳，黑头巾，避开大路，穿过山崖小涧，来到了那里。

彭坑、黄种地区，在油山西北方向。拨开油山的云雾北望，目光掠过群山之巅，可以看到平原一线，曲折的漳水，时隐时现地从大余流来，绕过青龙、池江、新城，向赣州方向流去。冬季的南方平原，绿一块，红一块，黄一块，直到与云雾缭绕的崇义、上犹山区连接。我们看到这样开阔肥沃的平原，不禁赞美道：“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欺骗宣传，以及我当地党组织过去

执行错误政策的影响，至今在赤白交界地区，山里山外的人还存在着对立的情绪。山里的人外出很麻烦；山外的人进坑，没有保人也不会顺利。而这条山沟，这时只有有数的几户人家，离敌人又近。反动军队驻扎在圪里，那些当官的只要心血来潮，口哨一吹，一个跑步就可以到山沟来搜个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活动不便，物资补给尤为困难，要立脚、发展，并不是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努力做到细致、周密、坚定和灵活。

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召开了干部会议。那天，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我和廖正文、吕新洪、陈妹子、曹秀清等同志，秘密地挤在葵花坑的茅棚里。茅棚四周全是枯藤荒草，杳无人迹。我们拟订了一个工作方案，确定：第一，巩固立足点；第二，建立贫农团，依靠贫雇农，做好赤白交界地区的群众工作；第三，发展大墩（平原）的工作。

我对大家说：我们的工作要象钉钉子那样，一步一步地钉牢在这一带，深深地扎下根子，把赤白交界区变为赤区，把工作推向平原。因此，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红军的群众纪律，努力消除在赤区的人民与在白区的人民之间的隔阂。敌人非常残暴，动不动就是一番烧杀，加上欺骗宣传，不少人暂时会迷失方向。我们应该理解和体谅人民群众在这种严重情况下的困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从事革命斗争。

我的话音刚落，从一九三二年起就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长曹秀清同志说：“对！我完全拥护！过去‘左’

的那一套，给我们吃的苦头，已经够了。现在我们就按照新的政策来干吧！”他把手一挥，指着山下说：“就拿彭坑来说，刘汉光是忠实可靠的；他的妻子三嫂子经常给我们送饭。还有魏良洪，是红军伤员，现在还被关在大余监狱里。我们要马上设法把他保出来，使他成为我们依靠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串连发动，着手建立贫农团。”接着，大家都发了言，提了建议。最后，分了工，分头奔向彭坑和各个屋场(村庄)去了。

二

在群山环抱、密林遮天的彭坑沟边，有一所单门独户的房子，就是刘汉光的家。我们把他的家当作“立足点”，他们全家则把我们当作亲人。刘汉光的妻子三嫂子三十多岁，已是八个儿女的母亲。她为人忠厚，又很能干，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除了担负繁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外，她还给我们送饭、买东西。我们请她办的事，她都努力去办。

记得有一次，游击大队长曾彪同志隐藏在彭坑对面的小山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兵就在彭坑的沟边放哨，监视很严。三嫂子想，曾彪同志在山上已有好几餐没有吃上饭了，怎样才能避过敌人的眼睛，把饭菜送过去呢？她想了好久，最后决定把饭菜放在一个竹筒里，再把竹筒放在背篓里，上面放一把镰刀。她背上背篓，扮作上山去砍柴的样子。当到达小山脚下，相机与曾彪同志取得了联系。曾彪用一根藤子束在腰上，装作砍柴的样子，看看左右无人

的时候，挨近竹篓，取走了竹筒。接连几天，她坚持这样给曾彪同志送饭，做得很小心，始终没有被敌人发觉。

有一段时间，陈毅同志和我住在三娣嫂家后山上的草棚里。三娣嫂每天总是提个竹篮子，借口上山打猪草，把油盐菜米送到草棚来。端午节那天，三娣嫂还提着一篮粽子送给陈毅同志吃。陈毅同志看着这些充满革命情谊的粽子，非常激动，亲切地问她：“表嫂，你叫什么大号呀？”

“我姓周，妇娘们没有大号，小名叫三娣子。”她回答说。

“闹革命嘛，男女平等。你也该有个名字啊？”陈毅同志风趣地说。

“好是好，只是我没文化，你给我起个名字吧！”她说。

“这样好吧，你天天给我们送饭、买东西，手里少不了一个篮子，就叫周篮吧！”陈毅同志想了一想，爽朗地笑道。

大家赞同这个名字，认为很有纪念意义，周篮自己也很满意她的新名字。

一天，陈毅同志坐在周篮家屋后的石板上看书，警卫员宋生发和聋牯坐在旁边擦枪。突然，周篮家的狗狂叫起来，原来是一群国民党兵窜到彭坑来了。这时，周篮嫂正在门前河沟洗东西，发现敌人时，要赶回屋后通知陈毅同志，已来不及了。她急中生智，用石头打狗，边打边大声叱骂：“你这只死狗，叫什么？这么多兵来了，会一下子把你打死的。”陈毅等同志听了，连忙转移到深山里去。敌人搜查了周篮的家，什么也没有捞着，就溜回去了。事后陈

毅同志感激地说：“大嫂，你真有法子。”

我们住在彭坑后山的草棚子里时，有事常要找刘汉光，而国民党反动派又常来搜山。我们白天去他家吧，怕暴露目标，晚上去呢，又怕他家的狗叫。外加他们住房外面还有一堵土围墙，叫门也不方便。后来这个情况被周篮知道了。一天早上，她又提着只篮子，送东西到我们的棚子来，还跟来一条狗。狗见了生人，夹着尾巴呜呜地叫。周篮嫂对游击队员肖明朗同志说：“你们拿点东西给它吃吧，以后它就认得你们了。晚上你们来也方便。”接着，她又说：“每天晚上我关门的时候在土围墙的墙脚放一条凳子，你们可以踩着凳子翻墙过来，就不会惊动别人。”我们照着她讲的做，联系工作就比较方便了。

周篮同志对我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一直铭记在心。一九六二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时，陈毅同志在看望参加会议的大余县委书记时，问起彭坑的周篮还在不在，县委书记回去，果然找到了周篮，并表彰了她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支援红军游击队的功绩。后来，周篮同志以老苏区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会议，路过上海时，我们高兴地见了面，亲切地交谈了很久，一九七五年她去世时，我特地送了花圈，对她表示深切的哀悼。

三

我们有了这样的落脚点，就开始组建贫农团。当时参加贫农团，被反动派知道了，是要杀头的。可是，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的地方，不管有多么大的危险，总是有人参

加的。

一九三六年初春的一天，油山中心区委在蛇子坑的棚子里筹备圪里贫农团的成立大会。这是紧接着小汾贫农团成立后的又一个盛会，它表明这时我们的工作已经向山外展开了，并已伸展到平原的边缘。这一天，据了解没有敌情，大家一早起来就忙着布置警戒，愉快地生火，安排“会场”。

我们正忙着，忽然听到山鸡叫了，叫声由远而近。这是信号，有人来了。廖正文连忙向我招呼一声：“来啦！”

我隐蔽到石咀后面，透过树丛往山下一看，果然有一个人，挑着一副空柴担，缠着黑头巾，穿着一件大棉袄。这件棉袄几乎吐满黄呼呼的棉絮，也不知传过几辈人了。这人大约十六、七岁，样子很机灵。他在坑口左看看，右看看，两手抓住柴担，猛一窜窜进了林子，躲躲闪闪地向我们山上奔来。在他身后，并没有拖着国民党的什么“尾巴”。

他上来后，我就招呼他：“黄克连，你早哇！从兰村来吗？”

他抬头看见我，惊喜地答道：“阿丕老陈，你更早哩。你还记得我住在兰村？”他摘下头巾，头上热气腾腾。

“怎么不记得？头年你进坑割晚禾的时候，克廷不是介绍过吗？”

“对，对！从那以后，同志们还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哩！昨天晚上通知我开会，我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今天天麻麻亮就起来了，生怕误了大事。”

人来多了。克廷、克连、克纪、克扶、克轮和传仕等，几乎全是姓黄的，一共十几个人。人一多，冷僻的山坑顿时热闹起来。到这里来开会是不容易的，每道封锁线上，国民党都贴着命令、布告，白纸上写着黑字：“通匪、济匪、窝匪者，杀无赦”，但是，觉醒了的农民，为了寻找自己的组织，为了闹翻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回答反动派“杀头”、“满门抄斩”的威胁是：“来吧，摘了脑壳也要把你们砸碎！”于是，有的背着筐子，有的挑着柴担，三三两两地登上山来。

人到齐了，我对廖正文说：“找几个同志帮他们打柴吧，等他们开完会，好下山。”

几个游击队员应声拥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柴担、柴筐搬着就走，来开会的人急忙起身阻止，双方互相友爱地争执起来。我说：“打几担柴禾算得了什么，这不也是应该的吗？要不，大家空着担子下山，反动派盘查起来，怎么回答？”他们才没有话讲，围着炭火坐了下来。

这时，曹秀清向我示意，岗哨没有发现敌情。

圪里贫农团的成立大会就这样开起来了。在这个会上，许多人都激动地倾谈自己的认识，表示决心：决不反水，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和地主豪绅阶级斗争到底。气氛是那么肃穆庄严，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都象山盟海誓，激动人心！他们站立起来，象漫山的青松翠竹，敢傲雪霜！

贫农团成立了，黄克廷当选为负责人。选举后，我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参加了自己的组织，要努力工作。

“天下穷人是一家”，大家都有责任向贫苦农民宣传，介绍好的对象加入组织，人多力量就大了。工作要秘密，不能暴露。发展对象要谨慎，好吃懒做的不要，二流子不要，土豪劣绅更不要；要贫苦、勤劳、有觉悟的人。对于那些来自外地的“客户”，不能歧视，要团结帮助。并且告诉大家，运用多种多样活动的方式，交朋友，结同庚，或者通过宗族关系、社会关系广泛地团结群众，人多力量就大了。

散会的时候，大家挑起了游击队员打好的柴禾，兴致勃勃地下山去。他们下山坡，过小桥，有说有笑，十几个人一行，柴禾沉甸甸，扁担闪悠悠，走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快步如飞。他们挑着、背着柴禾，心里惦记着自己的誓言，将把自己懂得的道理，带回各自的屋场，使它在群众中传播，让革命的火苗在平原上燃烧。

四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廖正文突然叫醒了我。他说：黄克连找好了一个对象，约定明天进山打柴。

看来这似乎是一桩小事，但是在当时，我们把它看成是打破敌人封锁、创造生存条件的一个重要步骤。为了争取一个对象，我们不遗余力地工作。因此，当晚我们作了周密的布置。

黄克连约好的对象是兰村的老邓。他是从南康搬来的“客户”，到兰村后，人生地不熟，家又穷，一天到晚没着没落的。黄克连看中他是个老实人，先跟他打招呼。以后，在谈吐中不时流露对他的关怀与同情，话很投机。后

来，两人议论起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来，老邓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没有路子，弄不好要出事的。”黄克连说：“我也想联系。只要认识清楚了，总会有路子的。”分手的时候，两人约定第二天一同进山打柴。随后黄克连就给我们带来了信，希望我们接头考察。我们也认真地研究了这种情况，作了布置。

第二天一早，黄种的山坑里来了两个人，一大一小，一前一后，都挑着担子。小个子的一举一动，早已使游击队员认出了他就是黄克连。他们一进入山林，游击队员和区委干部就出来和他们见面；攀谈着，并且帮助他们打柴。从谈话中了解到老邓确是一个好对象，与黄克连所谈的基本上一致，区委干部暗中向黄克连点点头。不久，天下起雨来，游击队员赶紧给他俩把柴捆好，并且送给每人一件蓑衣，对他们说：“雨大了，下山吧！”

老邓已经觉察到这就是自己一心想找的红军游击队，挑起担子来的时候，眼角里闪着感激的泪光，好象有满腔的话要向我们倾吐。

过了一些日子，贫农团又开会了，会场里增加了几个新会员，其中一个就是老邓。

五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遵照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在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对贴“反共”标语应付敌人的群众，不予追究。对个别反水的农民，采取宽大的教育政策，除造成很大危害的以外，一般就让他们回家生产；万

不得已需要镇压的，对他们的家属也酌情给予抚恤。

政策上的调整，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说：“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真是顺天理，合人情，仁至义尽啊！”而且一传十，十传百，使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被迫搬出山坑的群众纷纷回来，坑里的人多了，贫农团的发展就快，不久好几个地方都成立了贫农团，每人每月还交三、五个铜板的团费，表示对组织的忠诚和保护。他们知道山上粮食困难，秘密开会作出决定，把圩里的二十五石公堂赈谷打成米，通知游击队员夜里去挑；他们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割断敌人电线，勇敢地参与了火热的斗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把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团，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党、团组织，把广大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

以后，整个斗争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在这一年的重阳时节，我们进一步发展大墩（平原）工作。在大洋坑举行集会，检阅了自己的队伍。

这时，晚稻已经开镰收割，但漫山的松杉依然是那么苍翠。一天早晨，游击队员们穿过茫茫重雾，下到屋场，布下了隐蔽的岗哨，并且宰掉了买来的一只大白鹅，回到山坑，大家把鹅肉放到盆里炖起来，等待着来到这里集会的人们。

不久，彭坑、黄种、小汾、平田坳、圩里、兰村，还有板棚下、露箕坑的人，陆续来到山坑。有的从大路上来，有的是从山砭上来，有的从林子里穿过来，方圆数十

里的人，聚会在一起，汇报了情况，研究了工作。最后决定，彭坑、小汾、平田坳、圪里各成立一个贫农团。蓝玉辉老伯被推选为小汾贫农团的负责人，黄克廷为圪里贫农团负责人。其他各贫农团都推定了适当的人负责。黄克连则负责杨村、兰村一带的工作。

散会了，将锅盖揭开，喷香喷香的美味就冒了出来。我们把炖好的鹅肉端上来，大家围坐在一起聚餐，迎接革命转折点的到来。

第八章 反搜山

一

一九三六年春天，正当反“清剿”、反封锁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获得敌人的密令：“要组织一万民众，自带柴刀、火柴和七天的口粮，随军搜剿。违抗命令者，以通匪论罪，格杀勿论”。

陈毅同志当即和我们一起对这个“密令”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在游击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回山斗争，使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因而敌人施展出的一个新花招，目的是把油山变成秃山，使游击队无处藏身，从而断绝革命的根苗。

随后，陈毅同志又到项英同志的驻地，共同分析了敌人内部的矛盾，认为大余、信丰和南康的敌人，不属同一建制；大余是余汉谋的第一师；信丰是余汉谋的第二师；

南康是保安队，他们之间不可能协同动作。

针对这些情况，项英和陈毅同志作出决定：

把信丰境内的几个指挥机关分散到大余，南康境内暂时隐蔽，并把游击队住的棚子拆掉，以消灭目标；

在敌人开始搜山抄山时，游击队主力乘机挺进山外，袭击敌人的据点和后方，迫使敌人出山；

发动被迫进山“搜剿”的群众，故意拖延时间，使敌人不能按计划进行；在搜山时，由党员发动群众大声吆喝，示意游击队迅速转移；

再发动群众中的游击小组，在山外割电线、打冷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吸引敌人出山；

并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向国民党保甲长发出警告。

不几天，粤军余汉谋果然要大余、信丰、南康的群众，分路大举搜山，每路前有群众二、三百人，后有敌军一个连，从四面八方向游击队的驻地搜抄。

当拉成“一”字形长蛇阵的人群，缓缓地向前蠕动时，我们在山里，远远就可以听到“吭唷！吭唷！”的歌声，那是群众示意游击队：反动派来搜山了。

当敌人用枪刺威迫群众砍树时，群众故意拖延时间。当着敌人的面，用刀口砍两下；敌人一走开，就用刀背砍。结果是砍树声怪响，一天却砍不倒几棵树。

敌人认为可疑的山窝子，就站在上面要群众带着鸟枪、梭标下窝子搜。可是，搜来搜去，却没有搜出一个游击队员。

在信丰的上乐地区，敌人要搜山群众到对面山上烧茅

草。这一手是很毒辣的，因为茅草一烧，火势蔓延，酿成大火，就会毁坏大片山林，把游击队烧死在里面。

为了对付敌人，群众队伍中走出两个人，一个是大小窝党支部书记老郭，一个是少先队员小肖。他们表示愿意带领敌人去烧山。

到对面山上去，必须越过一条河沟。河沟没有桥，只有几块石头，散乱地露出水面。当他俩过河时，故意把身子一歪，跌倒在河沟里，并趁跟在身边的两个敌人没有提防，顺势把他们的右腿一钩，左手一拉，就拉下了水。另外两个敌人，也被水浪溅了个一身湿。敌人恶狠狠地把他俩骂了一阵，要他俩继续在前带路。

到达茅草山时，他俩掏出火柴盒一看，火柴全都浸湿了，根本擦不着。于是，敌人只好把自己身上的火柴掏出来，但他们的火柴也是湿的，哪里擦得着。气得敌人大骂：“混蛋，滚回去！”

傍晚，敌人缩回乌龟壳里去了。半夜里，群众中的游击小组就活跃起来了。他们带着刀具，跑到电线杆下，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的肩膀，把几十公尺长的电线割下来，丢到深山里，或沉到水塘里。然后，在电线杆上贴上游击队的标语。第二天，敌人出来查看时，群众说：“昨晚狗咬得凶，可能是游击队下山来过。”敌人看到电线杆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士兵不打士兵！”落款是“红军游击队第××支队第×大队。”敌兵装着没有看见一样，连忙缩了回去。

就在上乐地区敌人开始烧山搜山的当天晚上，上乐游

击队政委吴汉财同志率领游击队员，急行军八十里，深入到敌人后方的信丰犀牛一带。他们白天隐蔽在密林里，晚上出来放冷枪，贴标语，打乡公所，抓土豪。群众游击小组则配合他们割电线，造声势，在洋油箱里放鞭炮，纷纷传说来了游击队。游击队则从犀牛、牛颈，一直游到龙回、大龙，闹得敌人晕头转向，弄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游击队。那些土豪劣绅被吓得纷纷到县城躲避。

在敌人发起搜山的第三天，被裹胁在山里的群众就跟敌人闹：“你们要我们来搜山，游击队却搜到我们家里去了。我们不搜了，要回去保家。”敌人士兵在山里日晒雨淋，夜里更被蚊子咬得苦，怨天尤人，骂道：“搜山，搜山，搜他妈的，连个‘土匪’的影子都不见！”敌人生怕游击队端掉他们的老窝，便提前把部队调出山，把被他们胁迫进山的群众解散。

敌人出山，游击队回山。

敌人苦心经营的“大搜山”，闹腾了几天，什么也没有捞着，只好草草收场。

二

敌人的这次“大搜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敌人始终没有放弃采用移民、并村、搜山等手段来困死扼杀游击队，因此，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在给养上所遇到的困难，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在那种情况下生存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游击队只有为数不多的步枪，而且多是“单响枪”，不

是没有“爪子钩”，就是没有“顶子簧”，打了一枪，子弹壳退不出来，要用通条捅了以后，才能打第二枪。

到敌人后方去执行任务，一般说短枪是不可少的。但是，那时要弄到支短枪，是多么难啊！我们有时只好把长枪的枪柄锯短，别在长袍和上衣里面，当短枪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主要靠打伏击战，从敌人手里缴获枪支弹药，解决补给上的困难。同时，也靠打土豪，迫使土豪为我们购买枪支弹药。另外，我们还发动群众到敌人那里去“偷”。但往往“偷”到了枪，却“偷”不到子弹。所以，我们每支枪配备的子弹很少，一般只有三、五发。

吃饭的困难更大。特别是在敌人“清剿”、“搜山”最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大家只好用野菜充饥。

有一次，陈毅同志与敌人猝然遭遇，跟随他的警卫员也被打散了。他一个人在茅草丛里躲了三天，挨了三天饿。第一天，他把随身带的盐，拌和着山上的糯米草（江西老表把它当作喂猪的好饲料）拿着咀嚼。第二天，他饿得爬不动了，想到沟边取水也没有力气了，只好静静地躺着。幸亏第三天，我们在山里找到了他。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炊事员和游击队员们还想出了种种巧妙的办法来做饭。拣枯枝，劈细柴，白天烧火不出烟。夜晚烧火的时候，上下左右都围以军毯，不透火光，有时，没有锅做饭，大家就地取材，从山上取来一截竹筒，捅开竹节，装进米和水，用泥巴封住两头，横放在火堆中，等到竹筒将要燃着时，劈开竹筒就是熟饭。正是：“一根竹子大叉长，捅开竹节把米装；烤上一堆闷星火，

掏出米饭喷喷香。”

我们经常吃不上菜，有时能吃上点广东海带、咸鱼和萝卜干，就算很不错了。不过，情况不太紧张时，我们也积极想办法“改善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上好吃的东西多着呢！油山有杨梅、竹笋，都可以吃。北山有一种叫作“挪”的山果（类似香蕉），又香又甜，既能解渴，还可充饥。北山、梅山有一种名叫石鸡的山田鸡，大的一只有斤把重，也是改善生活的美味。情况好些时，我们夜里出去捉蛇和石鸡。火光一闪，蛇就缩作一团，很好捉。电筒一亮，石鸡就跳到亮处来，一动也不动，一捉一大篓。这种山田鸡，可以炒了吃，也可以做汤吃，汤白得象牛奶，味道很鲜。我们有时还出去掏马蜂窝，掏蜂蛹吃。在大树林里，马蜂很多。但掏的时候，老蜂要来叮。我们就用竹筐套在头上护着，然后点着干草，对准蜂窝口熏，老蜂子被火烧死或者飞走。我们就把里面的蜂蛹掏出来，炒了吃，又香又脆。山上还有山牛、羊、野猪、豹子、老虎等各种野生动物。要是能打上只野猪和羊、山牛，那就太好了。可惜有时因怕打枪暴露了目标，即使它们来到身边，我们也不敢开枪，只好同它们“和平共处”。

每当我想起这段生活时，陈毅同志那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诗句，便在我的耳际回旋：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初到油山时，我们还可以在偏僻的地方找些小房子住，后来房子被敌人烧掉了，有一段时间，就只好风餐露宿。雨天，大家撑把伞在大树底下，背靠背地坐着睡。晴天，就往古坟的石板一躺，仰卧着看星星月亮，与天地同归了。

赣南一开春就是雨季，几乎天天下雨，靠把伞撑着，人整天泡在雨里，夜里简直无法入睡。特别是深山密林，春寒长，秋凉早，夏天也往往是夜凉如水，露浸肤寒，人被冷醒。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里，用明白如话，饶有风趣的语言，再现了我们当时的情景：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遇到雨季，困难更甚。他还写着：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待天明。

几番梦不成。

在情况较为稳定的时候，为了不在大树底下撑把伞过夜，大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己动手搭棚子。有时

用芒杆搭成“人”字形的棚子住，有时又搭成竹棚、杉皮棚和布棚。我们用竹子搭棚时，先把竹子剖成两半，然后在棚顶上把竹子一根根排列起来，就象一排排“琉璃瓦”。由于剖竹子时响声很大，容易被敌人听见，便改用杉树皮搭棚。但是，杉树剥皮以后，白花花的一大片，也容易暴露目标。于是，大家又想出了新办法：发给每人一块蓝布，蓝布的四角钉上绊子，往四周树上一挂，便可遮露挡雨，搬起来也方便，只要把蓝布一解，把地扫干净就行。游击队每个班都有一把杓，搬家时只要用杓泼水，就可以消灭地上的痕迹。当然，遇有山洞的地方，我们就在洞里过夜。

一九三五年冬，赣南下了一场几十年未有过的大雪，树枝上、茅草上，到处挂着一串串冰凌，粗得象一根根冰棍。冷风吹来，相互撞击，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有的碰断了，就“哗—唛—”一直溜到山下。突围上油山时，我的背包和衣服都丢光了。到达油山后，要添点衣服也难办到。有一年，我就只穿一件夹背心，两条短裤，度过了寒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子盖。那年冬天，我就和杨尚奎同志合盖一床薄薄的毯子，你拉过来，我拉过去，怎么也盖不严。那凛冽的寒风，钻进了棚子，我们翻来覆去，浑身象打摆子似的，一刻不停地打颤，上下牙齿碰击得又酸又痛。我们就这样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了无数的风雪之夜。

那个时候，“风击悬冰碎万瓶，野营人对雪光横”（陈毅诗《雪中野营闻警》），不能说是不难；“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陈毅诗《野营》），不能说是不苦；

日搜夜剿“满山抄”，不能说是不险。但是，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亲密无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游击战士从不叫苦。不论是在杳无人烟的深山里，还是在昏暗潮湿的森林中，不论是遇到狂风暴雨的袭击，还是遭受饥寒交迫的冻馁，大家总是谈笑风生，乐趣融融。而且只要情况许可，大家就小声唱起红军歌曲、新山歌和赣南采茶调来。特别是陈毅同志，更是胸怀坦荡，泰然处之。他当时写下的那些诗篇，充分地反映了他那镇定自若、坚毅顽强的高昂革命斗志，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

三

在粉碎敌人搜山封坑的斗争中，我们游击队员固然能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困难；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最根本的还是由于我们游击队员对党始终怀有坚强的信念，并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支持。

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冬，下了那场大雪之后，我们被困在深山里，与山外群众的联系几乎完全隔断。粮食已经吃光了，野菜也没法寻找，大家都在发愁。

正在这时，指挥机关派出去搞给养的事务长回来了。他历尽艰险带回来一布袋的大米和干菜，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当他从布袋里往外掏大米和干菜时，还喜冲冲地说：“不用发愁了。山林里到处有小仓库，要米有米，要盐有盐，老表都替我们准备好了”。大家听了都跑进树林里去找“仓库”。警卫员叶树林找到一根作了记号的竹杠子，拉

开杠头的塞子，果然淌出了白花花的大米。交通员郭洪传扒开小土堆，取出一只陶瓷缸子，揭开盖子，香气扑鼻，原来是黄橙橙的茶油。当炊事员老黄找到了一缸子盐时，警卫员聳牯又叫了起来：“呵，辣椒、萝卜，还有咸鱼、牛肉干巴呢！”

这些粮、油、菜、盐是哪里来的呢？后来了解，是这么一回事。随着移民并村，搬到山外去的群众同游击队联系不上，也非常着急，就到敌人那里去闹，说我们从山里搬了出来，在山外没有饭吃，没有柴烧，让我们进山去种地打柴。敌人是不会掏腰包养活老百姓的，就不得不答应群众进山。除了在初一、十五“开禁日”，允许群众自由上山打柴外，平日也只好派出队伍押着群众进山。群众就趁机把干粮、食盐、干辣椒、咸鱼、腊肉、报纸和敌人活动的情报，带到深山里，四处一丢。我们得到消息，晚上去一摸，便得到了供给。

这个办法渐渐地被敌人发觉了，敌人对进山群众搜查很严。于是群众又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把挑柴的竹杠的竹节打通，里面装上米、盐和其他食物，然后把这根竹杠丢在山上，下山时另砍一根竹子当竹杠，挑柴回去。

这个办法又被敌人知道了。狡猾的敌人就躲在群众打过柴的地方，伏击游击队。我们吃过亏后，也就特别警觉，一定要看准了才去拿，或者乘机调动部队打他一下。有时，敌人也用丢东西在山里的办法来诱使我们上当，但我们早已从群众那里得到了情报，根本不动他的。过了几天，敌人看看他们丢的东西还在，以为这山没有游击队了，就不

来搜山，我们倒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要是偶尔山上的老虎把敌人丢在那里的东西吃掉，游击队反而非赶紧转移不可。

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粮食，送干菜，而且想方设法为我们送情报，作掩护。

有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封锁一个庄子，挨门挨户地清查，随便捕人。被捕的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知道：在敌人的淫威下，硬是顶住不讲，也许还可以活；如熬刑不过，讲了，讲一个就会追十个，一牵一大串，最后是自己死得更惨，而遭殃的人也更多。因此，就是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打得死去活来，也是不吐半句真情，要死就死一个，决不害共产党。有的儿子被捕了，母亲就给国民党连长送老母鸡，连长收下老母鸡，在母亲身上踢一脚：“滚你妈的。”母亲倚在门坎上哭，哭得连长不耐烦了，骂一句：“他妈的，去，劝劝你的儿子。”儿子被吊在屋梁上，早已被打得半死。母亲一面擦抹着儿子身上的血，一面哽咽着对儿子说：“连长大人要我劝劝你，你要知道好歹，千万别乱讲。”那儿子听了这样的嘱咐，心里明白，更加坚定了。

有时，敌人对靠近山区在他们看来是“最不可靠”的庄子，采用“欲擒故纵”法。敌人知道，在那些庄子里游击队常常出没，却故意不驻一个兵，也不来清查户口。过了几个月，他以为游击队麻痹了，不再警惕了，就突然把那些庄子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的来人。这时群众要通知游击队是来不及的。但群众有的是办法，庄前庄后，庄里庄外，场坝外边，窗户里边，树梢墙头，到处都有群众与游击队

约定的暗号。比如，敌人见到在村头放牛或打猪草的群众，就喝问：“‘土匪’在哪里？”群众说：“不知道。”敌人说：“回去！”群众说：“回去就回去。”群众随手把赶牛的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者把割草的篮子往竹篙上一挂，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不进村了。到了夜晚，群众放哨，也和我们约好了口令。如果国民党的兵来了，答不对我们的口令，群众就故意一面叫喊：“‘土匪’来了！”一面就向他们放土炮、鸟枪。如果国民党要群众带路“搜剿”游击队，群众就故意带错方向。

有时，狡黠的敌人故意蓄着长发，留着长胡子，穿着破烂的衣服，蓬头垢面，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伤兵，在游击队驻地附近或赤白交界区，深更半夜敲老百姓的门：“同志，同志，请开门，我是打散的游击队，讲讲阶级友爱，弄点饭吃吃……。”老百姓要是答了话，开了门，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不过，那时群众的警惕性也很高。对陌生人叫门，固然不答应；就是很熟的人，夜里也不随便开门。只有听出口音，听出是自己人才开门。

有一次，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敌人装扮成游击队，到离我们驻地不远的王老头家喊门。斗争经验丰富的王老头，一听装模作样的喊门声，心里便有底了。他根本不理睬。那些家伙死命地叫了一气，不见开门，就使劲把门打开，擅自闯进屋里来了。他们见了好吃的东西就拿来吃，边吃边说什么他们是经过了多么艰难困苦，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的。

王老头见这光景，心里完全明白了。于是，他就咒骂

起来：“你们是‘土匪’，快给我滚开。要不，我就要去报告国军了。”那些家伙装模作样地说：“不，不！别误会，我们真的是红军。”王老头听了，骂得更凶了。他老婆拿起扫帚，警告那些家伙：“你们快给我滚！再不走，我就要把你们赶出门了。”

厚颜无耻的敌人，挨了一顿臭骂之后，竟窃窃私语，哈哈大笑，还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说：“你们呱呱叫，呱呱叫！……”随后，象狗一样夹着尾巴溜了。老两口倚在门口，指着敌人的背影，愤怒地骂道：“什么呱呱叫，呸！——”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群众舍生忘死地支援游击队的故事是说不完的。群众与游击队的这种情谊，是经受了长久的战火锻炼，决不是偶然的。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里，满怀革命激情，热烈地歌颂了这种骨肉情谊：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第九章 大发展

敌人苦心经营的“大搜山”破产之后，到了六月，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游击区四周的广东国民党军队悄悄撤

走，出现了罕有的平静。

我们派人下山打听，才知道这时发生了“两广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加快了侵华步伐，于一九三五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我冀察两省，进一步暴露其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

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屈辱妥协。他们置深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口口声声叫嚷什么“抗日必先剿共，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加紧其“剿共”的反革命步骤。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抗日救亡的怒潮，一浪高于一浪。

广西桂系军队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军队陈济棠、余汉谋等，利用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联合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围剿”我们游击区的余汉谋第一军，就这样从大余、信丰、南雄等地撤走。

当余汉谋第一军撤走以后，剩下的地方保安团也把脖子缩起来了。豪绅地主由于失去了靠山，一时惊恐万状。

这是赣南形势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的时刻，有一部分同志对“两广事变”的性质认识不清，对陈济棠等抱有幻想。还有少数同志则提出要趁机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搞公开的政权。

项英、陈毅同志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部署新的斗争，召开了有县委负责同志、游击队长、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陈毅同志针对部分同志的思想，说：“革命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发展，

但以后不是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而是要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了。”他反复叮嘱大家，要正确分析掌握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军阀与土豪之间、土豪与土豪之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制订出新的斗争策略，积极开展我们的工作，但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不能动摇，否则是要吃大亏的。

没有多久，“两广事变”被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所瓦解，陈济棠被迫下野，余汉谋被蒋介石收买，投靠了蒋介石。这幕“倒蒋抗日”的闹剧，便烟消云散。原来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一些同志，这才清醒过来。他们说，要不是坚持游击战的方针，革命又要遭受损失。

这个时候，项英、陈毅同志重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混战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并决定发宣言，贴标语，散传单，广泛进行宣传活动，积极开展政治斗争。但有的同志对此提出非议，说：“这样会暴露目标，把敌人引进山来，自找麻烦。”陈毅同志说：“军事行动不管怎样秘密，我们的政治口号一定是公开的、明确的。这样做，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就是了。”

项英同志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以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陈毅同志亲自拟稿，大家抄写，连夜出动，分三路出发去张贴、散发标语和传单。在游击区边缘，我们还突然进入村庄，召集小型会议，向群众展开宣传活动。在白区，标语、传单一直贴到国民党乡公所、联保办事处的门上。一时间，赣县、南康、信丰、大余、南雄和三南等县城和墟镇，都贴有我们的鲜明而又及

时的政治口号，不仅震惊了敌人，而且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这些宣传品，深入到人民的心里，一鼓舞和指导了他们的斗争。特别是边缘地区和白区的群众看了我们的传单、标语，就纷纷议论：“国民党天天讲游击队垮了，其实游击队还在，共产党还在。”

以党的名义、游击队的名义，对重大政治事件发表宣言，表明态度，及时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扩大政治影响，是陈毅同志的一贯主张。他说：“我们到这里来打游击，不是为了逃命，不是消极的保存，而是为了发展。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发展，必须有鲜明的政治目标，深入人心的战斗口号，插一杆红旗在山上。这样做，可以让群众听到共产党的声音，看到共产党的力量，从而能更好地动员和团结群众。游击队的大旗，无论如何不能倒。大旗倒了，就完全变成地下工作了。地下工作不可少，但我们无论如何要保持红军游击队。”后来，陈毅同志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说过：全国抗日战争到来时，共产党在西北有中央红军，有根据地。有根据地，有红军，就有了发言权。加上南方游击队，发言权就更大了。

我们遵照项英和陈毅同志的意见，曾以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在“华北事变”之后，发表了《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告士兵书》等宣言和其他标语、传单，在群众中，在国民党士兵中，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实，明确地表达我们党的主张，鲜明地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旗帜，早在红军主力转移时，陈毅同志就是这样做

的。比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陈毅同志和梁伯台同志就以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副主任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内容是：

白军士兵弟兄	多是工农出身
受了军阀压迫	才来进攻红军
三年离乡背井	永别儿女双亲
残杀自己兄弟	究竟为谁牺牲
修筑马路堡垒	天天辛苦不停
干饭两顿不饱	军饷克扣干净
于今天寒地冻	棉衣还没上身
受尽官长打骂	当作牛马畜牲
可恨国民狗党	代表资本豪绅
出卖满洲华北	半个中国送尽
高叫无力抗日	屠杀革命人民
不管中国灭亡	围攻苏区红军
我苏维埃政府	工农自己政权
工人增加工资	八时工作一天
打倒豪绅地主	农民分地分田
实行反帝抗日	大队已经先遣
野战红军出动	快要对日作战
白军士兵弟兄	莫听军阀欺骗
切勿烧杀抢掠	你我本无仇冤
协同群众游击	大家打成一片
快把枪头掉转	实行暴动兵变
杀死反动官长	加入红军作战

实现自由解放 革命反日分田
工农兵大团结 胜利就在眼前

二

趁广东军阀离开游击区的机会，项英、陈毅同志决定集中部队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

我们把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作了比较大的集中，有时一次集中百把人、二百人，这也打，那也打，到处袭击敌人。信丰的两支游击队合并，集中在潭塘坑，打击反动的保安团。信南的游击队向南雄的马路边缘出击。三南、大龙等地的游击队也都进行了集中。

在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油山游击队集合了两百来人。他们在革命群众的配合下，带着三挺机枪，从小汾出发，在板棚下偷渡章水，半夜包围了池江的国民党区公所和大庙，打了个把小时，就把这个反动据点打得稀里哗啦，生俘自卫队员数十名，缴枪数十支。天亮以前，胜利地回到小汾一带分散隐蔽。

在这前后，这支游击队还夜袭了青龙区公所。他们先向区公所外面的一个饭馆投掷了手榴弹，打开了通路，然后向区公所发起猛烈攻击，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并迅速地撤离了。第二天拂晓，许多人都拥到区公所来看，只见颓垣残壁上还在冒着青烟，有人还以为“红军游击队也用炮了”。接着，这支红军游击队还夜袭了长江、留地等墟镇的国民党区公所。袭击这些区分公所，我们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搞国民党的报纸。果然，经过几次战斗，红

军游击队缴获了不少国民党报纸。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黄道、叶飞、粟裕、刘英、谭余保、傅秋涛等“匪首”“活动猖獗”的消息，知道自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沦于敌手之后，他们仍在各游击区坚持领导游击战争，感到无比快慰。

向南雄水口、里栋、乌径、邓坑等地发起攻击的红军游击队，在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里应外合，迅速地解决了战斗。攻打乌径时，生俘反共自卫团长傅振标。攻打邓坑时，捉到土豪江碧山，他给我们送来了几十匹布、二三十条驳壳枪、大批西药和一笔款子。土豪劣绅爱钱如命，然而他有多大罪恶，自己心中有数，就怕杀头，所以在他们受到惩罚时，宁愿罚款和为我们代办“违禁品”，以求保全性命。

北山一带有个大土豪姓邓，平常为非作歹，作恶多端。他在村前村后筑了两座碉堡，还有几十名团丁防守。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敢在家里睡觉。一天夜里，红军游击队根据群众的报告，悄悄地埋伏在他回家的路上。鸡啼数遍，东方发白，这个大土豪一手揉着惺忪的眼睛，一手挟着条毛毯，从他躲藏的地方往家里跑。当他走近家门口，游击队的枪口对准他时，他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游击队把他带走后，碉堡里胡乱放起枪来。游击队迅速越过了一个小山坡，选择了一块茅草丛生的开阔地，故意踩出一条“路”来，然后，埋伏在“路”的两旁，并留一部分埋伏在坑道口。这个阵势，就象“品”字形。不久，那些团丁追踪来到茅草地，当他们忽然不见游击队的足迹，正在犹豫的时候，

突然枪声大作，这些“饭桶团”被吓得跌跌撞撞没命地跑，跑到坑道口，又遭到埋伏在两旁的游击队的狙击。这次袭击，打死打伤敌人十多名，缴获步枪十七支，游击队员无一伤亡。

北山游击队侦察班长刘燕青，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化装到新镇附近去侦察敌情。他们在地下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把新镇敌人据点的兵力、防守工事和地形摸得清清楚楚。游击队在一个晚上发动了进攻，经过一夜战斗，把敌人赶跑。被迫留下作掩护的三个国民党士兵，也被我们缴了枪，做了俘虏。天色微明，游击队员押着三个俘虏，携带着战利品，胜利地回到了驻地。

陈毅同志亲自审问了这三个俘虏，向他们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说：“你们不要害怕，共产党对俘虏是优待的。只要你们老老实实，我们决不会杀害你们。”接着，陈毅同志让他们在草棚底下坐下来，详细地问了他们是怎样出来当兵？当了几年兵？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村上的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器装备怎么样？等等。最后，陈毅同志对他们说：“你们也是穷人出身，原来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专打土豪劣绅、为穷人闹翻身的，……”陈毅同志当即叫游击队发给每个俘虏三块银元，并向他们宣布：愿回去当兵或者回家种田都可以。

三个俘虏被释放后，除那个矮个子回国民党军队当兵以外，其余两个都回家种田去了。三个月以后，那个矮个子俘虏，带着另一名国民党士兵，挑着两箱子弹，一挺轻机枪，前来北山游击队投诚了。

三南游击队同时也在军事上发动攻势，袭击了社径这个伪保安团的窝子。七月的一个黎明，事先侦察好情况和道路的侦察班长吴少华（“北山事件”后，他奉命带着一个短枪班来到三南游击队），带领十来个游击队员，直奔社径劣绅叶南山的住房，叶南山还没有穿好衣服就被捆了起来。伪联保主任李志坚闻声躲进他的炮阁，放了两炮。在保丁拼命跑到保安中队去报告时，游击队找来木柴，淋上煤油，就点火烧炮阁。那时伪保安中队百余人从背后迂回过来了。吴少华立即枪决了叶南山，然后从容撤离。早已埋伏在鲤鱼山后的游击队杀出掩护，且打且撤，安全地回到了游击中心区。

红军游击队的广泛出动，打击了反动的保安团和地主武装，这对豪绅地主震动很大，在游击队比较活跃的地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几乎全跑光了。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广州，次等的跑到赣州，三等的跑到县城躲了起来。

随着红军游击队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我们的各项工作也进一步从山里推向山外，推向平原，推向城镇，游击区不断扩大。油山、北山、大龙、三南游击区，都向四周伸张，长安、大阿、禾秋、九渡等墟镇，成了我们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

党组织还派人在新城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在赣州开设了一个钮扣厂，作为开辟城市工作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另在于都县城开设了一家裁缝铺，作为我们与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联系的联络点。

这个期间，党组织的建设也取得了进展。在大余油山地区建立了中心区委。梅山区委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成立。彭坑、小汾、圪里和平里，分别成立了党支部。在三南，自中心县委成立以后，相继成立了二十多个党支部，成立了小江中心区委和陂头、龙下两个分区委，以及定南月子光党支部，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各地还分别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积极发挥共青团员的作用。在“两广事变”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游击队也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三

红军游击队的大发展，给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必要，我们这时也有了比较好的条件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刚上油山时，我们的精神食粮十分缺乏。大家身边只有《雇佣劳动与资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国际纲领》、《少共国际纲领》等书籍，几张旧的《红色中华》报以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报刊。大家在行军的时候抢着背，住下的时候抢着读。大家翻来翻去，这些书刊被翻得破破烂烂，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为了解决精神食粮，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指挥机关决定自己动手编教材。那时，项英、陈毅同志都亲自编写了政治、军事和文化教材，如关于形势教育的讲话材料，阶级教育和气节教育的提纲，以及文化课本等，印发给大家学习。记得当时军事政治教材就有十多种，文化课本有五、六册。在政治教材中有：

《群众工作者必读》、《步哨手册》、《反对十大坏现象》、《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

《红色指挥员必读》的内容是：（1）指挥员的职责；（2）共产党十大政纲；（3）红色战士的职责；（4）五大任务（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反动武装，建立苏维埃，创造红军）；（5）五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侵犯群众的利益，打土豪执行阶级路线，爱惜武器同自己的生命一样，不准打人骂人）；（6）十项注意（武器不离身，说话要小心，行军不能掉队，没有勤务不准离开队伍，打土豪要归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搜俘虏的腰包，对同志要友爱）；（7）射击要领；（8）刺杀要领；（9）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

由于叛徒的出卖，共青团信丰县委书记林毓亭同志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逼他交出一支由他保存的枪。他牢记“爱惜武器同自己的生命一样”的纪律，紧紧地咬着牙关，什么也没有讲。最后，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牺牲后，他的妻子按照他生前的嘱咐，从存放地点取出了那支枪，送还给游击队。

文化课本的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和阶级斗争常识等。这样，就把读书识字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了。这些课本，也吸收了游击队员自己创作的一些东西，大家读起来不仅容易懂，而且感到比较亲切。下面这首歌就是战士们自己创作的：

我本是一农民，
各种痛苦都受尽；

今天想起来，
怎能不伤心。
豪绅压迫，
地主剥削到如今，
一天到晚真辛苦，
满身血汗都流尽。
推翻地主阶级，
打倒帝国主义，
要不这样——
永做奴隶，不得翻身。

在深山密林里，歌声飞扬。游击战士的生活，更加生动活泼；游击战士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如钢。

第十章 “两面政权”

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派出嫡系部队四十六师接替粤军，再次向我游击区发起了新的“清剿”。

一九三六年九月，为了部署粉碎敌四十六师的“清剿”，项英、陈毅同志召开干部会，分析形势，研究策略，并作了一个“九月的决议”。决议除要求我们坚决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外，还为我们制订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要我们放手搞“两面政权”。会后，我们在游击区派了

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年纪大的开明人士，去担任保甲长，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两面派”。

信丰黄坑口的共产党员李绍沧，瘦高个子，精明能干，村里群众都叫他“高佬”。敌人搞移民并村时，党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份尚未暴露，便派他随同群众搬到锡坑去住，除了种田，还开了一片小店。国民党保长朱和亭见李绍沧是个买卖人，能说会算，就要他当甲长，组织上也同意了他去干这份差事。

一天，李绍沧到长安墟伪乡公所开会，领到一份“联防清剿条例”。会上，国民党乡长朱勉山咒骂了一通共产党游击队以后，专门责问李绍沧说：“李甲长，怎么你们上面坑内还有人开私会？”李绍沧故作惊讶地说：“没有听说呀！”朱勉山说：“你回去好好查访一下。”李绍沧说：“好，一定照办。”

李绍沧回到村里，连夜召开党的支部会，研究了对策，并派共产党员李绍珠，带着敌人的文件，进山向红军游击队作了汇报。

第二天，国民党开来了一连兵，敌连长要李绍沧带路搜山。李绍沧问：“搜哪座山？”敌连长说：“哪里有土匪就搜哪里。”李绍沧说：“有人报告说青山里猫公寓里发现一个棚子。”敌连长便决定去搜青山里。

李绍沧背起鱼篓在前面引路，把敌人带到青山里，指着一个山窝子说：“那里就是猫公寓。”敌人下到窝子一看，果然见有一个草棚子，棚子周围还杂乱地丢着一些烂锅头、破碗片、烂布条，还有一堆余烬未熄的柴灰。敌连

长连忙命令士兵：“一排从左到右‘包搜’，二排从右向左‘包搜’，三排负责警戒。这次搜山决不许让‘土匪’跑掉。”李绍沧上前说：“连长，我下河沟捞点鱼子，好给弟兄们加菜。”敌连长点头说：“好，你在下面等着。”

敌人搜了老半天，连红军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李绍沧不禁暗自好笑。敌人哪里知道，山窝里的那个场面是当地共产党在头天晚上开会之后连夜布置起来的。

李绍沧堆着笑脸，抚慰敌人说：“红军游击队在山里躲着反正跑不了。该回去吃饭了，明天再搜吧！我在河沟里捉到几条鱼，正好慰劳慰劳兄弟们。”敌连长见天近黄昏，快快地下令回防。

敌人的营部扎在中坝墟，四个连的士兵经常轮番到锡坑一带搜山。李绍沧和敌营长、连长搞得很熟。他们每次下来，他就忙着张罗烧鱼煮肉，殷勤接待。每逢中坝墟日，他还要给营长、连长捎点鱼干山味。敌营长连长经常夸奖说：“李甲长呱呱叫。”

李绍沧常用保甲办事处名义去买红军游击队迫切需要的油盐、药品、电池、纸张等，然后交给群众带到山里去。

后来，他又随移民从锡坑搬回到黄坑口住。在黄坑口，由于叛徒、原信丰县委机关事务长王文阳的告密，他与共产党员李光松均被敌人关押了起来。

敌人在营部审问了他。

敌连长：“李甲长，怎么你也当起‘土匪’来了？”

李绍沧：“我一向安分守己，决不当‘土匪’。”

叛徒王文阳一旁插嘴说：“他跟‘土匪’做过买卖。”

为了出出王文阳的丑，他当场回答说：“事情倒有这么一回。那时你来找我买粮食，我不答应；你就要杀我。我没刀没枪，有什么办法。千怪万怪，都怪我住的地方不好。”

“你知道‘土匪’住的棚子，为什么不报？”王文阳象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又装腔作势地问道。

“你在游击队的时候，并没有把你住的棚子告诉我，我怎么会晓得呢？”李绍沧反问道。

王文阳面红耳赤，一时答不上话来。

李绍沧趁机进逼道：“文阳兄，讲话要凭良心啊！”接着，他转过脸对敌营长说：“我是政府的甲长，游击队怎会把他们住的棚子告诉我呢？”

王文阳还是咬住不放，忿忿地说：“你闻‘匪’不报，违犯‘联防清剿条例’，该当何罪？”

李绍沧也不退让，沉着地回答说：“你不要乱咬人。我报了没有，请在座的连长给我讲句公道话。”

敌连长说：“报了的。李甲长还亲自带领我连兄弟去抄过青山里。”

敌营长见此光景便开脱说：“嗯，李甲长说得有理。这完全是误会，莫怪了！”说罢，叫连长给李甲长开了一张证明，就把他放了。

后来，信丰县委的李绍仁同志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了。党组织要李绍沧出面保释。可是，按照国民党的“联防清剿条例”的规定，保释政治嫌疑犯要有“一保五甲”的

联保，只他一个甲长是不能保的。于是他就同本保保长及一些甲长商量，但他们都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因此，他就与三个担任甲长的共产党员研究决定，由均井坑甲长（共产党员）朱清绪冒充保长朱和亭，请一个进步青年学生充当甲长，东凑西凑，凑足“一保五甲”，然后用块蕃薯刻了个假公章，造好“保释书”，花了几十块大洋，把李绍仁同志从信丰的国民党监狱里保了出来。

二

在赤白交界区，我们根据项英、陈毅同志的意见，主要是搞“黄色村庄”。这是一种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具体做法是，我们依靠群众先把联保主任、保甲长的底子摸清楚，利用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把掌握实权的联保主任或保长孤立起来。然后，在漆黑的夜晚或阴雨天，对他们突然进行“访问”，坐下来同他们谈判，宣传党的政策，晓以利害；给他们讲约法八章：不准危害红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游击队，或打枪让游击队知道，并且不准走漏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当游击队通过屋场时，不得阻止；等游击队走后，可以朝天开枪，好向敌人交代。同时，要他们代购粮食、药品，在限定的时间内送到指定的地点，照价付款。谈判告成时，要他们签字盖章。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浑身颤抖、魂不附体的大人先生们，只好满口答应，乖乖地照办。限定的时间到了，药品、粮食等，一样不差地送到了指定地点，我们也按价付了

钱。这样一来，所谓“通‘匪’、济‘匪’者杀”的命令，也就被丢到茅坑里去了。经过多次工作，这些人有的几乎完全听命于我们，成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派”——皮是国民党的，心属共产党，挂着国民党的牌子，为共产党干事情。

王坑的王保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两面派”。

王坑位于大余县板棚下（游击区）与池江镇（白区）之间，是油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坑，也是板棚下去池江的必经之地。王坑的王保长一向以保护全坑的安全为名，强迫老百姓出钱买枪支弹药，并开设工厂，自造土枪土炮，组织地主反动武装，充当国民党的帮凶。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他主动带路；国民党兵走后，他就叫地主武装封锁交通要道，盘查从游击区到池江去的群众，并经常威胁群众说：见“土匪”来了，不打锣吆呼，要杀你一家子。因此，红军游击队在王坑一带开展工作就感到特别困难。

陈毅同志亲自和我们分析研究了王坑的情况，说：“王坑的群众大部分是向着共产党游击队的，只要我们除掉王保长，或者把他争取成为“两面派”，王坑一带的工作就好开展了。”他决定亲自带几个同志去审问王保长。

一天夜里十一点钟。陈毅同志带了几个游击队员，悄悄地摸进了王坑，敲开了王保长的门。陈毅同志对惊魂未定的王保长说：“王保长，你不是常带国民党兵上山找游击队吗？现在我们主动上门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王保长的嘴皮哆哆嗦嗦，答不上来。陈毅同志当即警告他：“今晚我们游击队是来和你谈判的，你要放聪明点。如果你要耍弄点什么名堂，就别怪我们游击队对不起

你。”

王保长耷拉着脑袋，说：“是，我有罪，……”

于是，陈毅同志在一把木椅子上坐下来，开始了对王保长的审问。陈毅同志问他：你给“剿山”的国民党兵带过几次路？抓过多少老百姓？向老百姓敲诈了多少钱？抢过老百姓多少东西？为什么要组织地主武装，自造土枪土炮？……对这一连串问题，王保长一个也不敢作答。最后，陈毅同志问他：“你够不够死罪？”

王保长听了，“啊！”地大叫一声，瘫倒在地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陈毅同志站了起来，正言厉色地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我们都见过，你这个小小的保长，几支土枪土炮能消灭我们吗？！我问你：你愿死还是愿活？”

王保长叩头如捣大蒜，连声哀求说：“愿活，愿活……”

陈毅同志正告他：“要活的话，必须答应四个条件：

- 一、不准带国民党军队“剿山”；
- 二、游击队员到坑里来，不准打锣吆呼，不准报告；
- 三、游击区群众去池江买东西，不准盘查扣留；
- 四、经常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准有半点掺假。”

陈毅同志每说一条，王保长就答一句：“一定保证”，“一定效劳”。

经过这次审问之后，王保长被迫履行诺言，以后逐渐成了“两面派”，王坑也成了“黄色村庄”。

当然，我们在搞“黄色村庄”时，也遇到了一些极端反

动、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对这些家伙我们也决不客气。象大余梅山的反动保长廖桂山罪行累累，顽固不化，红军游击队就根据群众的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杀掉廖桂山后，游击队即叫群众去向国民党报告，使群众免受牵连。我们把这些最反动的保甲长整掉了一两个，其他保甲长也就规矩些了。

三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山里与平原的消息不通，我们又没有电台，也无法与外面通讯，长期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对全国整个斗争形势就很难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设法继续搞报纸，搞不到自己的报纸，也要搞些敌人的报纸，不管江西的、广东的、香港的报纸都要。

为了搞报纸，我们就把圪里贫农团的人找来，叫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大家认为，报纸本来谁都可以订阅，但我们订就不行，必须找一个具有相当文化水平和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订，才不致引起怀疑。同时，在送报纸时，我们还要能秘密地接上头，把报纸拿到手，送上山。

谁能承担这个任务呢？贫农团提出，黄老拐这个人比较合适。黄老拐名叫黄承祥，他左腿有点毛病，走起路来总是一拐一拐的，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黄老拐。他是圪里保学校的名誉校长，在国民党那边还吃得开，常在大余、池江一带活动。

为了做黄老拐的工作，当即研究了一个方案，由黄克

廷和几个游击队员分头进行准备。

一天下午，黄老拐刚回到家，黄克廷就去请他过来喝酒。黄老拐白天走了点路，感到有些困倦，歪倒在靠椅上，但他一听到请喝酒，顿时眉开眼笑。他假意推让了一番后，就拿起文明棍，一拐一拐地来到了黄克廷的家。

他们喝了一阵子酒，黄老拐有了几分醉意，得意洋洋地扯了黄克廷一把，遮着嘴角说道：“唉！这次到大余，都劝我出任池江区长。本来嘛，为乡梓出力，义不容辞。克廷，你看怎样？哈哈，哈哈！……”

笑声未了，房门突然咿啊一声，闪出二十多个游击队员，手上的短枪咔嚓一声，全上了顶门火。黄老拐被吓得两腿瘫软，手里的酒杯落地，跌得粉碎。他慌张地问：“这，这，这是干什么？”

一个游击队员上前一步，和蔼地说道：“黄先生，惊动你了，请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

黄老拐迭连声说：“是！是！我知道你们好，有什么吩咐，姓黄的一定效劳。”

于是，游击队就同他谈判订报纸的事，他满口答应，并签了字。从此，黄老拐按时给我们送来江西、广东等地的国民党报纸。

报纸到手，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了，敌人内部有些人也是可以利用的。

过了些时候，黄老拐想活动当池江区长，但他有一个强劲的对手，活动得很厉害。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他是有求于人的。为了进一步争取他成为“两面派”，我决定亲

自去和他谈谈，做做工作。

当时，国民党保安团一个连驻扎在圪里保学校，周围岗哨密布，要和黄老拐接头是不容易的。他不便到山里来，也不肯到山里来，因为一旦暴露了，对他对我们都不利，何况他对我们的看法究竟怎样，还值得研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决定出敌不意，到圪里去，突入到敌人心脏里去。

这天晚上，我先派了几个同志潜入圪里，作了必要的布置。然后，我由黄克廷带领向圪里走去。天色很黑，路不好走，好在黄克廷是土生土长的，由他带路，等于长了一双“夜眼”。

我们走到圪里村头一座十多公尺长的木桥上，操着本地方言，一面走，一面讲。敌人的哨兵发现了，喝问道：“口令！”

黄克廷从容地答：“老百姓。”

“干什么的？”

“归来。”

敌人用电筒一照，看了看，放过了。

我们进到圪里，向右一转，躲过敌人第二道岗哨，翻过短墙，跨过两条路，穿过老百姓五、六栋屋，到了黄克廷家。接着就把黄老拐找来，由黄克廷作了介绍。我赞扬了他帮助游击队订报纸、买东西，并鼓励说：“请放心吧，红军游击队的事不会连累别人，但是你也不要暴露目标。为游击队多做些事情，将来总是有好处的，游击队不会亏待你。谁来当池江区长，自然是会有人选择的。”

谈话进行了将近半个小时。游击队员进屋来，要我为已经集合好的二十来个群众讲话。我讲话后，又对黄老拐说：“现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共和卖国的罪行是联系在一起的。谁要蛮干到底，谁就会丧失人心，谁要团结抗日，谁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衷心希望黄先生珍惜和红军游击队的关系，珍惜自己的前途！”

黄老拐是个有社会阅历的人，自然会理解这些话的含义。于是他陪笑说道：“陈先生，常言道：‘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而报’。承先生的栽培，兄弟自然竭尽绵薄，为红军游击队效劳。”

我们回来后，也为黄老拐做些工作，暗中帮黄老拐作点宣传，对他的政敌施加点压力，并公开揭露他的政敌的罪恶，在群众中造成一种舆论。不久，池江进行投票选举时，黄老拐以二十四票对二十三票，险胜了他的政敌，当上了池江区长。

黄老拐当上区长后，见到国民党的官兵喊“老总”，见到红军游击队喊“同志”，两边应付。他对红军游击队不得不履行诺言，为我们作了些掩护。比如上犹有个姓孔的同志在池江被国民党广东军抓去了，黄老拐就代我们去保释出来。国民党军队要搜山，他就对山里赶墟（赶集）的人说：“喂！明天不要乱跑呀，有军队去搜山”。他用这种办法带信给游击队。

我们还派人到池江购买游击队迫切需要的东西。对这，黄老拐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后来，

我们又派黄种的赖信仁同志进池江的胡泰兴布店，以作裁缝为掩护，给红军游击队做联络工作。另外，我们还与池江曹聚隆百货商店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

从此，做“两面派”工作的经验进一步为油山中心区委的干部所接受，他们在平原的工作比以前更加活跃了。

四

在做“两面派”工作的同时，我们还采取“孙行者钻到牛魔王肚皮里去”的战术，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开展兵运工作，到白区去开展工运工作。我们从游击区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强的地方，抽了一些骨干打进敌人的心脏里去，同那里的士兵、工人交朋友、拜弟兄，积极开展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

我们在漂塘坞矿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赤色细胞”在工人群众中不断扩散，矿山几乎到处都有红军游击队的耳目。每当夜幕降临，闪烁的灯火便在矿区漫山游动，使党组织的指示及时传到工人骨干的耳里。以后，不仅许许多多工人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就连那国民党严密控制的矿警队里也有十一个矿警成了我们的人。

在一些驻防的国民党军队里，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我们送情报。这样，国民党军队要到哪里去“清剿”，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可以从容不迫地转移，或乘机伏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而那些国民党军官被打得晕头转向、气急败坏地回到驻地时，红军游击队的宣传品早已摊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

由于有了正确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就能广泛地开展起来。敌人强迫群众在山里修碉堡，红军游击队和党组织就动员群众一拖再拖；在敌人的武力强制下不得不去时，就动员一些老弱和妇女去应付，以延宕时间。等到碉堡快要筑成时，游击队夜里就去把它炸掉。结果是许多地方修了几个月的碉堡，始终没有筑起来，有的仅筑了一半便得停下。敌人毫无办法，最后只得由国民党派军队去筑。

群众对国民党买枪办“民团”的命令，也实行拖延和抗拒。一些地方把“民团”搞起来，游击队设法派人打进去，掌握枪支，使它不为国民党所用。

在这段时间里，红军游击队以一部分力量在游击区内发动群众，而以大部分力量向外出击，转移敌人对游击区的注意力。比如，当敌人进攻游击区时，信丰游击队挺进到河东长演坝一带，建立了新的游击区。北山游击队向广东边境挺进，消灭了一部分“民团”，缴获了一些枪支。后来，南山游击队与北山游击队合编，重新创造了一个新南山游击队。信南游击队向信丰安远边境挺进，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游击队在游击区外的胜利出击，使敌人不得不抽出进攻游击区的军队去追击，而游击队又伺机转回游击区。

在敌人的包围分割之下，我们几个游击区，好象大海里的几个“岛屿”。但是，我们紧紧地依靠基本群众，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同时，又积极去做“两面派”的工作，这样，我们这么几个“岛屿”，就有着人民的海洋作依托，尽管敌人对我们严加封锁，却没有办法把我们困死、

饿死。一九三六年冬天，天气很冷。但防冻的生活必需品，如棉衣、被毯、鞋袜和其它物品，陆续从池江送进山坑。昔日“饥同飞鸟争余粒，倦向丛茅索绣衾”的情景已成过去，出现了人们所料想不到的新局面。

第十一章 梅岭事件

在那漫漫的长夜里，陈毅同志翘首凝望西去长征的红军主力，默默祝祷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的伟大胜利，写了这样一首诗：

微石终能填血海，
大军遥祝渡金沙。
长夜无灯凝望眼，
包胥心事发初华。

这首诗，凝结着他对党和红军多么深厚的感情！他是多么惦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么热切地期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及时得到指示呵！

是的，从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之后到一九三六年秋，我们红军游击队已经在深山密林里转战了两个年头。除了突围前收到党中央的两份电报以外，南方各游击区就一直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项英、陈毅同志与南方其它游击区之间的联系也完全被隔断。

那些日子，陈毅同志与项英同志商量，应当同中央建

立联系，听取中央的指示。他们曾对我说：“要是能派个人到陕北就好了！可是谁能够去陕北呢？有的同志认为和党中央联系，路上危险太大，不能冒险。你和杨尚奎同志对路途又不熟悉。”

在这以前，我知道陈毅同志曾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志，千方百计寻找同党中央联系的途径。可是，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正在这个时候，赣粤边特委内线交通员黄亚光给我们送来了一封机密信。这封信是在敌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写的。信中说：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一个大饭店里会面。大家得到这个讯息，自然都十分高兴。

陈海，原名陈宏，是红六军团长征时的掉队人员。由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流落到大余城郊修马路。一九三五年冬湘赣省委便派他和陈桂华一起，到国民党五十师做兵运工作。他们两人工作不慎，被敌人发觉后逃到了赣南，又通过关系找到信康县委。这时正逢叛徒龚楚窜到赣粤边进行破坏活动，信康县委感到他们两人形迹可疑，就加以扣留审查。后经过考察没有发现叛变行为，就把他们两人释放了。接着又给了他们一笔经费，派他们到余汉谋部队中继续做兵运工作。不久，他们在余汉谋部第一师和第二师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等秘密组织。

一九三六年间，上海的地下党派张斌，红六军团也派吴俊卿到余汉谋部开展兵运工作。陈海、陈桂华跟张斌、吴俊卿接上了头，并直接受他们的领导，而与赣粤边特委

发生横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陈桂华被捕，张斌与吴俊卿逃离余汉谋部，陈海未暴露身份，仍留在白军中做兵运工作，并直接受赣粤边特委的领导。陈海曾几次到特委报告过工作，有时带来一些国民党的报纸刊物。有一次，他说国民党军队生活很苦，怨言很多，有两个连随时可以拉出来。陈毅同志对他说：应该钓大鱼。现在暂不要动，以免打草惊蛇。

这天，收到了陈海寄来的机密信件，陈毅同志真是喜出望外。他怕错过和中央取得联系的机会，决定亲自去一趟。第二天，天麻麻亮，陈毅同志由新担任梅山区委书记的黄占龙同志带路，一同下了梅山。

他们两人穿过莲花梁，到了大余城，决定先到陈海家中探明虚实。他们来到陈海的家门前，只见一个妇女正在洗衣服。黄占龙估计她就是陈海的老婆，便问：“陈海先生在家吗？”她连头也不抬，神气十足地答：“到团部去了。”大余县广启安糖铺，是我们设在大余县城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秘密交通站。陈毅同志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和黄占龙一起，直往广启安糖铺走去。当他们转弯走向糖铺时，只见国民党兵正在那里搜查。于是停住脚步，躲进一家茶馆喝茶。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同志，走近陈毅同志悄悄地说：“陈海叛变了！昨天他带着国民党兵把店里的黄亚光也抓走了。你们快走吧！”

这时，大街已经开始戒严，国民党的士兵正在街上盘查行人。陈毅和黄占龙同志沉着地离开茶馆，穿过一家老百姓的小屋，从小路绕出城去。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他们

出城后便分开走，各自取道回梅山。

二

原来，叛徒陈海把信送出后，便在大余城等候我负责同志下山。他没有等到，便又迫不及待地带着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悄悄地包抄上来，把我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梅山的斋坑包围起来了。

当时，指挥机关的警卫员曾忠山同志正在斋坑的棚子外面执勤放哨。他把注意力放在棚子正面的大道上，没有料到敌人会从后面包抄上来。因此，当他发现敌人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大吼一声：“反动派来了，快走哇！”边喊边举起枪来，一枪撩倒迎面而来的一个敌人，就滚下山逃跑了。这一枪，不仅向棚子里的同志告了警，而且也使敌人吓了一跳，使他们不敢贸然前进。

项英、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警卫员丁上淮、宋生发等同志听到枪声，立即拿起枪冲出棚子，转到一个树木不多，但茅草倒很茂盛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

不巧的是，这时有两个到指挥机关汇报工作的交通员，在棚子附近被敌人拦住了。这两个交通员，男的姓殷，女的叫彭茶妹（我们习惯叫她彭妹子）。老殷是个挺机灵的同志，当敌人用枪刺对准他时，他急忙举起手中的布伞，在敌人眼前虚晃了一下。敌人摸不准他手里到底是什么“武器”，被吓得倒退了几步，老殷趁势转身逃跑，冲出了包围圈。

彭妹子不知道敌人的意向，只顾从山下往山顶上跑，

正好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捉到一个‘土匪婆’啊！”敌人一面嚎叫着，一面对彭妹子拳打脚踢，逼问她：“这山上一共有多少人？”

我躲在茅草丛里，心里有点急，怕她经不起敌人的恐吓，万一说出什么来，那就糟了。

然而，不管敌人怎样骂她、打她、踢她，她始终坚持说：“两个人。”

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她、拷问她：“‘大头子’藏在哪里？”她怒目相向，只字不吐。

敌人恼羞成怒，更加狠命地用拳头揍她，用枪托打她。她朝敌人的脸上唾了一口，狠狠地说道：“我不告诉你。”

后来，她的声音渐渐低微下去……我在草丛里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好象她已昏过去了。

说来有些奇怪，在这方圆不到几百平方米的小山包上，三百多个敌人包抄我们，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搜不到我们。敌军官想出一条毒计，命令士兵在草地上放起一把火，火迎着风势，呼噜呼噜地燃烧起来。谁料天下真有这种巧事，正当万分危急的时候，忽然天上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雷声轰鸣，不一会儿，哗啦哗啦落下了一阵倾盆大雨来，把火苗通通淋灭了。火燃不着，敌人可不甘心，命令士兵继续搜索。直到时近黄昏，这才吹号集合，排队下山。我正要从草丛中往外钻，心里又暗自想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还是小心点。拨开草缝朝外一瞧，真危险！原来他们假装退却，却把队伍埋伏在山脚，要不仔细，可就上当了。敌人在山下呆了一会，看看山上毫无动静，眼看天快黑了，

这才快快地走了。

三

正当敌人往山下撤走时，陈毅同志刚好从大余县城回到梅山来。他还不知道斋坑已经出事，所以，一个人信步走来，不想正撞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一个敌兵抓住他，恶狠狠地说：“老表给我们带路。”他听说叫他带路，心就安了下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支杀气腾腾的队伍就是去捉游击队的，叛徒陈海正领着大队走在后边呢。陈毅同志不慌不忙地推托说：“老总，对不起，我是外地人，路不熟。”那个敌兵瞪着眼睛说：“你不是本地人，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陈毅同志笑着说道：“我是城里的教书先生，到这里来买茶叶。”那个敌兵命令他说：“教书也好，买茶叶也好，先给我们带路。”陈毅同志没有法子，只好往回带路。陈毅同志的沉着，迷惑了敌人。敌军官一听说是“教书先生”，又见他那严肃的神气，不敢有所怠慢，刚好这一带盛产茶叶，说得合情合理，也就相信了，并且对刚才的失礼，还表示了歉意。敌军官为了显示自己也有点学问，便跟假称“教书先生”的陈毅同志攀谈起来。一路上，陈毅同志边走边想，要是叫叛徒陈海赶上来，那就糟了，还是早想办法摆脱为好。等进了一座村子，他忽然捧着肚子叫起痛来。敌兵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肚子痛得厉害，要解大便。”敌兵叫他到路旁的茅厕里去。过了很久，敌兵不见他出来，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便钻进茅厕里去看，原来，陈毅同志早已跑掉了。

陈毅同志逃离敌军，躲进了树丛。他见一队队国民党兵从山里往大余城的方向撤，便在树丛里观察了好一阵子，见敌人真的远去了，才摸回斋坑那个棚子来。他见棚子已被敌人糟踏得不成样子，东西也被抢劫一空，便走出棚子，在附近看了一下，估计藏有我们的同志，便自言自语，高声地说道：

“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

他说了几遍，却没有人答应。

于是，他又一个个地呼喊着重英、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几个警卫员的名字。

他怕敌人折返回来，焦急地说：“难道都转移了吗？不可能吧！我老刘的口音，你们也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这时，陈毅同志的警卫员宋生发同志对首长的形象已经完全辨认出来了，便从草丛里钻了出来，迎了过去。随后，我们几个人也都从草丛里钻了出来，先后来到陈毅同志的跟前。我们彼此紧紧地握手，热情地问这问那，真比阔别多年的亲人还要亲啊！在那严酷战争的环境里，我们同受风吹雨打、蛰伏草丛之苦，同历生死的严峻考验，遇险之后，幸又重逢，真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尽我们内心的喜悦啊！

天黑了。树林里仿佛笼罩上一层层厚厚的绒幕。陈毅同志向我们讲了他进城经过和回来时的遭遇。我们也同他讲了敌人包抄棚子时的情景。接着，大家分析了情况，估

计敌人还会回来，决定马上离开斋坑。大家一口气走了三十多里路，才在斋坑北边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果然，敌人又开来大队人马，重新把斋坑包围起来。他们放出猎犬，到处寻踪；他们打探照灯，四野照射；他们还乱打枪，乱喊乱叫，为自己壮胆。这一切，我们在对面的山上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虽然相隔三十多里路，但实际上山与山之间的直线距离并没有多远。我们听了敌人疯狂的嚎叫都觉得好笑。有的同志说：“要不是老刘同志及时回来，催着我们赶快离开斋坑，我们恐怕早被敌人包围在里面出不来了。”有的说：“要不是老天下大雨把火淋灭，我们也被烧死在里面了。”陈毅同志风趣地说：“这真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就在这天晚上，曾忠山同志也摸到我们隐蔽的地方来了。原来，他在白天打了一枪，擦倒一个敌人，滚下山沟之后，敌人就拚命地追他。敌人为了“捉活的”，没有朝他开枪。可是敌人追了半天，却不见了他的踪影，悻悻地走了。他脱离危险后，摸到附近一个老百姓的家里躲了起来。随后，他向那个老百姓买了一把砍柴刀，装作砍柴人出来寻找游击队，终于在山上同我们碰到一块了。

第二天早上，那个突围而出的交通员老殷同志也找到了我们。大家都为他们两人的安全归来而高兴。

但是，彭妹子被敌人打成重伤之后，抬到大余城去了。后来我们打听到，她被关进监狱，备受敌人的拷打和毒刑。这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女共产党员、红军游击战士，始终没有在敌人的淫威之下屈服。

彭妹子原是南雄的农村妇女，个子高大，机智勇敢，革命警惕性高。她既是交通员，又是炊事员。她常在深更半夜只身穿过深山密林执行任务，从未出过差错。当时我们红军游击队里有不少象彭妹子这样英勇顽强的女同志，她们经过战火的锻炼，已由一个普通农村妇女逐步成长为坚强的女战士。她们是平凡的，然而，在她们身上却洋溢着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彭妹子牺牲了，她的精神不死！

我们在山上隐蔽了一天一晚，一无米，二无锅，什么也没有吃的。曾忠山同志拿出他在他躲藏过的那个老百姓那里买来的五、六两米，让大家吃。本来他只买了一升米，而他自己已吃了一餐，所以只剩下这么一点米了。这五、六两米，真是比珍珠还要贵重啊！我们用一只压扁了的搪瓷口缸当“锅”，大家一边轮流做饭，一边站岗放哨。这时，每个人早已饥肠辘辘，饿得发慌。可是，谁也不愿多吃一口。五、六两米，八、九个人吃了一“餐”还没有吃完，最后把剩下的，连同沟边采来的苦菜叶熬成了“稀饭”。那些“稀饭”的饭粒粘在苦菜叶上，被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一下子都吃光了。陈毅同志笑着对大家说：“别小看这几粒米，它胜过一支人参呢！”

敌人先后调集了四个营的兵力，把梅山团团围了二十多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我们忍饥耐寒，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把草鞋都磨穿了。

就在我们梅山被围、九死一生之际，身带伤病的陈毅同志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激励着革命的诗情喷薄而出。

他日夜伏在丛莽间，写下了他那豪气入云的“绝笔”：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梅岭三章》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是激励我们为真理而冲锋陷阵的战斗号角。它壮怀激烈，唱出了陈毅同志坚贞不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共产主义情操。“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就是说，生要持枪跃马，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奋斗不息，即使化为雄鬼，还要高举革命的旌旗，踏平阎王的森罗宝殿！这种视死如归，虽死犹生的精神，多么崇高，何等可贵！“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就是说，现在个人牺牲了，但共产主义事业是必然要胜利的。陈毅同志在自料必死、万般危急的景况当中所表现出来那种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决不是偶

然的，它根植于坚信共产主义的伟大抱负。

四

红军游击队并没有因“梅岭事件”而受到大的损失。但是，这一事件说明，敌人时时刻刻都在想搞垮我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从而搞垮整个红军游击队。

事后查明，“梅岭事件”与“北山事件”一样，都是叛徒龚楚、何长林等一手阴谋策划的。

原来，有一天，我地下工作人员李品仙到南雄的里栋采购药品和食盐，不巧被叛徒何长林发现，何对他多方进行威胁利诱，要他带人捉拿项英、陈毅同志，如果干成了可以得到重赏。毫无骨气的李品仙叛变了，当场供出了在敌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敌人连夜把陈海抓起来，贪生怕死的陈海也叛变了，供出了我们在大余开“糖铺”做内线交通的黄亚光。随后敌人又诱捕了黄亚光。黄亚光把所掌握的我指挥机关的一切情况向敌人告了密。于是大叛徒龚楚、何长林和陈海之流，为敌四十六师师长出谋策划，设下了骗取我领导同志到大余城碰面的阴险圈套；同时，敌人还派密探对梅山斋坑附近的地形作了详细的侦察，作好武装包抄我指挥机关的准备。然后又派了四个营的兵力，在梅岭周围搜抄，妄图把我们一举消灭。但是，在机警而坚强的战士面前，敌人的卑鄙阴谋又彻底破产了。

“梅岭事件”以后，我们的指挥机关就更加注意隐蔽，总是设在最偏僻的地方，设在敌人最不容易找到的深山峻岭中。同时，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也进一步作了改进。

第十二章 突 变

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早晨，敌四十六师突然从游击区的周围撤走了。地方反动武装也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动弹，敌人仿佛面临世界末日，一片惊慌与混乱。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派人下山打听，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抓起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象春风一样迅速吹遍了赣南地区。

许多游击队员和群众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满面笑容地说：“蒋该死被抓起来了！这个卖国反共的罪魁祸首应该赶快杀掉，用他的血来向全国人民谢罪。”有的认为：“捉了蒋介石，全国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下我们也该下山，打个痛快了。”

可是，过了不久蒋介石被释放了。同志们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的说：“张、杨到底玩的是什么鬼把戏？”“岂不是放虎归山？”这些言谈反映了大家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十年血海深仇，也反映了有些同志不能从整个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去分析观察问题。

后来，我们从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比较详细的报道，才逐步弄清了事实真象。原来张、杨是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以极大的爱国

主义热忱，果断地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南京国民党政府内的亲日派何应钦，企图以讨伐张、杨为名，扩大内战，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民族存亡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说服了张、杨释放蒋介石，使“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以粉碎亲日派卖国投降扩大内战的阴谋，促使全国走上对日抗战的道路。

在这个时局转换的重要时刻，项英、陈毅同志在油山召开了各游击区负责干部会议。

项英同志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及意义，文章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继续开展就要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

陈毅同志在负责干部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说：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反动派依旧要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我们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他要求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积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二

果然，“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惊魂初定，就违反诺言，下达密令：“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

灭共方之武装及地方组织。”

接着，蒋介石调集了大批国民党军队对南方各省游击队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其中，以反动军阀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剿共”总司令，率领十几个师的主力部队，向闽浙皖赣边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围攻；继续以国民党第四十六师进攻赣粤边游击区；以第五十师进攻湘鄂赣游击区。他们又一次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人民抗日的力量。

因此，“西安事变”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内战虽已停止，而南方各省游击区面临的形势不是趋向缓和，而是顿时显得更加紧张了。

国民党四十六师先后向赣粤边发起了两次大的进攻。

第一次，敌人采取篦梳式的搜山战术，逐山逐坑地搜索，然后放火烧山，烧不完的乔木林，就强迫群众砍光。发现可疑的山窝，敌人往往以一连人下山窝搜抄，一连人埋伏在山上，还有一连人在山口堵截。有时敌人把部队开到山里，假装搜抄两下，就把一部分部队开走，留下大部分埋伏起来，制造假象以迷惑游击队。后来又搞分区“清剿”，真是挖空心思，不择手段。

敌人的这些花招，全被我们识破了。在项英、陈毅同志指挥下，我们采取避实就虚、避强攻弱的战术，把大部分兵力向游击区外出击转移；一部分同志在上乐、大湾里、坑口和大余一带，领导群众击退敌人的进攻。红军游击队还派人到白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仓救荒斗争。开始是要求发还征收的粮食，要地主免息贷米，以后发展到抢

仓库积谷，抢地主的粮食，打击了敌人的统治，支持了红军游击队。

敌人的这一次大的进攻，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在敌人集中兵力进攻油山、南康、赣县一带的时候，北山、南山和南雄等地的游击队趁机积极活动，打击反动的民团和豪绅地主，筹得了一大批款项，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

敌人并不甘心于失败。不久，敌四十六师向赣粤边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敌人估计我红军游击队主力已转移到信南、信康、康赣三个游击区，便采用全面搜查、重点“清剿”的办法，妄图最后消灭我红军游击队。敌人还把我游击区划为三个“绥靖区”，每个区配备一部分正规军，配合保安团和地方武装，并胁迫群众带四十天的伙食费，协同正规军对我实行重点“清剿”。

我们从一个国民党保长那里，得到了敌人的这个新的“清剿”计划，当即制定了对策。具体部署是：

通知各县委和各游击队，化整为零，由集中到分散；领导同志尽量分开，用打圈子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敌人集中时的空隙，迅速转移；各分队尽量不互相往来，以保守秘密；交通往来，避开大路和小路，在山里走草径，遇到水沟，则在山涧里走，以确保安全；

准备好四十天的粮食，白天不许生火，夜间做好第二天的熟食；

在发动和组织进步群众侦察敌情的同时，做好争取落

后群众的工作，使敌人失掉耳目；

命令信南游击队向外线出击，挺进到龙南、全南、定南和安远边界，吸引敌人；北山游击队向大余、南雄边界积极行动，以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

在党员和游击队员中，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斗争的信心与决心，同时继续开展反叛徒斗争，纯洁内部。

在我们积极进行部署时，敌人对信南、康赣、信康三个游击区的分区“绥靖”、“清剿”开始了。其中以对信南游击区的“清剿”最为猛烈。他们与我们指挥机关的联系也完全被切断。

敌人对康赣游击区集中进攻了大龙地区。这时，大龙地区的游击队已转移到北山。坚持在大龙游击区的党组织和地下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在敌人进攻时化整为零，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紧密结合，白天分散隐蔽，或回家生产，晚上集中打击敌人。敌人对我捉摸不定，就日夜埋伏，侦察我之活动。由于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掩护，敌人什么也没有捞着。

在这次分区“绥靖”、“清剿”中，敌人没有到油山和北山。活跃在这两个游击区的游击队，抓住时机打土匪，毙民团，捉土豪，筹经费，战果累累。北山游击队还与南河、白云、天仙洞一带的群众恢复了联系，扩大了游击区。

敌四十六师发起的这次进攻，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这一时期，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已遍及全国，党的团结抗战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南方

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和群众，在已有反“清剿”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加坚决的斗争，我们终于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而斗争又最残酷的岁月。

三

在迎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刻，激起了我们对过去三年中光荣牺牲的先烈们的无比的怀念。

瞿秋白、何叔衡、阮啸仙、贺昌、刘伯坚、李天柱等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优秀干部，是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或被捕后英勇就义的；蔡会文同志是到达湘南桂东一带以后在作战中牺牲的；李乐天、曾彪、叶明魁和曾纪才等同志，也是在战场上牺牲的。直到今天，他们的光辉形象和音容笑貌，还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蔡会文同志在长岭会议后，率领部队到崇义、上犹地区，向湘南桂东一带发展。此后，他便与我们失去联系。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以后才听说他已经牺牲。至于他是怎样牺牲的，由于消息阻塞，无法弄准确。我当时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湘南桂东一带，动摇分子红四团团团长李宗保和团政委邝珠权，相继叛变投敌。蔡会文同志便和赣粤边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同志一起，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十月，部队在桂东小水山桃树窝一带，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突围中，蔡会文同志亲率警卫班首先渡河，不幸牺牲。方维夏同志也在山田被叛徒杀害。噩耗传来，大家悲痛万分，都为失去象他们这样优秀的指挥员和领导干部

而痛惜。特别是蔡会文同志，他与我突围上油山时，同生死共命运，历尽千难万险。他的牺牲，更激起我的无限哀思。他对党忠心耿耿，指挥作战英勇果断沉着，他还能诗善文，文学造诣很深，他那崇高的英雄形象，永远值得我们景仰。蔡会文同志牺牲后，留下的部队在王赤同志领导下继续斗争，直到抗日战争开始。

蔡会文同志是湖南攸县山田村人。他年轻英俊，机智勇敢，文武双全。据说，他在山田小学读书时，老师出了一篇作文题目：《我的家乡》。他从小目睹村里豪绅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一直为之愤愤不平，便在这篇作文里，写下了如下诗句：

有山又有田，
地名叫山田。
农民做牛马，
豪绅象神仙。
同生一块地，
贫富两重天。
何时能平均？
我要问苍天！

老师认为他很有文才，便为他取名：会文。

蔡会文同志从小就向往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随后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连的党代表。一九三〇年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二年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和红八军政治委员；一

九三四年任赣南军区司令员。

“西安事变”以后，我指挥机关考虑到三南地区的斗争特别艰苦，便派李乐天同志带着游击队小队长“猛张飞”和一个管理员、两个交通员，前去三南指导工作。他们到达雄信公路封锁线时，见公路上时有敌人巡逻，公路两边的群众都被敌人逼走。他们三番四次设法通过封锁线，都没有成功。最后冒了极大的危险，在崇仙、焦山一带越过公路，进入三南。他们到达三南地区后，一直没有能够与党的地下交通站和红军游击队联系上，便在山上住下来。住了四、五天，随带的干粮也吃光了，李乐天同志派警卫员下山，到小河附近弄饭吃，不幸被国民党保长发现，敌人便在小河一带布置了暗探。第二天，当他和随行人员下山时，被敌人包围起来。最后被压在一个小屋场里。为了集中火力突出包围圈，他们用手榴弹开路，冲上屋场后面的高山。在战斗中李乐天的脚负了重伤。“猛张飞”等几位同志竭力掩护他，且战且退，奋勇朝山上爬。因为伤势很重，流血过多，行动困难，敌人又渐渐地逼近了，李乐天就坚决地命令随行人员不要管他，赶快走。随行人员哪里肯听，坚持要背着他一起走。当敌人快要冲到跟前时，他毅然甩开警卫员，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转移，自己单独与敌人周旋。这时，陆续冲上来的敌人足足有一个连，把他团团围困在里面。最后，李乐天同志击毙了冲上来的几个敌人，自己也英勇地牺牲了。

李乐天同志是广东南雄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共赣南特委领导的武装暴动，任游击大队负责人。一九三一年后，一直领导赣粤边游击大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他又立下了许多新的战功，受到了同志们的热烈爱戴。

当李乐天同志遇难的噩耗传到游击队时，他的爱人、女游击队员吴丙秀（少共队员）抹了抹眼泪，对她的战友陈妹子说：“姐姐，你们不要替我难过，我挺得住的。我们南雄有首山歌：‘砍了竹子有竹笋，拗了笋子有竹根’。只要把游击战争坚持下去，总有出头的日子。”吴丙秀同志曾与我们一起，在大余的小汾一带打游击，饱经战火的考验而愈战愈坚强。吴丙秀与我同年，都是丙辰年生的。她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取名“丙秀”。一九三七年四月的一个晚上，当她和油山中心区委书记丁祖诒、游击战士吕新洪、孔炳生等四位同志，在小汾开展工作时，住在一个姓黄的老百姓家里。天未破晓，从南雄来的“铲共团”突然包围了小汾，挨家搜查，吊打群众。吴丙秀等四人生怕连累群众，急忙从屋后的一个菜园突围。当吴丙秀翻越菜园的围墙，朝一条田塍奔跑时，被蜂涌而来的敌人拦住，当场惨遭杀害。所幸她是在围墙外被敌人拦住的，因此，她住过的那个姓黄的老百姓家没有受到牵连。这就避免留给敌人迫害群众的借口。

李乐天同志的亲密战友叶明魁同志，也是在“西安事变”以后，敌人对大余一带大举“绥靖”、“清剿”时牺牲的。

叶明魁同志是大余边境工作组组长，他在留地附近开展工作时，给敌人的便衣拦住了。有个叛徒认得他，便大叫：“他就是叶明魁，我们天天要捉他，今天送上门来，决不能放过他！”叶明魁随即掏出手枪，与敌人交火，且战且退，退到一条很深的水沟里，继续抵抗。叶明魁同志一连打死了几个敌人，自己也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西安事变”以后，在粉碎四十六师的进攻中，曾彪同志也光荣地献出了生命。那是一九三七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他带着一支游击队袭击池江西北丫山脚的国民党保安团。当他举手抓住树萼欲翻过保安团的院墙时，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手背上的动脉管，流血不止，连夜抬回蕉萍，第二天就牺牲了。在游击战争中，为了防止枪支丢失，我们在每支驳壳枪上都系着一根粗粗的保险带，持枪者就把保险带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曾彪同志的驳壳枪柄被敌人的子弹打歪时，手枪还一直吊挂在他的脖子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曾彪同志一直同我一起在油山地区战斗。他身体魁伟，性格刚直，待人和气，打起仗来很勇敢。油山地区的群众都晓得他的名字，尊称他为“曾爷爷”。他的牺牲，使群众深为痛惜。

原代英县委书记、后任大龙中心区委书记的曾纪才同志，更是特别使人怀念。他在大龙这一带，英勇善战，著有声威。因敌人指名捉他，领导上准备把他调离大龙区。正在这个时候，他不幸被叛徒出卖了。敌人审讯他时，他

说：“不用问了，我就是曾纪才。”敌人问他大龙区还有多少游击队员？他说：“数不清。”敌人进一步逼供时，他怒不可遏，大声说：“问什么，我抓住你，绝不多问。”以后，敌人一再严刑拷打，而忠心耿耿，铁骨铮铮的曾纪才同志，始终未吐一字。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曾纪才同志受“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历尽千辛万苦。但他的革命志气并未稍懈，也不因此对组织有一丝半点的埋怨。在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他沿途讨饭，千方百计地去找组织。他和项英、陈毅同志会合以后，欣然接受新的使命，协助他们突出重围上油山。到达油山以后，我经常听到他在大龙区领导群众和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他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子弟兵，革命战士的好榜样！

革命先烈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事业。他们用鲜血谱写的光辉业绩，永垂不朽！

第十三章 谈 判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了。

我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有关芦沟桥事变的报道时，情不自禁地欢呼抗日的号炮响了。同时，我们也注意

到国民党继续和日寇明里暗里在搞“谈判”，估计蒋介石向日寇妥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从坚持游击战争转变到迎接抗日的新局面？怎样从以军事斗争为重心，转变到以政治斗争为重心呢？我们象久旱盼甘霖似地渴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到了七月底，我们终于通过同情者的手，取得了一些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项英、陈毅同志仔细地阅读着，一心想从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寻找党的指示。读着读着，陈毅同志忽然高兴地拍起手来，说道：“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

原来在一本叫做《新学识》的进步杂志里，有一篇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日，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曾经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愿意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的方针等四项条件，换取国民党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开始“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我们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快三年了。现在，总算是间接地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指示，真是如获至宝。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迎接这一缕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里透射过来的阳光，努力领会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

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精神，项英、陈毅同志与我们一起，认真地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并以项英同志的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必须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原则，即在特区和红军中党的领导权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的争取。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上面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谈判；必须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力求公开半公开地开展群众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并争取其中的领导权。此后，我们的工作即转向抗日，并把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在这个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过渡的战略转变关头，陈毅同志写的《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把他那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表达得十分生动、鲜明。

十年争战后，
国共合作又。
回念旧时人，
潸然泪沾袖。

抗日是中心，
民主能自救。

坚定勉吾侪，
莫作陈独秀。

这首词的上半阙，是对已经过去的十年内战的回顾，着力谴责国民党内战政策和屠杀政策造成的空前悲剧。词的下半阙，是对刚刚到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指出在实行战略转移的时候，既要反对那种不愿放弃土地革命的口号，甚至把国共合作抗日说成是“阶级投降”的错误，又要防止那种以为合作抗日之后就没有阶级斗争，对于国民党可能危害抗日的行为丧失警惕性，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造成第二次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陈毅同志对我们提出的这个告诫，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多么发人深省呀！

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发表了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要求：与国民政府合作，一致抗日；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抗日义勇军，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等等。

为了使更多的人接受党的正确主张，我们在根据地内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进剿’游击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我们用书信形式把这些宣言和口号寄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四十六师师部，以及国民党的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政府，寄给当地上层社会人士。还把这些口号写在竹片上、木板上，插在交通要道上，或投入大江小河中，使它流到赣州等地。广泛的政治宣传，使我党所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日益深入

人心，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不热烈拥护；就是那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开明士绅，读了抗日义勇军的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也赞叹说：“共产党真是大仁大义”！

但是，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却借此大造谣言，颠倒黑白，说什么抗日义勇军要“归顺”他们，并卑鄙地发出信件，要义勇军的负责人出来“自新”，要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队，不愿去的可以回家种田，等等。一些反动豪绅地主也乘机大造谣言，污蔑义勇军，挑拨义勇军与群众的关系。

我们坚决地回击了敌人的造谣污蔑；严厉地斥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违反两党合作的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严正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义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全国抗战怒潮汹涌澎湃，国民党才被迫实行抗战，被迫承认共产党组织和抗日义勇军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军队也开始陆续从游击区周围撤走。

在这种情况下，项英、陈毅同志决定发一个“快邮代电”给国民党大余县长。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决定停止军事活动，希望国民党也停止对游击区进攻。大余县长对我派去送信的同志“盛情款待”，并马上写了回信，希望游击队能派一个负责同志去谈判。

不久，项英、陈毅同志就在池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上召开了赣粤边区干部大会。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对由“反

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在思想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会后，各地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让义勇军开赴前线去”的口号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搞得热火朝天。

接着，国民党四十六师，国民党大余、南康、南雄、信丰等县县长被迫联署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说：“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一时腔调大变。

项英、陈毅同志当即提出了扩大影响，将南方各游击区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以与北上红军主力南北呼应的正确主张。陈毅同志还说，我们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是要谈的，要“舌战群儒”，不要缩手缩脚，但是也不能失去警惕性。

于是，我们一面积极扩大部队，壮大抗日的力量；一面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时，抗日义勇军的武装宣传队，到大墟镇以至县城城郊开展宣传活动，影响很大。

二

八月下旬，陈毅同志作为我方代表，到大余县城与国民党县长谈判。当他到达县城时，各界群众在东山门外夹道欢迎。他们高呼“欢迎共产党代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等口号，情绪十分热烈。国民党人士也挤在欢迎的人群里，而且不得不显得殷勤的样

子。

在谈判开始的时候，陈毅同志就向大余县长提出：“我是来看形势的，不能发表更多的意见。南方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大余县长满口应承，还连连说：“你们来好了！老实说，全江西只有八个保安团，江西是你们的了”。

但是，在这种“好意”后面，却射来了暗箭。第二天，国民党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显眼的消息，将合作抗日的谈判诬蔑为“油山共匪投诚”。

对国民党的这种两面派手法，陈毅同志当场提出严正抗议，说：“是谈判就来，投诚不干。”

大余县县长说：“陈先生，对不起，这是官样文章，是做样子给英美看的。说是‘投诚’，实际上是合作。”还说：“这是县党部干的，国民党搞的就是这一套。”

既然是国民党县党部搞的，陈毅同志即表示愿意与县党部谈谈。说：“三民主义难道可以口是心非，装样子取媚英美帝国主义吗？！”

那位县长听了，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跟他们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跟这有什么关系？”

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还有一个肖司令。当陈毅同志在谈判桌上提出要他们马上停止冲突，并给游击队以交通方便，以联合南方各游击队时，那个肖司令话中带刺地说：“陈先生，江西除了八个保安团，这里还有不少兵。”陈毅同志针锋相对地说：“我知道。现在抗日了，你们手里这

些兵和保安团，算什么呢，要是再打我们，那就成了汉奸。”那个肖司令听了，无言以对，狼狈不堪。

经过陈毅同志的据理斗争，国民党报纸终于改变口气，作了较为正确的报道，说陈毅同志是代表共产党“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但大余县县长对陈毅同志所提的条件却不敢作主，请陈毅同志到赣州与省政府的代表谈。

于是，陈毅同志又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四十六师的代表谈判。

当陈毅同志到达赣州时，全城到处出现油印的宣传品：“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目前该党代表陈毅莅临，赣南民众热烈欢迎”。

这天，赣州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当陈毅同志一下车子，人群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军乐队还奏起了欢迎的乐曲。陈毅同志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

早在一九三五年初，当我们突围到油山不久，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陈毅同志曾作过这样的预言：“抗日战争必然要爆发。……将来国民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合作抗日，倒是可能的。”三年前的预言，这时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历史的发展证明，陈毅同志真不愧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赣州的谈判中，我方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但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党的领导权，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

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另外，在谈判前要求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报告南方游击队的情况。国民党则提出什么：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停止打土豪，等待改编等条件。国民党四十六师代表、师政治部主任，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同志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

他慌乱地说：“对不起，这不是兄弟的意思。我们中央党部的文件指示我们这样讲的。”

陈毅同志愤怒地站了起来，义正严辞地说：“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

那个家伙连忙表示歉意说：“是，是，很对，很对。”

谈判告一段落，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宴会。在酒席上，那些国民党官员七嘴八舌，要陈毅同志谈谈下山以后的感想，陈毅同志说：“没有什么感想，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二千；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的花红涨价了，涨到五万。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从五万元跌到三万元，后来又跌到了二百元。你们出二百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陈毅同志对国民党的彻底揭露和无情讽刺，把国民党官员们弄得

面面相觑，一迭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国民党地方当局否定国共合作的阴谋被揭穿了，赣州谈判获得初步胜利。双方达成协议：游击队按我方提出的办法，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其他问题，国民党当局只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并且担保可以解决。但我方要求公开打电报给党中央，他们却借口什么“国际关系”而加以拒绝，继续阻挠我们南方游击队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是他们对所达成的协议，却始终不敢向群众公布。

在赣州谈判期间，大叛徒、原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妄图拉拢陈毅同志。他一再诡辩说，他是环境所迫，没有办法才走这条路的。接着，更荒谬地说：“现在我们总算走到一块来了，只不过我比你早来了一步。中国搞共产主义，还远不是那个时候。”陈毅同志听了，怀着满腔怒火，拍案痛斥了这个叛变革命、出卖灵魂的无耻之徒，并严正表明：“我是代表共产党来和国民党谈判的……”陈洪时只得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

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改编为抗日队伍的问题，项英同志于九月底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在南昌，项英同志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等文件。当大家读到这些文件时，心潮起伏，热泪盈眶。我们就象一度失去了娘的孩子，重新回到慈母的怀抱那样，感到无比温暖。

南昌谈判，解决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

义勇军等。不久，游击区四周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一些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也陆续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三

在项英、陈毅同志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期间，南方八省大部分游击区也从报刊上了解到我党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觉察到了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因而积极设法掌握新的情况，研究政策，与各地国民党地方当局先后开始了实现停战、合作抗日的谈判。

但是，国民党对谈判是没有诚意的。他们或者以“谈判”掩护它的军事进攻；或者诱我下山加以消灭；或者企图把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保安团，进而吃掉我们；或者企图利用叛徒来“招抚”收编红军游击队；再不就是利用谈判，要红军游击队停止活动，不发给军饷而又禁止红军游击队筹款等等，总之，国民党就是企图以谈判为手段，实现其“清剿”中未能实现的消灭我红军游击队的目的。因此，与国民党的停战谈判，就成了一场极为复杂、尖锐的斗争。

当时，大多数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在谈判中坚持了党的原则，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同时，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可是，也有少数游击区在谈判过程中，警惕性不高或对新形势认识不足，以致遭到了一些损失或者是走了一些弯路。

从坚持游击战争到迎接抗日高潮，这又是一个大转变时期。在这个转折的时候，我们既要警惕国民党利用谈判消灭游击队的阴谋，也要同其他错误倾向作斗争。记得当时有的同志以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甚至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陈毅同志及时提醒大家说：“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他还说：“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期合作’。三年五年是‘长期’，三个月五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

第十四章 集中

一

南昌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同志先去南京，后赴延安。陈毅同志到南方其他游击区联系游击队集中整训和下山等事宜。赣粤边游击区由杨尚奎同志和我负责集中整训部队、扩大部队和准备物资，待命开赴抗日前线。

我们在集中训练部队时，始终保持革命警惕性，坚持独立地靠山近水扎营的办法。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油山和北山地区的游击队，先后下山，在信丰县的潭塘坑集中。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部队逐步进到平原的边缘，但仍不驻县城和墟镇，而是驻在大余的圪里、板棚下

和池江一带的农村里。这里背靠油山，面对章水，进退方便。同时，为了防止意外，还在从板棚下到池江一线，同国民党驻军接近的地方划一条非军事线，规定双方都不得驻兵。

在部队集中整训时，战士们对改编部队，改变番号，换发军装，在思想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我记得有的战士见到发下国民党的军衣军帽，真是一肚子火，说：“‘五角星’（指红军的五星帽徽）同‘十二角星’（指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打了十年仗。现在要我们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谁愿意呢！”有的还说：“我们红军制服就是再破再烂，穿着心里舒服，感到光荣，我就是打赤膊也不穿国民党的那‘黄狗皮’。”经过我们耐心的说服教育，战士们才勉强换上国民党军装，流着眼泪把为之奋斗多年的红星帽珍贵地打在包袱里。是的，我们虽然换了军服，改了番号，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意志是永远不变的。并且也正是为着这个目标的实现而光荣地走上抗日前线，承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任。

二

北山与油山的游击队在集中整训时，三南的游击队还在那里作战。我按照项英、陈毅同志临走前交代的任务，先到三南去联络部队。我和乌径区委书记肖信明、交通员游高连等同志，拿着项英、陈毅同志写的介绍信，去找国民党大余县长。大余县长派了个秘书陪我们一同到南雄，下榻于岭南茶楼。

在那里，我们同国民党南雄县县长和驻军师长进行了商谈。我当面揭穿他们违反停战协议、消灭三南游击队的阴谋；要他们停止“清剿”，保证三南游击队安全地开到集中地点。国民党县长理屈词穷，不得不接受我们的主张，在我们到三南地区去寻找游击队时，答应给以方便。

我们三人从乌径出发，翻越崇山峻岭，到达新龙时，天色已经不早，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随后，肖信明同志就出去打听游击队的消息。他见到国民党保安队的院子里绑着一个妇女，便向附近一个铺子的老板探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老板说：“是梅三子的老婆。”肖信明又问：“她犯了什么罪？”老板说：“她老公当红军。”肖信明听了十分气愤，回来跟我谈了这个情况。我立即去找保安队交涉。开始，那个保安队长盛气凌人，横蛮无理，不肯释放。我严正警告他：无理扣押红军家属，是违背国共合作协定的，我要打电话找你们的师长追究责任。那个队长听了着慌起来，马上换了一副笑脸，恳求说：“陈先生，请不要打电话，我放人就是了，马上就放。”

任意关押和屠杀红军游击队及其家属，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别情况。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封锁，许多地方都还不知道国共停战的消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寻找三南游击队的过程中，沿途开展宣传工作。我们写了好些标语和传单，到墟镇上张贴，宣传联合抗日的主张，以扩大我政治影响。

我们在南雄没有找到游击队，后来还是从一个国民党乡长的嘴里，得到了一点关于游击队已转移到陂头去的消

息。于是，我们就转到陂头去找。

游击队究竟在哪个山头呢？我们几乎跑遍了陂头的各个村庄，都没有打听到结果。正在焦急的时候，肖信明发现有个向群众买菜的人很面熟，上前一看，原来是三南游击队事务长张三木同志。肖信明高兴地问他，部队在哪里？张事务长推说不知道。肖信明把他引到我们住的屋里，我对他说，现在国共两党已经合作，项英、陈毅同志派我来找你们，把部队带下山整训，准备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张事务长回到山上，向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同志作了报告。张日清同志问：“他们可带有证明？”他说：“没有。”张日清同志想：“我虽认识阿丕同志，但他没有带来一个字，空口无凭。何况我们分别已两年多了，他今天究竟是……”游击队几个负责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再派张事务长带两个战士来探明虚实，并索取证件。我即把《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文件和一张《抗日义勇军进行曲》交给张事务长，并向他详细讲解了全国革命的新形势。后来，张事务长就来带我们去到杨梅石游击驻地，会见了张日清同志。我把项英、陈毅同志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他。他看到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喜悦的晶莹泪珠夺眶而出。在这一刹那间，同志的革命情谊，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传达到我们的心坎里。

我在杨梅石住了两天，同他们谈了当前形势及项英、陈毅同志下山谈判的情况，要他们集中部队休整，准备整编抗日，并要他们把捉来的土豪全部释放，枪也归还。他们听了感到耳目为之一新，并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政策。不久，三南游击队在张日清等同志率领下，开到池江整训。

三

在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时，常常遇到国民党的阴谋诡计。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项英、陈毅同志在池江时，红军游击队派彭胜标同志到池江向他们汇报工作。他们随即作了指示。彭提出要求说，我回去传达党的抗日救国的指示，怕讲不清楚，同志们听了可能不相信，最好派个代表去传达一下。项英、陈毅同志研究了彭胜标的意见，决定派我到瑞金向闽赣边坚持战斗在红都——瑞金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传达。

我一到瑞金，就去拜会国民党县长，把项英、陈毅同志写的介绍信交给他。从国民党县政府出来，刚在一家旅馆住下，国民党保安大队的一个军官，挂着三角皮带，腰别手枪，到旅馆求见。一见面，他自我介绍了一番，也讲了几句赞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话，还对我到瑞金联系红军游击队表示欢迎。接着，他就心怀鬼胎地提出，要我告诉瑞金的游击队快快下山，和他们一起合作抗日。我立即觉察到他们是企图借机吃掉游击队，又见他神色中露出威胁之意，便正色地回答说：根据项英、陈毅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达成的协议，你们有义务为我提供方便，及时与瑞金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我是奉项英、陈毅之命而来，瑞金红军游击队的行动，当然只能听命于项

英、陈毅。这个国民党保安大队军官，用含着敌意的言语和我争辩起来。恰好这时那个国民党县长到旅馆看我，见此情景，连忙对我说：“陈先生，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又当我的面训斥了那个军官两句，那个军官灰溜溜地走掉了。事情很清楚，那个军官分明是国民党县长派来试探我的；后来，国民党县长又以回拜为名，出来打了个圆场。他们串演的这幕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的双簧丑剧，就这样收场了。

第二天，在瑞金党组织的帮助下，我进山到达闽赣边游击根据地驻地，见到了瑞金县委书记胡荣佳同志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钟德胜、彭胜标和张开荆等同志，他们和我紧紧地握手，对项英、陈毅同志派我来同他们联系，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兴奋。他们认为，三年来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斗争与整个党的斗争是紧紧联在一起的。

我到达游击根据地的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传开。游击队员们纷纷拥到司令部向我热情问候，探听消息，其中就有来自我的家乡——福建长汀县南阳的同志，倍感亲切。在洋溢着胜利喜悦的欢聚中，我向大家讲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一些指示精神，传达了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这时，战士们个个欢欣若狂，跳着、笑着，流着热泪，唱起了当时瑞金流传的一首民歌：“黄田府，粟坑县，白竹寨是金銮殿。白竹寨上飘红旗，白军到处受我歼。”

我从山上下来，途经瑞金县城时，国民党县长得知我是长汀人，劝我坐汽车回汀州城看看，还说可以保证我的安全。我考虑我已完成了传达的任务，应当赶快回去向组

织汇报；同时，我想起那个国民党保安大队军官居心叵测的那番话语，便断然谢绝国民党县长的“好意”，赶快回到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地点。

当我回到赣粤边不久，一支由王赤同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从桂东开到池江整训。

四

赣粤边和闽赣边各路游击队分批来到池江以后，除继续进行整顿和扩编外，还派出宣传队，四出开展党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每逢池江的墟日，杨尚奎同志还亲自到街头演讲。

我们还趁此机会，派人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联络那里的党员，恢复党的关系，组织红色战士归队。在赣州、瑞金、于都、兴国、吉安、泰和、万安等地，还陆续建立了地下工作阵地。

赣粤边游击区和赣南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看到自己的子弟兵下了山，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池江探望。其中，有刚刚出狱的光荣战士，有亡命在外一直在寻找组织的共产党员，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隐藏下来的党员干部，有饱尝辛酸的烈士家属。他们远道来到池江，就象儿女回到久别的母亲怀抱一样，多么高兴啊！游击区的群众，老老少少，更是象走亲戚一样，带着吃的东西，来到池江探望亲人，表达他们的心意。

这时，池江上空，抗日义勇军的鲜红旗帜迎风飘扬。章水两岸，嘹亮激越的歌声伴着滔滔的江水欢唱。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义勇军。”游击区的群众热烈响应党的抗日救国的号召，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纷纷动员亲人参加义勇军。我在信丰、大余等地亲眼看到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赣粤边的群众纷纷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障碍，加入了义勇军。在短短几个月内，部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多。

一九三八年初，我们与其他兄弟游击队一起，正式编入了新四军，待命北上抗日。

第十五章 下山

一

芦沟桥战场的隆隆炮声，震撼祖国大地；上海战场的抗日浪潮，席卷亿万神州。在我们赣粤边游击队集中整训的那些日子里，坚持战斗在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分别通过谈判，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积极准备下山，奔赴抗日前线。

但当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有些游击队领导者的认识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不善于抓住机会放手扩充力量，壮大自己。加上各游击区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隔绝之下，因此接关系也非常困难，以致在实现南昌停战协定上，步调一时难以一致。

为了正确贯彻中央指示，全面地执行停战协定，组织各路游击队下山，项英、陈毅同志做了大量联系和说服教

育工作。陈毅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湘赣边等游击区，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亲自向他们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他同我谈起他在湘赣边进行工作的那一段曲折经历，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

湘赣边游击队是一支很坚强的游击队。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他们受到了十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与“清剿”。一九三五年三月，在一次同国民党军队的激烈战斗中，湘赣边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同志光荣地牺牲了。由于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跑到国民党那里当“湘赣边区招抚员”去了，这时整个部队几乎垮掉。在这个危急关头，立场坚定、勇敢刚毅的谭余保同志挺身而出，集合了失散的同志，组成湘赣临时省委、湘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和湘赣边游击司令部。他在成立大会上愤怒地谴责了陈洪时的叛变行径，庄严地宣誓说：“湘赣边区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建立的根据地，树在这里的红旗决不能倒！”

他们以武功山为依托，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并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扩大了游击区。但是，国民党消灭游击队的贼心不死，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还集中了十几个团进攻湘赣边主力所在地——九龙山地区。因此，他们对敌人利用软硬两手消灭游击队的阴谋，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守卫在九龙山一个山口哨位上的战士，突然向连部发出了发生紧急情况的信号。

接着，一乘四人抬着的轿子朝着山口走来，轿子左右前后还跟着轮替抬轿的轿夫和国民党卫兵。山口哨位上的

同志们严阵以待，警惕地注视着。

“站住！”游击队员厉声地命令着。

轿子在哨位旁边停住了，从轿里从容走出一位英姿焕发、气宇轩昂的人来。他头戴一顶博士帽，身穿一套中山装，脚登一双黑皮鞋，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墨色太阳镜。他仪表端庄，举止潇洒。

游击战士看到这位不寻常的来客，拉动枪栓，大声喝问：

“你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干什么的？”

“从吉安来。”他平静地回答。

“到哪里去？”游击队员们又是一声喝问。

来人摘下墨镜，把游击队员们打量了一番，微笑着说：“找谭余保同志。”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游击队员，名片正中印着“陈毅”两字，旁边一行小字是：“四川乐至”。

接着，陈毅同志对游击队员说：“请带我到谭余保同志那里去好吗？”

当时，国共已经合作，陈毅同志为了安全上山，特意作这身打扮，并由国民党卫兵出面护送，沿途还可以省得麻烦。

陈毅同志交付了轿夫的工钱，打发轿夫和国民党卫兵回去，然后随游击队员们上了山。

到了山上，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同志接待了他。

一封由项英同志具名的介绍信，摆在松树做成的桌

上。信上写着：特派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国共合作事宜。

他们看过介绍信后，半信半疑，而项英同志的签具又是事实。段焕竞和刘培善同志没了主意。“要提高警惕”这几个字，又不时在他们头脑里盘旋。

就在两个月前，有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联络员到了山上。这个家伙走后不久，接着就来了大批国民党军队“清剿”游击队。多么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啊！而陈毅同志又是这副装束，贸然上山。这不能不使他们产生怀疑和特别警惕。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会沿着陈毅同志上山的路线又来搜山。因此，部队当晚加强了戒备，并把陈毅同志转移到另外一个山头上。

陈毅同志向他们讲解当时的国内形势，逐条地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彻底战胜日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现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矛盾已经超过了阶级矛盾。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坚持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

他们听了，觉得有理，但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又觉得和他们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屯驻着国民党军队，怎能轻易下山呢？

他们向陈毅同志要证据，他没有。问他为什么一个人来，他说，多带人太危险。而他又劝游击队：一、停止打仗；二、整训改编军队。

可是，当时湘赣省委却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

可改编。

这样，大家就更不信陈毅同志是代表党，而怀疑他是叛徒。

陈毅同志说：“你们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对我的怀疑和所提的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你们的这种革命警觉性，是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也是对的。但是，你们不能只凭一时的怀疑去做结论。”

大家坚持要陈毅同志交代叛党的经过。因为不久以前报纸上登过“江西省共产党首领陈毅投诚”的消息。他们还要陈毅同志把他这次“勾结”敌人进攻湘赣边的经过讲出来，以得到宽大处理。

陈毅同志反问他们：“反动派的报纸你们也相信吗?!”

段焕竞和刘培善同志连夜召开会议，讨论了陈毅同志提出整训改编的问题，认为事关重大，遂决定把陈毅同志送到省委，请谭余保同志亲自处理。

他们把陈毅同志从九龙山送到甘子山临时省委住的棚子里。不久，陈毅同志就被捆了起来，吊在竹棚子的这一边，而竹棚子的那一边，省委正在研究怎样处理他。彼此只隔一道竹墙，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见。陈毅同志听到棚子那边省委决定要杀他时，他在棚子这边就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棚子四周坐满了人，就象要公审犯人一样。

谭余保同志从竹棚一边走出来时，大家对他肃然起敬。

陈毅同志见他身佩驳壳枪，头戴红军帽，手里拿着根

竹根做的长烟管，就开口问道：“你就是谭余保同志吗？”

“谁是你的同志？我知道你早叛变了！”谭余保同志答。

“我是代表党来的。”

“你代表哪个党？代表国民党？”

“我是陈毅。”

“我早晓得你的名字。嘿，你在井冈山那个时候，集合队伍讲话，我拖个梭标来听你讲，从猴子讲到人，从天上讲到地下，从井冈山讲到全世界，一讲几个钟头，讲得头头是道。你过去讲的话，你自己还记得吗？”

“我讲什么啊！”

“讲革命。就是要革命，不要投机嘛！可你现在怎么样！你要不供出怎么投降蒋介石的，就要杀头！”

“你抗不抗日？”陈毅同志反问道。

“我抗日，马上可以抗日。”谭余保同志答。

“你愿意抗日就好办！”陈毅同志感到高兴的是，他和谭余保同志之间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抗日”。

谭余保同志接着说：“不过，要我抗日，得有个条件：恢复井冈山八县的根据地。”

陈毅同志说：“你们何见之浅也。同志哥啊，你就只看到那八个县。今天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要争取领导权，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全中国都是我们的，不只井冈山那八个县。”

“这个还讲得有理。但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口号很奇怪。只有阶级斗争，哪有阶级合作？只有‘苏维埃救中国’，怎么可以取消苏维埃？”谭余保同志进一步提

出问题。

“过去提的‘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是对的。现在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的矛盾下降了，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高于一切。因此，我们已用‘抗日救国’这个口号来代替‘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我们要实行国共合作，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陈毅同志作了明确的解释。

“我们历来讲阶级斗争，你却讲阶级合作。你就是第二国际，就是叛徒。我们历来讲‘苏维埃救中国’，你却要取消苏维埃，这就是要灭亡中国。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你却要把军队拉出给蒋介石改编。”谭余保同志忍不住抽出烟管，要打陈毅同志的脑壳：“你是个叛徒。”

“改编红军，取得给养，红军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对我们更有利。革命的阶段不同了，就要有新的策略来适应新的形势。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陈毅同志进一步阐述了党的主张。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道理多。可敌人一来，你们就带起队伍跑了，逃跑就是机会主义。平常你东一指示，西一指示。可这三年，你一条指示也没有！”谭余保同志显得有些生气了。

陈毅同志声明，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以后，他先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转移到赣粤边打游击，并没有逃跑。并说：“我讲的这些政策，是党中央的决定，还是个人的意见，你可以派人下山看一看。你有意见，可以向中央讲。现在，叶剑英同志在武汉，项英同志在南昌，……”

“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

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谭余保同志的情绪相当激动，一时竟说漏了嘴。

陈毅同志抓住这个机会，以高屋建瓴之势，侃侃而谈：“你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我非常佩服。骂我叛徒，我也不见怪。你们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很难突然接受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讲项英、叶剑英派来的，你不管，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也要抓起来。谭余保同志，你已经离开党的原则立场了。”接着，陈毅同志面向大家，郑重地说：“你们大家坚持游击战争是应该的，当土匪就不能干！谭余保，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就枪毙我。枪毙吧！”

“好家伙，这只叛徒还满硬呐！”谭余保同志说罢哈哈大笑，接着，他命令马上把陈毅同志押走：“不许叛徒在这里宣传机会主义理论。”

在这之后，谭余保同志又和陈毅同志谈过几次话，逐渐感到对陈毅同志的怀疑未必妥当。为了搞清事实真相，他决定派出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等地了解情况。

交通员带着陈毅同志的亲笔信到吉安找新四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向他讲解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明确表示陈毅同志是代表党上山联络的。交通员一听，立即背起半麻袋的《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等文件，连夜回山。

谭余保同志听了交通员的汇报，看了党中央的文件，

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同志松绑，抱歉地说：“你来这里四天四夜了，真对不起。”随后，他拉着陈毅同志的手，热泪纵横，亲切地说：“今天终于见到亲人了。自从任弼时、王震、肖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湘赣边区出发长征以后，彭辉明同志牺牲了，陈洪时又叛变了，我们留在这里，很难支持这个局面，请你不要见怪。”

陈毅同志坦然地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我脾气不好，请你不要见怪。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要赶快下山。”

谭余保这个农民领袖，感情很纯真。他和陈毅同志促膝谈心，讲他们怎么起义，怎么上山，怎么隐蔽，怎么发展，一讲就讲到天亮。

第二天，湘赣临时省委开会，请陈毅同志作指示。陈毅同志说：“你们下山后要抓住时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是抗日爱国的就欢迎。”临时省委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

不久，湘赣边游击健儿，告别了掩埋着战友的坟墓，走出了掩护他们坚持斗争的武功山、九龙山、武里山、牛心山、甘子山、杨梅山等深山密林，奔向指定的集中地点——莲花县的龙上村。

后来，谭余保同志曾对我说：“陈毅同志那次到湘赣边来，我们那样对待他，他从不计较。”陈毅同志对谭余保同志的感情也很深厚，他也曾对我说：“谭余保这个人本质很好，我对他是很尊敬的。他是一个很好的游击战争领导

者。‘七大’时我们在一起开会，他还向我提起在湘赣边的那次误会，说对不起我。我说没什么，都是为了党嘛！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你们怀疑我也是很自然的。”

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风格，何等宽广的胸怀！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当受到委屈时，是悻悻然，斤斤计较，不可终日呢？还是坦荡荡，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团结起来向前看呢？这的确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二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国民党接受了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坚持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安徽和河南等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要求，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军部开始设在南昌，后来转移到皖南。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司令员	陈毅
副司令员	傅秋涛
第二支队司令员	张鼎丞
副司令员	粟裕
第三支队司令员	张云逸（兼）
副司令员	谭震林
第四支队司令员	高敬亭

新四军的成立，标志着南方各游击队的斗争，由游击战争转入抗日救国的新阶段。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局为此发表了《告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

南方八省的各红军游击队热烈响应中央分局的号召，纷纷开赴指定地点集合，编入了新四军。除了我们赣粤边游击区外，尚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同志领导的闽西游击区；黄道、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领导的闽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粟裕、刘英等同志领导的浙南游击区；赖昌作、钟德胜、胡荣佳、彭胜标、张开荆等同志领导的闽赣边游击区；谭余保、曾开福、段焕竞、刘培善同志领导的湘赣边游击区；傅秋涛、徐彦刚、严图阁、涂正坤、钟期光、江渭清、谭启龙等同志领导的湘鄂赣边游击区；关英、李步新、王丰庆、刘毓标等同志领导的赣东北游击区；以及闽南游击区、湘南边游击区、鄂豫皖边游击区、桐柏山游击区和琼崖游击区（根据国共谈判协议，琼崖区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队）。

随后，新四军在南昌成立办事处，由黄道同志负责。并在吉安、贵溪、瑞金、平江、修水、婺源、都昌、袁州、赣州、大余以及池江等地，相继成立新四军留守处或通讯处，留下了一些领导干部和武装，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保持前后方联络，抚慰革命烈属军属及保卫群众既得利益。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一万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在千千万万的群众送别声中，高唱着战歌，开赴抗日前线。当我们离开战斗了一千个日日夜夜的赣粤边时，我伫立在章水之滨，回首仰望那经过战火洗礼的油山，青松挺立，朝霞似锦，更显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新四军到达抗日前线以后，党中央书记兼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从桂林经衡阳、南昌，辗转到了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住了二十天，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后 记

南方各省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无畏、勇于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是三年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只有有了党在遵义会议上确立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的英雄气概，才能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而在实现党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正确领导中，还要特别指出的，陈毅同志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善于把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来，正确地估计各个时期的革命形势，制订了适应当时斗争环境的革命方式和斗争策略。他是三年游击战争中巍然屹立的南天一柱，是我们游击战士的革命楷模。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南方各省的革命根据地被占领，被切断，使得我们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但是，我们战斗在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对南方各省其他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一直非常关心。每当我们从报纸上

得到各兄弟游击区的消息时，大家都特别关切。我们曾为他们的每一次胜利而欢呼雀跃，也曾为他们面临的艰险局面而耽心。他们的斗争与胜利，都是对我们赣粤边的鼓舞与支持。当然，我们赣粤边的斗争与胜利，也是与党领导下的全国一盘棋的胜利分不开的。

今天，当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重温三年游击战争的这段历史，发扬当年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也是推动我整理这篇回忆录的契机。然而，我当时年纪很轻，一直都是在赣粤边战斗，我亲身的经历毕竟有限，我所了解的情况也只是局部的。而且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的许多印象，如今有的已记忆不清。因此，今天要把当年无限丰富生动的斗争经验、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比较全面周详地写出来，对我来说是难于胜任的。好在项英、陈毅等同志生前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都作过好几次重要的讲话；南方八省的省委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对三年游击战争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当年的战友们也写了不少的回忆文章。所有这些，对我都是很有启发的，对整理成这篇回忆录也是很有帮助的。谭震林同志又专为它写了一篇序。我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我的深切谢忱，并由衷地欢迎当年的战友和广大的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陈丕显

一九八一年八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春 改定

（此稿内部刊登后，另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二)

七、遵义会议前后

(1935年初)

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于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有议论，酝酿着不满。记得早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同志就曾对我说，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可见他也是早有意见的，他后来能支持毛主席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因为负过较重的伤，身体很不好，在长征的行军途中，只得每天坐担架，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在行军休息和宿营时，经常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问题。经过不断交谈，王稼祥同志赞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随后他又同张闻天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大家都支持毛主席的主张。张闻天同志早对李德有意见，周恩来、朱德同志本来就很尊重毛主席，当然也是支持的。加之党内军内普遍感觉到中央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所以在长征行军途中，已为后来的遵义会议作了思想

准备，毛主席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是偶然的。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胜利攻占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公馆的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和朱德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分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会未开完就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没有及时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过程中，因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日常事务，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议前后共开了四、五次。开会的具体日期，我的印象是在一月十二日左右。一月十五日有份电报说，彭德怀同志已回前方，会议仍在进行。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一月八日，我看很可能是一月十八日之误。因为一月八日部队刚进遵义，中央领导机关一月九日才进城。还没有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会议开始还是由博

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象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会议的内容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重点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揭露了军事教条主义的危害。会议的主报告是博古作的，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一向谦虚，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毛主席稍后作了重要发言。通常他总是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这次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主席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

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志也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也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他又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别人的发言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他曾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确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干将。他在会上实际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他基本是一言不发。聂荣臻同志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别的同志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会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坐在他旁边，他完全象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

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还把烤火盆也踢翻了，把桌子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撤离遵义以后，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议结束后，对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已经作出结论了，改组中央领导的决议，也已向部队传达。倒有一个人，最后还坚持错误的立场，力图为“左”倾错误辩护，就是凯丰同志。他在会上态度就不够好，会后我又曾听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同志虽然有错误，但他的态度还是照顾大局的。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当时中央是有几担装有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

挑子)还是要交出去。

在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撤销了中央的军事顾问职权，一月十九日撤出遵义，我还同他在一起。他自己提出要求跟一军团行动，中央同意后我随他到了一军团，过了桐梓，又继续前进。这时林彪同李德虽然不再多接触了，但李德要求到一军团来，显然还是对林彪感兴趣的。林彪交代军团管理科一个大个子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每到宿营地，那个科长总是亲自为李德号房子，在最适中 safest 的地点挑比较好的房子给他住。部队打土豪得来的东西，也给他提供最好的一份。但是他的情绪已经很不好了。第二次进遵义时，有一回我去他屋里，见他桌上摆了一堆核桃，还有把小锤子，看来他自己刚刚敲了吃的，我也就随便敲了一个吃起来。谁知道他正肚子里有气无处发泄，突然拿我出气道：“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跟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真叫人哭笑不得。后来我被调到三军团工作，有一回司令部得到一些炼乳、咖啡和香烟等，杨尚昆同志叫我送些给李德，我真的送了些给他，他一见又说我真是个好人的，没有忘了他。他自己当初动辄骂人训人，好象倒都忘了。

在以后的长征途中，我还遇见李德几次。过草地张国焘搞分裂后，有一回，原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同毛泽东等同志争吵，他要拉人随张国焘南下，我和李德也在场。据说李德当时也是反对南下的，不过我看他未必是出于拥护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而是希望尽快北上，好靠近苏联，重新接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李德随中央红军一起长

征到陕北，在那里帮助训练过骑兵。一九三六年十月，斯诺到保安访问过他，他对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判和撤销他军事顾问职权，仍然是不满和一肚子牢骚。那时中央分配李德到红军大学讲战役学，周恩来同志指定我再去为他当翻译，我当时很不乐意，对周恩来同志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再也不愿当李德的翻译了。”周恩来同志苦口婆心地对我作说服工作，最后我遵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我同李德又共了一段事，对我们过去的愉快关系，也就不计较了。

一九三九年夏，我党送李德自延安经兰州返回苏联。正好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处长，负责接送并具体安排他回苏联。他乘周恩来同志到苏联治病的飞机同机到达兰州。将他接到办事处后，我立即同苏联驻兰州的代表机构联系，将李德的情况向苏联同志作了介绍，请他们负责下一步安排，送李德回苏联去。苏联代表也已得到通知，接手安排他回国。我在兰州同他作了最后的告别。他一九三二年来到我国，当时才三十多岁，在我国活动六年多，其中同我共事就近两年，我亲眼看到了他最神气和最失意时的样子。现在要同他正式分手了，本应该相互作些表示，但是他的情绪十分消沉。他大概想到自己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到中国工作几年，却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回去无法交代，心情的确是沉重的。临别时，我带点讽刺地对他说：“祝你回苏联以后，能走好运，一切顺利。”他听了只是苦笑一下而已。据说他回苏联以后，斯大林批评了他，他不再“官运亨通”了，被派到出版社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他被送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度担任过东德的文联主席之类的职务，还曾出版过一本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回忆录，书名叫《中国记事》。书中内容完全是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的，继续坚持并宣扬“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我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可见他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我们来说，这倒是一本难得的反面教材。应该指出的是，他在一九六四年以后直到一九七三年写成此书，完全是为着反华大合唱的需要。为此，我曾撰文对李德进行了批驳，发表在《红旗》一九八一年二十一期上。

我在为李德作翻译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同王稼祥、张闻天和博古同志也有过较多的接触。我同他们认识较早，一九二五年曾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同船去苏联，并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博古还比我们晚一年到中山大学。我对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在中山大学时，就是活跃分子。他们的英文底子都很好，张闻天同志还曾留学到过美国，王稼祥同志是教会中学毕业的，也上过大学。到中山大学后他们又特别用功，体育活动、文娱活动都很少参加。这一点我同他们不一样，我从小就喜欢体育活动，所以大凡有同校外的比赛，我都要参加。这就不如他们读的书多了，所以他们很快掌握了俄文，成为翻译，后来还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博古是一九二六年底到中山大学的，他这人活跃得很，他一来，就到处听到他的声音。他也有些英文底子，掌握俄文也比较快，他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比起来，不

象他们那样较稳健，有学者风度，而是锋芒毕露，处处表现出政治活动家的味道。他在中山大学时就是这样，后来当了中央负责人，直到遵义会议以前，他都是这个样子。

尽管博古等同志在中山大学时曾参与了王明的教条宗派，回国后又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但是他们都较快地认识和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服从了党的决议，为人是正派的。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的品德也是应该肯定的。毛主席说过：王稼祥同志是第一个从教条宗派中脱离出来的，他在促进遵义会议的召开，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方面是有功的。张闻天同志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博古同志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也是端正的。延安办的《解放日报》，博古任总编辑，他写的社论、文章，很好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民主革命中，在新中国创建以后，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他们的贡献，所以在我们的历史上，仍然应该有他们的适当位置。

八、长征途中

(1935年)

第二次占领遵义以后，我被调到三军团工作，并被任命为军团副参谋长。当时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参谋长是叶剑英。作战科长是李天佑，他原来是师长，因为部队缩编，调上来当科长，是保存干部的性质。司令部还有个管理科，科长是胡里光，副科长是唐延杰，他也在苏

联学习过，回国后在长沙工作时被捕，部队打长沙时才把他从监狱里解救出来，党籍还没有恢复。彭德怀同志讲过：他未恢复党籍，分配工作就有些困难，只好让他先和管理科当副科长，解决了党籍就好分配了。当时我对自己的职务安排心里很不安。对于彭德怀同志，我一直是抱尊敬的态度，让我来当军团的副参谋长，觉得能力不够，总想做点更实际的低一级的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向杨尚昆同志谈了，他说已经确定了，还是好好工作吧！也许领导上考虑的是我的资历，工作也是具体的参谋工作。彭德怀同志对我是比较欢迎的，其中也可能多少有点迷信，认为我是留苏的学生，懂得总要多一点。和他直接相处后，他留给我的几点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他是真正的艰苦朴素；第二，作战有办法，而不只是一般的勇敢；第三，爱护干部，有的同志犯了错误，他常常是狠狠地批一顿，但是批完就拉倒，从来不记恨，因此挨过他批评的人也不恨他，相反还很感激他；第四，为人正直，原则性强。对下级他是比较接近群众的，对上级他又是敢提不同意见的。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写了意见书，提出不同意见，坚持了原则；但是他对毛主席是尊重的，有感情的。在苏区时毛主席送给他两本列宁的书，一本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主席在书上都题了字，签了名。彭德怀同志很珍惜这两本书，长征时一直带着看，到吴起镇以前精简文件时，被参谋人员不小心烧掉了，彭德怀同志很惋惜，他一度认为是我给他烧掉的，解放以后碰到我他还

说：“你这个老伍，把毛主席送给我的两本书也给烧了。”

遵义会议以后，彭德怀同志指挥的三军团，忠实积极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部队在乌江打了个胜仗，接着出贵州，进云南。抢渡金沙江时，部队奉命在皎平渡下游几十里处的驿江渡架桥，派我到执行架桥任务的十三团，团长是彭雪枫，政委是甘渭汉，我作为军团副参谋长去协助架桥工作。金沙江南岸是一片陡坡，江宽流急，架桥器材又很缺乏，部队把绑腿解开拧起来当绳子用，但是一架到江心器材就被冲跑，架不成桥，反复搞了多次都没有成功。正在着急的时候，接到军团部命令停止架桥。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把部队从江边撤下来，刚休息了一会儿，吃了饭，又接到命令，军团所属各部队，改前卫为后卫，星夜赶到皎平渡过江。黄昏时开始急行军，由于天黑路窄，加之部队连日架桥，疲惫不堪，指战员们三三五五掉下队来，躺在路边休息，一倒下就睡着了。我带着几名通讯员沿途动员，鼓励掉队人员追部队，自己当然更不能停，又要行军，又要不断工作，搞得特别疲劳。拂晓前，我们终于赶到了皎平渡口。当时别的部队已经过完，指定我负责指挥后续部队渡江。记得那时只剩七条船，每船一趟只能乘十人，天上还有敌人飞机骚扰。靠渡口的东面，有一段丘陵地带，部队在那里隐蔽待命。渡口处有一块小沙滩，部队由此分批循序上船。一批送过后，下一批接着准备登船，登船的动作要迅速准确，时间愈短愈好，我是最后一批渡过江去的。

过了金沙江到达宿营地，司令部为我安排了个好房

子，大概是一家地主的，还有绷子床。我先来了一顿饱餐，又睡了一大觉。随即部队进驻到会理地区，并准备进攻会理城。防守的敌人是川军一个旅。会理南面是一片开阔地，我们准备用军团的工兵部队挖坑道炸城，并选在东北方向以居民点为掩护，进行坑道作业。我和李天佑同志共同负责督促检查坑道作业的工兵部队。大约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认为坑道已经挖好，炸药也装好了，立即调了军团的三个主力团攻城：一个主力团为突击队，两个团为第二线后续部队。一切布置就绪，军团首长也到达了指挥位置。可是发起战斗时，坑道内炸药不足，一炸一阵烟，城墙没有被掀开，爆炸没有成功。部队上不去，只得撤下来，进行休息整顿。

几天后，部队从会理经西昌北进。一军团夺下泸定桥，三军团部队及时赶到，桥上已铺了木板。过桥后见泸定县城内完全是一片战争景象，商店和民房都关了门，老百姓很少。部队继续向天全、芦山前进，在那里筹款备粮，准备过雪山。上山前在山下的金汤镇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开始过雪山。我这时没有马匹，身体又很虚弱，只有个警卫员和我一起走。一清早我们就动身翻山，开始时路还好走，不太陡，也比较宽，部队几路纵队往前赶，谁有力量谁往前走。走了不久我就落在后面了，虽然不是最后，但是大部队已经过去。快到山顶时就更困难了，警卫员同我相依为命，用数步子的办法来鼓励自己。开始时说走一百步就休息，走一下数一步，走到整整一百步，就停下喘几口气，接着再数着走一百步。以后，一百步也坚持不下去

了，改成走五十步休息一次。后来又改为三十步休息一次，再也不能减少了，走不动也得走，否则就只有永远躺在这里。经过艰苦的努力，估计是下午三、四点钟，终于爬到了山顶，这时心情真是悲喜交集：喜的是自己有了跟上部队的希望了；悲的是在山顶两旁的冰天雪地上躺着不少牺牲的同志。我曾经亲眼看见有的同志太累了，坐下去想休息一会儿，可是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他们为革命战斗到自己最后的一口气。我们当时的心情很难过，真是爱莫能助啊！爬到山顶时，人真的累极了，但是又感到突然有了信心，有了希望。上山时是很困难的，下坡就顺利多了，劲头也上来了。虽然山上一会儿下雨下雪，一会儿出太阳，气候变化无常，我们下山却特别快，精神特别抖擞。是啊，当时我们都是不到三十岁的人，毕竟还是“余勇可贾”。下了夹金山沿着一条长长的峡谷走了一段，出了峡谷有一道小河，对岸是一个小镇叫达维。走过小木桥不远的地方，有块不大的平地，有四方面军的部队在欢迎我们。在我们的后面也有更多的同志跟上来了。这就是有名的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当时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人多装备好，服装也整整齐齐。在那里，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领导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领导人之间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后来知道，这就是同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的斗争。

部队从懋功出发到黑水、芦花，又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准备过草地。这时我腿上长了脓疱疮，很厉害，医务所的同志用镊子一个个揭破，把脓挤掉，又用棉花沾点硫磺膏抹抹，难受极了。幸好那时年轻、抵抗力强，在那

里又休整了大约一周时间，腿上的脓疮被治好了，就开始过草地。这又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啊！每天行军，侦察部队走在前头，要事先找好水草少、有点树丛的地方作宿营地。我和警卫员宿营时，找了些杂草作垫的，我们各有一条毯子和一块油布，共垫一条毯子，合盖一条毯子，顶上用绳子系起油布，搭成一个小棚子，就这样睡觉了。半夜里下起了毛毛雨，雨点打在脸上，惊醒了。幸好不是倾盆大雨，总算支撑过来了。随后我有了头骡子，但是我尽量自己走路，经常把牲口让给身体弱的同志骑。过一条泥鳅河时，水很急，深到胸口，趟水很容易被冲走。有个几十人的宣传队，都是十三、四岁的小鬼，我看他们仅靠自己是没有能力过河的，就把我们司令部的几匹牲口集中起来，让他们有的骑在牲口上过河，个子大一点的就拉着牲口的尾巴过河，这样速度就快些，也安全了。过草地第四天时，我还碰到当时在三军团司令部工作的黄玉昆同志，他身体虚弱，已无力行军，我用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了宿营地。黄玉昆同志已将这段事写成文章，登在《星火燎原》上。总之，在长征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事情是数不胜数的，这也是我军的一个光荣传统。

当时部队减员很大，我主动要求到团里去锻炼，彭德怀军团长和杨尚昆政委同意了，让我去十团当参谋长，团政委是杨勇，团长叫黄祯，他在到达吴起镇以前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我们团前进到班佑，住在牛屎棚里，有时遇到藏族骑兵的袭击。当时绝大部分同志都没有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在军团部时，彭老总就

让我提了这么几条办法：第一条是坚定沉着；第二条是用火力对付他们，着重打马，马的目标大好打，骑兵没有马就完了；第三是打退骑兵后不能徒步追击，不要脱离有利地形，只能用火力追击。彭老总说这几条很好，肯定了我的意见。在十团我向各个连的干部专门讲了这几条，后来打骑兵的时候真用上了。

在巴西时，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更尖锐了。据说他发了个电报到右路军，要原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带右路军回返南下，说如果毛主席不同意，就把他抓起来，进行武力解决。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得到了这份电报，他立即星夜赶到中央，报告了毛主席，才使中央摆脱了危险。一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和叶剑英、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一起商量继续北上，我也在场。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很冷静，让他到旁边的一座教堂里去坐下来谈。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最后毛主席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毛主席又到外头对部队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

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这样就同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了。由四方面军补入三军团的人，有不少被他们“动员”回去了。我的饲养员原来是四方面军的，也被拉走了，只得靠我自己牵着牲口和一、三军团一起继续北上。在这场斗争中，徐向前同志立了大功。当时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央红军，徐向前同志说：从来没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他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在关键时刻起了重大作用。

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以后的关键一仗是突破腊子口。仗是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打的，他们是有功劳的。过腊子口后，部队整编，因为五军团和朱德、刘伯承同志等都留在四方面军了，中央红军就改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我被调到支队司令部，任作战科长。部队一面行军一面作战，直到同陕北红军会合。

到达陕甘边区边缘的吴起镇时，中央红军只剩六、七千人，毛主席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但是又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感到我们终于到“家”了。当时毛主席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把“尾巴”切掉！就由彭德怀同志直接指挥，在吴起镇外围同马鸿逵、马鸿宾的四个骑兵团作战。毛主席号召我们打好这一仗，作为与陕北红军的见面礼。他本来在安全地方，却非常关心作战情况。下午四、五点钟，毛主席带了警卫员和通讯班到指挥位置，我们陪着毛主席走到阵地，他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又用心倾听枪声的方向，当他听到枪声正慢慢移向远方，

并且逐渐稀疏，判断敌人在退却，才比较放心地回到宿营地。这一仗是进入陕甘苏区前的最后一战，进了苏区以后敌人就不敢再追了。毛主席当时写了一首词，赞扬彭德怀同志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可见他对彭总的器重和赞赏。吴起镇战斗结束，我们又前进到保安，一方面军的长征就宣告胜利结束。当时是一九三五年十月。我们从瑞金出发时，是一九三四年十月，走了整整一年，经过了十一个省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北的十月已经下雪了，我们穿的还是单衣短裤。保安房子很少，只有些窑洞。部队到后，第一个来欢迎我们的是白如冰，他那时是陕北的后勤部长，他们已经为我们准备了粮食和衣服，每人发了一套棉衣。这真是雪里送炭！长征以来，一路行军，好久没有正式吃过一顿饱饭。因为“左”倾路线错误，我们丢掉了根据地，屁股没有坐处，吃够了苦头。这时吃到根据地群众送的小米稀饭，真象过年一样，高兴得很，许多同志捧着饭碗，就流下了泪水。

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又立即组织了直罗镇战役。参战的有我们部队和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这一仗全歼敌人的一〇五师，击毙了师长牛元峰，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我在这次战役中有一个插曲。战斗开始，三军团司令部组织了两个梯队，彭德怀、杨尚昆率第一梯队在前面，我跟二梯队在离直罗镇几十里处。战斗结束后，领导通知我到前面去，我带了警卫员就走，哪知半路上碰上四个敌人的散兵正从丛林中走出来。我们只有两个人，我自己有支小手枪，警卫员也只是一支驳壳枪，他们四个

人却一人一支长枪。我分析了情况：不理他们不是办法，他们很快就会看到我们，硬打也不行。但是现在他们处在我们地区内，我们又打了胜仗，他们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大的形势上对他们不利，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当机立断主动招呼他们，叫他们：老乡，快过来，我带你们去我们司令部。当时这样做，是有点冒险性，但是我想可以用政治上的优势压倒他们，等他们四个人走过来，我们就很沉着地同他们谈话。果然，这四个人都很听话，背着枪就跟我们走，这时我更有了信心。走了半小时，见到前梯队和司令部的警卫连。司令部的同志埋怨我说，这样太冒险了，至少应该把他们的枪栓都卸下来，不然他们突然反手就没有办法了。可是我还觉得自己当时的做法对，如果那时硬缴他们的枪，万一不服，反抗起来就更糟了，我们两个人两支短枪对付不了他们，还是用政治方式才能取得优势。这算是一段有点惊险的插曲。

不久，彭老总带部队围攻甘泉，还是用的老办法，挖地道搞爆破。甘泉的地形南面较平坦，我们从东北方向挖，挖了好久，费了不少劲，但由于技术不过关，位置不确切，方向和高低水平都不准确，加之物质基础差，炸药不够，又没有成功，只好放弃攻城。

九、从东征到陕北边区政府

(1936.2—1938.2)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渡河东征时，中央决定一方面

军派干部支援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派程子华为十五军团政委，派周士第任军团参谋长，陈奇涵为副参谋长，还派了一位朝鲜同志毕士悌任七十三师参谋长，他在渡河时牺牲了。毕士悌同志又名杨林，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大革命时做过地下工作，是位党的老同志。一位朝鲜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后来，彭德怀奉命再从三军团抽人去，就把我派去接替毕士悌的七十三师参谋长职务。七十三师是十五军团的主力师，师长张绍东是个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但有作战经验。政委赵凌波过去是司号员，是作战中被俘来的，当时表现很好，作战也有一套，又很能讲话，所以职务提升得较快，当了主力师的政治委员，但是他有点军阀主义，开口闭口老子怎样怎样。我们之间互相倒都很尊重，取长补短。比起他来，我有点文化，就成了矮子中间的高子，只是我那时身体很不好，只能带病工作。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夜到二十一日晨，十五军团在二十里长的地段内渡过黄河，占领义牒，包围石楼，消灭了一些敌人；又在文水、交城和榆次作过战，在汾河流域转了一大圈。那里是富足的平原地区，村庄都很大。部队总想打开县城，常常利用黄昏时候发起攻击，靠爬梯子攻城，这样当然很难奏效，所以有些失利，但是也有些缴获。当年五月，红军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东征，回师陕北。部队过黄河时，把所有的牲口都驮上粮食运过来，从河东到河西，过了整整一夜。我那时身体不好，经过不断战斗，还要带病行军，人很疲劳。夜行军，一路

上都是昏昏沉沉的。天上有点淡淡的月光，朦胧的夜色使沿途的各种景物变得气象万千，我只觉眼前出现了许多幻影，好象海市蜃楼，不断变化，每走一段就好象看到一种新的景色。夜特别长，路也特别长，人老是在梦幻之中行进，就象梦游人一样。直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当时那些幻觉中的印象。

到陕北集中后，天气已经热了，我又害了一场大病，连续发高烧。军团和师的领导看我病重，用担架把我送到瓦窑堡后方医院去治疗。那里条件也很差，每天只有小米稀饭加馒头咸菜，只是有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有少许药物。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恢复了健康，奉命到总参谋部等待分配工作。此时正赶上国民党地方军的地头蛇张廷芝部队袭击瓦窑堡，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等单位被迫马上撤出，向保安转移。我随同周恩来、李克农等同志一同撤出瓦窑堡。路过白家坪时，碰上了黄华同志陪着的斯诺和马海德，当地给他们打扫出几间干干净净的房间，让他们休息，以后又和我们相继去了保安，在保安我和他们还时有来往。当时我们和斯诺十分友好融洽，成为最早认识他的朋友。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吴亮平曾为斯诺做过翻译。斯诺同毛主席谈话就是他做的翻译。红军大学转移到保安后，继续开学，李德讲战役学，我奉命又给他当了一段时间的翻译。

到保安以后，中央成立联络局，负责统战和接待工作，由周恩来、叶剑英同志领导，李克农同志为局长，我也被派到联络局工作，具体任务是将从西安等地弄来的书

刊报纸，摘出重要的内容，编成《书刊简报》，供领导同志阅读参考。这一工作搞了几个月，还参加接待了从白区来的人员，党内同志有来中央汇报工作的陕西地下党负责人汪锋和孙作宾等，作家丁玲也是那时到边区来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秋天。值得一提的人物还有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他被俘后表现很好，表示要抗日，反对内战，经过叶剑英、李克农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后来把他送回东北军王以哲部队。他说他有信心说服王以哲停止内战参加抗日。事后证明，他确实在中间起了作用。当时的统战工作，除了接待进来的人，还不断派人出去。

不久发生了西安双十二事变，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去西安处理问题。接着，联络局又派李克农、边章五和我也去了西安。鉴于当时形势，中央准备万一与蒋介石闹翻，由我军和张学良、杨虎成的部队组成西北联军，成立联合司令部。我们都是准备到那里去作参谋工作的。所以我和边章五同志，没有直接参加处理西安事变的工作，只是等待任务的预备队。李克农同志在那里任中央代表团秘书长，主管内部工作，周恩来同志住在另一处，我与叶剑英、李克农和童小鹏等同志住在一个院子里，只见他们每天工作十分紧张繁忙。罗瑞卿、许建国同志也来到西安，在西安公安局任顾问，负责保卫工作。当时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忙于做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三方面的工作，紧张得很，最后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以江湖侠义心情，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扣留了。当时还有个插曲，张学良原来的

警卫团长孙铭九搞过左行动，把王以哲打死了，引起东北军内一部分人的不满，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才把问题平息下来。

一九三七年初，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内战算是打不起来了。我们的任务自然取消，奉命回延安。我还受命带一部分青年，主要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先回延安去，其中有刘教湛、方敏、朱惠等人。同行的还有民主人士张语还及其夫人等。我们待他们如上宾，虽然坐的是大卡车，但在那时候，有卡车坐就是很了不起的了，这比长征时两条腿走路舒服得多。当时延安有一个机构，名为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实际上也就是个名义，主任是博古，还兼任外交部长。我回延安后，博古要我到那里去工作，让我当所谓外交部的秘书长兼交际处长。那时我们做工作都不讲价钱，组织决定了当然要执行，马上就go上任了。交际处有几间平房，经常接待各地来延安的同志。周扬、艾思奇、陈宇、陈家康等同志都曾由交际处接待。党外人士有刘仲容，他是我在苏联的同学，以后脱党，但仍然在党的指导下在国民党方面做统战工作，他到延安来是向中央汇报他的工作情况。二方面军从贵州带来一位开明绅士周素园，还有一个俘虏来的国民党师长张振汉，也都在交际处住。周素园后来回贵州了。不久张也被我们礼送出境，希望他在国民党军队里起些作用。后来，周、张两位在抗战中都起到积极的作用。那里还接待过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还有斯诺的第一位夫人，她住在教堂里，当时算是最好的招待所。她们都是由

中央直接接待的，我们也常见她们。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苏维埃办事处也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林伯渠。由于统战工作开展，林老受中央委托去西安代表我党中央进行统战工作，同时设立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由伍云甫为处长，边区政府主席职务就由张国焘代理。我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的秘书长，这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张国焘是否搞鬼。我和他住在一个地方，三间屋，一边是他住，一边是我住，中间是会客的地方，因此知道他不少底细。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我和张国焘共事了半年时间。秘书长的主要管边区政府内部事务，当时没有多少文件要草拟，都是具体工作，其中包括受党的委托协助张国焘的工作。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怀戒备，心照不宣。张国焘对工作很不起劲，不大管事儿。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不少，主要是征公粮，保证供给，支援前线。接待任务也特别重，不断有白区的干部和学生来边区，还有过往的统战人士和国民党官员，这些接待工作也都由我负责。一九三七年深秋，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和九岁的儿子张海崑（一九二八年张国焘去参加中共“六大”时，在苏联海参崴出生的）也来到延安。他们夫妻、父子会面还是很高兴的，我也尽量照顾他们。毛主席曾和他们半开玩笑地说：国民党有个“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共产党也有个“张杨”（指张国焘及其妻子杨子烈）。

后来杨子烈的妹妹也来到延安，分到陕北公学，听说她中文基础相当好，学习很好。还有过这样一件事，杨子烈曾想把她妹妹介绍给我，我说我已经结婚了，她才打消此念。在我当秘书长期间，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我离职后两个月，张国焘趁祭黄陵的机会，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只身逃离边区。他背叛革命的举动完全不得人心，连警卫员都不跟他走。经中央研究，让他老婆离开边区去找他，他们都叛变了革命。张国焘在国外写了些回忆录，其中不断吹嘘自己，为自己的罪过作辩护，攻击毛主席和许多同志，其中写到我，说我如何监视他，但事实也并不都是那样子，有些事是他自己心怀鬼胎，疑神疑鬼。

十、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1938.2—1941.5)

一九三八年二月，因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经常要同苏联同志打交道，需要懂俄文的同志去工作，我又被调去兰州办事处任处长。当年春节，我从延安到了西安，由林老写信介绍我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见面，请他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协助。在此以前，谢觉哉同志就作为中央代表和彭加伦同志一起，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到达兰州，建立了办事处，由彭加伦同志任处长，因他不懂俄文，对外联络确有困难，才由我去接替

他的工作。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侵略的威胁下，全中国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之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使蒋介石的卖国、内战和独裁的反革命政策遭到严重打击；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热情，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就在这种形势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西安事变作了科学的分析，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下，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西安，提出了坚决反对内战、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从此结束了十来年反共、反人民的战争。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侵略军向我国大举进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了。七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正确主张，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这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

正式形成了。

当时，在武汉、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南宁等城市先后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同时又在一些重要城市如武汉、西安、兰州、长沙等地派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代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那时就是以毛主席和党中央代表的身分在武汉工作，武汉失守后迁到重庆。林老（林伯渠同志）是驻西安代表，徐老（徐特立同志）是驻长沙代表，谢老（谢觉哉同志）是驻兰州代表。谢老到兰州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的甘肃省主席贺耀组，大革命时期是湖南的军阀，我们党曾派谢觉哉同志以国民党员的身分，到贺耀组那里去做工作，争取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因为谢老和贺耀组有这段旧交，所以党再次派谢老去兰州做争取贺的工作，同时也对邓宝珊先生做团结争取的工作。

兰州办事处最初在南滩街五十四号，一九三八年二月迁到南稍门内孝友街三十二号，都是租用的民房。当时，兰州办事处人员编制不多，谢老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代表，办事处以下有秘书、副官、译电员、通信员、服务员、炊事员等，不过十一、二人。我们的生活都很简朴，全体人员都不拿工资，每月只发少量津贴费，最多的也才五元“法币”，一般干部每月只有三、四元，警卫员和服务人员才二元一月。谢老年高体弱，仍然坚持和大家同样的生活标准。

兰州办事处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谢老利用和贺耀组的关系开展工作，对开展民运、

革新政策、团结抗日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但是贺耀组本人优柔寡断，缺少作为。他左右也没有什么进步分子，都是一些不关心国家命运、只知搜刮民财的官僚，这些人对共产党的建议，不过是表面赞成，虚与应付而已。一九三七年底贺耀组调走，由朱绍良接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谢老和我都和朱绍良交谈过，当时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在全国深得人心，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节节胜利，开辟了大片根据地，迫使国民党不得不面对现实，勉强维持团结友好的局面。但是并非没有斗争，他们仍然反共、防共，禁止发行进步书报，拘捕进步人士，限制民众运动，我们对他们这种倒退行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谢老在这一时期曾写作并发表了不少切中时弊的杂文。当时，甘肃省府官员中也有一些较为开明的或与我们有些历史关系的，如省府秘书长丁宜中是比较开明的；民政厅长施奎龄早年在南开大学曾和周恩来同志同学，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赴苏联治病经过兰州时会见他。此外，第八战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副参谋长都和我们来往。我们和当地的士绅如张维、水梓等也曾接触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阐明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一切拥护抗日的阶层和个人。邓宝珊先生当时是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和我们的关系较好，他的二女儿邓友梅一九三七年便去延安学习，参加了革命。邓宝珊部下有一个团长名叫杜汉三，比较进步，常来办事处找谢老或我交谈。还有农民银行和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简称“工合”）的负责人也较倾向于进步，他们经常举办时事座谈会，请谢老去讲

话。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教师、职员等，对八路军和共产党最感亲切，表示崇敬，常常来办事处找谢老和我交谈，听取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我们都来者不拒，竭诚接待，鼓励他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有许多人接受了进步思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第二，收容四方面军失散人员，转送延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和三十军越过黄河西进，在河西走廊受到蒋介石和马步芳、马步青部队的夹击，红军指战员在严寒、饥饿和强敌的围攻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有不少干部和战士被敌人俘获后押送到青海，有些伤病员流落在河西各地。办事处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一方面向贺耀组、朱绍良、马步芳、马步青据理力争，营救被俘人员；一方面派人在武威、张掖寻找和收容失散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许多同志辗转归队，并经办事处设法转送延安，回到革命队伍，为党保存了一批宝贵的革命力量。

第三，宣传抗日救亡，支持民众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尽管国民党政府对抗日的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和限制的态度，但是全国人民在我党领导下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波及到偏处西北的兰州。在党的地下组织——中共甘肃工委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兰州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如“甘肃青年抗战团”、“留外学生抗战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伊斯兰学会”、“妇女慰

劳会”、“联合剧团”等等。当时也创办了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如地下党办的《西北青年》以及群众团体办的《热血》、《妇女旬刊》，还有顾颉刚先生办的通俗刊物《老百姓》，丛德滋办的《民众通讯社》等。谢老经常为这些刊物写文章。一些比较知名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如塞克、肖军、吴渤等和“新安旅行团”，还有个“王家五兄妹剧团”也在兰州，他们经常在街头演出抗日戏剧和演唱抗战歌曲，如《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和《烙印》等等，激发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对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这些活动都得到谢老和办事处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我党坚决抗日的主张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很多青年学生追求进步，纷纷要求赴延安学习。通过办事处的介绍和安排，把许多青年转送到“陕公”、“抗大”学习。有的夫妻联袂，有的青年结伴，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参加革命。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他们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不少同志已经成长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第四，利用办事处这个据点，保持和苏联的联系。抗战时期，甘肃是我国的国际交通要道。兰州同苏联保持着飞机和汽车的交通联系，苏联援助我国抗战的物资都要经由新疆、甘肃转运各地。兰州又是西北的重要城市，苏联支援我国的空军也驻在这里，因此，苏联在兰州设有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我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办事处这个据点和苏联保持经常的联系。因为我在苏联学习并工作过几年，能说俄语，便担负了这项任务，主

要和苏联驻兰州的军事代表联系。我们经中央批准也向他们提供一些情况，当时苏联是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两党互通情报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却颠倒是非，硬说这是“里通外国”。当时，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如周总理、邓大姐、蔡畅、邓发、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谭家述、孔原、冯铨、常乾坤、王弼、朱德海、王范五和江泽民夫妇，还有林彪、陈昌浩和博古的妻子刘群先等，去苏联治病或回国工作，都是通过办事处和苏联联系办理的。周恩来同志一九三九年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同邓大姐一起去苏联治疗，一九四〇年从苏联回国，都是经由兰州办事处，由我们负责接送的。还有些去苏联学习的同志如冼星海（卫国战争时期在苏联病逝）、袁牧之（解放战争时归国，已病故）、孙维世等，也都经由办事处联系。当时如果没有兰州办事处这个据点，在那样的环境下要和苏联建立直接的联系，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办事处接送这些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曾采取了多种方式。通常是由苏联方面将这些同志经乌鲁木齐用汽车送到兰州，先隐蔽在苏联驻兰州代表团住处，与我们办事处取得联系后，约定好时间，由他们用汽车将人送到办事处大门口，然后迅速下车跑进办事处，这就到了“解放区”了。我们马上把他们安置下来，然后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衣和符号，还给每人起一个假名字，根据各人的年龄和身分，每人安上个适当的军衔和官职，最小的给个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为我自己当时挂的是个上校军

衔，这样他们每个人对外就有个合法身分了。有的同志如朱德海是朝鲜族人，汉语说不好，就给他比较高的军衔，再配个副官给他，同外人接触时，就由副官同人家周旋应付，免得他露馅。还有的同志由苏联代表团同我们约定后，由他们用车将人送到郊外马路上，我和一个通信员在指定地点等着，他们下车后，悄悄跟着我们走，互相好象不认识，跟到办事处门口，再一下闪进去，以后就换装，冯铨等同志就是这样进来的。

我们办事处还接待过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同志、日本共产党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胡志明从苏联经中国回国，先到兰州，上面只通知有位重要的同志来，没告诉我们真名字，只让我们好好接待他，我们给他开了小灶，以后又送他安全到达延安。解放后他来我国见到我，还说起此事，我才想起确曾接待过他，可是我们当时不知道是他，因为他用了个假名字。

第五，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当时，党的地方组织还不能公开活动，甘肃工委的负责同志是孙竹宾、罗云鹏、王实先、郑重远、李铁轮；兰州市委负责同志是罗扬实，他们都和办事处有联系。中央的指示通过办事处转告他们；他们给中央的报告，经办事处转报中央。办事处帮助省工委举办党建训练班，谢老常常给一些党员讲党史、讲党课、讲形势，并对地下党的工作经常给与指导。我也给他们讲过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通过他们联系进步群众，开展民运工作和救亡活动。记得当时就是通过吴鸿宾同志开展民族工作和回族进步青年活动的。

一九四〇年，罗云鹏同志主持兰州地下党组织工作，这时正当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罗云鹏同志和他爱人以及赵子明、李铁轮，还有一位小李共五位同志不幸被捕。据说他们被关在沈家坡王家祠看守所一间牢房里。当时正值冬天，牢房内生一火炉，他们暗将拨火棍烧红把牢门烫开一个洞，逃出牢房。赵子明同志和李铁轮同志逃出后先后回到延安，罗云鹏同志和小李逃出后又被敌人捕获，最后光荣牺牲。罗的爱人樊国英于一九四六年获得释放。这些同志被捕后，工委组织部长郑重远同志曾与办事处联系，办事处一面报告中央，拟请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营救；一面通过郑重远、罗扬实同志设法与被捕同志取得联系，安慰和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大体做了以上几方面的工作，由于事隔多年，不能一一叙述了。总之，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兰州办事处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所以曾被同志们称为“既是革命接待站，又是战斗指挥所”。

在那样的环境下，办事处全体人员还利用公余时间认真学习政治和文化，谢老亲自给大家讲课，还组织一些同志学习俄语，由我当老师，谢老自己也象一名小学生似的，静静地坐着专心听讲。由于我们房子小，“学生”只能坐在炕上，“老师”站在地上，利用一个旧木箱钉成黑板，每天一到晚上就开课。谢老每晚给大家讲党史、上党课和教文化的认真精神，至今还使人难忘。

在兰州办事处工作期间，使我最难忘怀的是谢觉哉同志的革命精神。谢老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那时他已年

逾半百，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谢老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代表，也是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在兰州对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国民党顽固派见而生畏，无可奈何。但是对积极主张抗日，同情我党的社会进步人士，谢老又是他们最诚恳的朋友；对广大要求进步的青年，谢老则是他们思想启蒙的良师。有不少青年在他的教诲下，提高了思想觉悟，毅然离开家乡，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谢老以笔为武器，在兰州约两年时间里，写了许多篇政论文章和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杂文，以觉哉、焕南、敦夫等笔名，在兰州各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贺耀组任省主席时，《西北日报》有一个副刊曾一度由我们的同志负责编辑，得到读者的好评，报纸发行数量激增。一九三八年秋天，谢老由兰州回到延安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方针，不断向中国共产党挑衅，制造磨擦，袭击陕甘宁边区，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的军队侵袭我陇东地区宁县、镇原等地，谢老又亲自到陇东边区参加处理这一事件。当年谢老调回延安，他所担负的那部分统战工作就交给我了。他的夫人王定国同志也于一九四〇年随同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等同志离开兰州，经由西安转赴延安了。

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在兰州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难以继续开展。皖南事变期间，兰州的情况也相当紧张，中央来电报指示我们，在可能条件下，将办事处人员向新疆转移，但何时行动要听中央的命令。我们就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照常工作，坚持待命。后来，毛主席

对新四军的问题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谈话，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形势比较稳定，就没有向新疆转移。只是我却得到通知，调回延安另行分配工作。我奉命于一九四一年五月离开兰州，办事处编制也随之缩小，只留下副官、译电员、通讯员等五、六人。这个据点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三年夏天，经中央决定撤销，坚持到最后的是赵芝瑞同志。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从建立到撤销共五年多时间，主要工作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谢觉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教育了兰州市各阶层群众，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启发和提高了各族青年的阶级觉悟，为甘肃各族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十一、在延安军委总部

(1941.5—1945.9)

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在兰州办事处接到调令回延安工作。因为正赶上我爱人怀了第三个孩子望生，即将临产，只得等她生下孩子满了月再动身。望生四月二十八日出生，我们于五月底离开兰州到了西安。由于组织上的关心，我的第二个孩子天福由地方党组织交给兰州工委的罗扬实同志家照管。天福才一岁多，当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组织上把他转到谁家去了，只知道由一个同志转到另一个

老同志家帮助照看，中间还隔了一层。五月底，我们一家四口（两个大人和曼曼、望生两个孩子）同副官张义和同志（他是和我一起从延安去的，在兰州办事处管交通联络，经常陪同过往人员到西安）、公务员周尧夫同志（解放战争时期他已是某军工厂的厂长），还有不久之前由苏联回国的江泽民、安碧秋同志和他们在兰州出生的女儿，我们一起从兰州乘汽车到达西安，在那里又等了个把月，七月初才有车回延安。我们乘车通过蒋管区回延安的途中，每经过一地都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故意刁难，当时也只好强忍怒火应付着。好在我那时还戴着上校军衔，国民党下面那些家伙也不敢对我过分放肆。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我们回到了延安。在招待所住下后，我和江泽民一起去看望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邓发、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向他们报到并汇报了工作。江泽民同志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为他作了介绍，毛主席还留我们在杨家岭他的住处一起吃了饭。朱德同志还曾到招待所来看过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我被分配到军委总参谋部，正式任命为一局（作战）局长。郭化若、边章五同志也曾先后在一局任局长。当时的总参谋长是叶剑英同志，下面有一局、二局和三局，二局（情报）局长是曹祥仁同志，三局（通信）局长是王净同志。军委办公厅统管军委所赋与的各项事务和总参各局的生活。在我们一局工作的有刘志坚、钟人仿、王政柱、朱军、丁甘如、石敬平、安东、雷英夫、张清华、龙桂林、杨迪等同志。当时的许多参谋，现在已成为军级或更高职务的干部了。那时

大家都很年轻，对于在毛主席身边和在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都感到很高兴。朱总司令和周恩来、王稼祥等军委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工作一直很关心和重视，经常对我局的同志进行直接的指导和教育。叶剑英同志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特别是他善于迅速分析形势、判断情况和提出对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我们工作中的楷模。那时我们全局不过三十来人，工作效率却很高，也不分什么节假日和上、下班，一有工作就不分昼夜、全力以赴地干；同志间非常融洽，看不出什么上下级界限，还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抓紧学习。我们曾经组织了马列主义哲学和战争论的学习。当时这种工作精神和良好作风，是很值得回忆并继承发扬的。

那时的参谋工作同现在显著不同。首先，各抗日根据地是分散的，每个根据地基本上独立活动，军委总部很难作出统一的部署，常常是总参发出指示，由各根据地再转告下层其他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考执行。其次，那时我军的装备很单一，就是小米加步枪，有炮但没有多少门；现在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二炮等等军、兵种，工作很复杂。在延安时，参谋工作的内容简单得多。当时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了解研究和分析敌（日军）、伪（汪精卫军队）、友（国民党军队）及我军（八路军、新四军等）四个方面的情况。这项工作是紧张的，每天从前方来很多电报，我们都要及时处理，将各地各方面的情况经过整理，上报到军委和中央。每周再编写简单的综合战况呈送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对全局情况一目了然。

然。这种不间断的情况反映，对中央的作战决策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中央根据我们反映的情况以及提出的建议，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各解放区战场，及时发出了各种指示。美国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在延安派了观察组，我们也同他们经常联系，互相通报一些情况。

在我到总参以前，八路军曾在华北战场发起过两个有名的大战役：一个是一九三七年九月的平型关战役；一个是一九四〇年八月至十二月的百团大战。对于平型关战役，当时是一致好评的，因为它确实使侵华日军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大打击，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坂垣师团的一部分。虽然这个战役是由林彪指挥的，更重要的是，这次作战的胜利是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结果。在当时，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对坚持抗战的信心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百团大战是由彭德怀同志指挥的，对这个战役的评价，当时就有争论，有说是对的，有说是错的，说它暴露了我军的力量，引起敌人报复。彭德怀同志曾经对此专门作过论述，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百团大战的实施虽有某些缺点，但是其成绩和胜利还是主要的，应该充分肯定。

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我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奋战在各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我党领导的部队，仍然艰苦而顽强地打击了敌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叶剑英总参谋长在延安接见了中外记者团，发表了中外瞩目的著名谈话。他在谈话中列举了各战场特别是敌后战场的战绩，公布了许多具体数字，如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抗击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敌伪军，国民党军队

担负抗击敌伪仅占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十六，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叶剑英同志的这个讲话，也有我们工作的一分成果，讲话中的各地战况和统计数字，都是我们整理和提供的。一九四五年，朱德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其中不仅有许多材料是我们搞的，我们还参加起草了报告的初稿。黄华同志当时是朱总司令的政治秘书，他和我们集体搞出这个报告，叶剑英同志也亲自审阅过这个稿子，后来成为“七大”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又卡我们的脖子，从一九四二年起不给我们发军饷，想困死我军。党中央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的党、政、军、学一切单位，一齐动手搞生产，我们也不例外。比较普遍的有两种办法：第一是种菜，解决吃菜问题。我们每人的住房前后都有一块小“自留地”。我房前本来就开了一小块地，原来种了点花草，到开展生产运动时，就主要是种西红柿了。第二是搞手工业，主要是纺线。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时，我们每人都有一部手摇纺车，我用它纺过棉纱线和羊毛线，当时我的手艺还不算差，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怎么纺，这些手艺学会了就不容易忘记了。一局同志还在山上开了点荒地，种了谷子，还收了些小米上交公粮。那时全边区和各根据地，尤其是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我们许多同志回忆起来，至今还觉得兴奋和得意。因为它不仅解决了生活上的部分困难，对我们的思想和作风，也是

一次很好的锻炼。

一九四二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一场大规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参加了。当时在我们党内，王明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党中央、毛主席抓住抗战相持阶段的局势，及时开展了这场运动，仅在延安一地，参加运动的就有五万人左右。毛泽东同志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成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武器。接着，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运动开始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检查自己，主要是怎样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我当时觉得自己并不算是教条主义这一类型的人，但因为我在苏联学习了多年，也不能不有所影响；不过从另外一面看，我与典型的教条主义者又不一样，他们常常以大人物自居，能说会道，又讲演，又写文章，自以为是，锋芒毕露，这一套我不喜欢，也没有这个能力。因此，我比较实事求是地检查了自己的主观主义思想及其表现。这对于克服自己的缺点还是大有好处的。

整风的同时，又进行了审干。康生在审干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不过那时倒没有审到我的头上，因为没有关于我的材料；相反，我倒是审查过别人。军委总部在王家坪成立了一个整风领导小组，叶剑英、陶铸、胡耀邦、安东、

李初梨、吴溉之等同志和我，都是小组的成员。我在审查别人时，还是比较客观求实的。例如对现在任海军学院院长、当时任处长的朱军同志，他曾在冯玉祥部队作过军运工作，同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关系很密切；他又曾三次失掉党的关系，三次恢复党的关系。我们认真审查了他的历史情况后，认为他斗争是坚定的，是个好同志，我代表党组织宣布了支部对他作出的这一结论。“文化大革命”中，朱军同志又受到审查，有人来外调，我还是按原来的结论答复了来人，没有改变口气。我在审查干部当中，没有随便给人家扣帽子，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康生那一套恶劣作法，对我们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一局有的同志也曾受到不正确的对待。例如周秋野同志，在审干过程中曾被搞“车轮战”和逼、供、信。其实这是个好同志，他在测绘科工作时，为了绘制地图，长期在微弱的灯光下工作，半年时间，使眼睛近视了几百度。虽然后来都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为他们“平反”了，但我们对于这类伤害自己同志的教训，还是应该永远记取的。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搞了许多鬼，他曾经对一个从兰州到延安的名叫樊大畏的学生大搞逼供信，迫使他胡说兰州的地下党组织是红旗特务党，诬陷了许多同志，康生让这个人到处现身说法，表明他坦白彻底又受到了信任。虽然这些事当时倒没有找过我的麻烦，但是康生搞的这一类丑剧，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中央指定我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我编在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代

代表团。记得我没有参加小组会，只参加了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会议期间我发过一次言，就是讲在遵义会议时凯丰同志的问题，我见原来提名他为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就讲了他在遵义会议时的表现，他当时是顽固地抵制遵义会议的决议的，我认为他不宜参加新的中央委员会。后来的中央委员名单中果然没有他了，也许当时还有别人也提了这个意见。当时我的这个发言是很受一些人支持的，许多同志说我还是敢于讲话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要求无条件投降。电波传来，整个延安都沸腾了！当时大家的心情只能用“欢欣若狂”几个字来形容。长达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怎能不令人振奋呢？延安军民为庆祝这一伟大胜利，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大街小巷，炬火辉煌；山上山下，火龙飞舞；远远看去，就象一座不夜的大都市，突然活跃欢腾起来了，此情此景，真使人终生难忘。不过在胜利的狂欢中，我们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了。在十到十一日两天内，朱德总司令代表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等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前进，对日寇展开全面大反攻，收缴日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那几天，我军各部队的战报、电文和总部的命令、指示等等，日夜不断地在延安和各解放区之间来回飞传着。我们的同志满怀激情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大家想起八年来我国军民承受的巨大的艰苦牺牲，想象着抗战胜利后光辉美好的前景，谁都不知疲倦，都在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为了适应新的

形势，军委决定在总参谋部下成立作战部，一局归作战部领导，毛主席任命我为作战部副部长，一局局长则由阎揆要同志接任。

十二、到东北

(1945.9—1946.4)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飞机来到延安上空，绕着延安飞行了几圈以后，就在机场上降落下来。中央马上派人去机场迎接来人，因为已经看出来的是苏联飞机。下来的是一名苏军大校和一名中国同志。那位中国同志是我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当时曾克林和李运昌的部队已经进了沈阳，并与占领沈阳的苏联军方取得了联系。苏联远东司令部为和我党中央联系，决定派一名大校，由曾克林陪同，乘飞机来延安。他十五日到达，十六日就与我党中央会谈，希望中央很快派负责同志去东北，以便协调我方与苏军的行动。中央经过讨论，当天就作出决定，派六个同志乘这架飞机去东北。这六个同志是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因为苏联方面有军衔，我们为着工作方便，同他们打交道也要有相应的军衔，就以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我为少将，段子俊和莫春和为上校，还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十六日晚上，叶剑英同志正式通知我，他向我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说明天(十七日)早上就动身，还关切地说我家里的老婆孩子，可

以由他负责照料，让我放心地走。

九月十七日，我们乘着那架苏联飞机飞向东北。但是飞机没有到沈阳，飞到山海关就降落下来，飞行员很不谨慎，是从跑道中段落下的，结果冲出了跑道，倒插到一块稻田里。飞机尾巴已翘起来，成了垂直状态才停住。我们六个人中，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受了轻伤，叶季壮撞得最厉害，受了重伤，腿被撞翻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彭真受了脑震荡。最幸运的是陈云同志，飞机的舱门被撞开时，把他推进了驾驶室，反而没有受伤。苏联同志马上把我们一一救出来。首先将压在叶季壮身上的东西搬开，然后把他抬到平地上躺下。就在这时，我方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同志带了一个班赶到了，见到我们的狼狈情况，他首先安排我们休息，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第二天，他专门派了一趟列车，送我们到沈阳。

正是九月十八日，我们坐着朱其文派的专车到了沈阳。曾克林和李运昌同志给我们安排了暂时的住处，随后我们又搬到张作霖的大帅府住，以后又搬到沈阳三经路博物馆。那是一处堡垒式的洋房，中间一座大屋给我们办公用，围墙四周是整齐的平房。恰象营房，正好住了一个连的警卫。

到沈阳以后，陪我们来的苏军大校就回自己的司令部汇报去了。很快，我们也与苏联军方取得了联系。当时苏联在沈阳的最高负责人是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柯大将，他的军委委员是杜曼宁中将。苏联军队内都是这样，军事首长的军衔都比较高，军委委员则比较低。赫鲁晓夫当时也只是个中将，勃列日涅夫才是个少将，杜曼宁这个

中将军衔也就算不小了。他们的总部在长春，由苏军驻在沈阳的部队专门和我们联系。我们同杜曼宁建立了经常联系，每次接触都是我陪同彭真去的。当时彭真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与苏方会谈都由我为他翻译。大约是第二或第三次接触时，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有十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受这批新武器。谁知那时苏联害怕美国指责他们支持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怕担引起美苏关系恶化的罪名，两周以后又临时变卦，通知我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给我们了。由于他们害怕美国，出尔反尔，弄得我们很被动。新枪没有到手，原来的枪又留下了，部队上下都埋怨。

那时中央向东北派来了十万军队和干部，在很短时期内扩大到三十万人。成分可能不纯，人数却不少。这批新到和新扩大的部队打开了几个很大的军用品仓库，搞到些新枪和很多装备。叶季壮同志亲自去看了，里头有大衣、服装、鞋子、帽子等物资，东西多得很，可以尽量去拉，部队趁机装备了一下。以后苏联一变卦，没办法再拉，后来的部队就得不到了。当时流传一个说法：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其实更确切地应当说新兵有枪，老兵没枪。这都是苏联方面讲话不算数造成的。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得很苦，害怕再引起战争，害怕得罪了美国。在这个背景下，造成了我们的被动局面。接着，李运昌带的部队向

热河转移，转移中，从仓库中带走了很多物资，可是没有很好地组织人押运，动员了一些马车帮部队运输，结果有的连车带物资都被人家拖跑了。彭真和李运昌为此受到许多指责。林彪后来也拿此事来攻击彭真；李运昌也大受批评，成了他的一大罪状。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李运昌还为此事向中央写了较为详细的申辩，并送了一份副本给我。我看了他写的材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林彪到沈阳。他到达前中央就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由林彪任司令员。民主联军的建立有统战意义，是由几方面的部队组成的，包括关内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吕正操带的东北军一部，周保中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等。周保中同志是随苏军进驻长春的，人们称他黄中校，因为他熟悉东北情况，所以对苏军的行动起了顾问的作用。林彪到达前，由彭真、吕正操、肖劲光、程子华和我一起讨论民主联军的领导成员。彭真建议吕正操任第一副司令，肖劲光任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我任第二参谋长。在讨论时，我说不要叫什么第二参谋长，就是副参谋长吧！但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仍旧照原来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名单，我只得照章执行，尽力而为。开始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彭真和肖劲光工作。林彪到后，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已经进到山海关以西地区，当时，他们是我军在东北的一支最大的力量。由于情况紧张，林彪又组织了一个前线指挥所，带领少数人到山海关地区指挥部队的行动。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又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苏联害

怕得罪美国和国民党，害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正式向东北局提出，说根据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及周围地区，要我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撤出沈阳。国民党后面有美国撑腰，也坚持要进沈阳。我们不赞成苏军这样做，引起了我们与苏方的一场争辩。同我们打交道的是苏军驻沈阳少将卫戍司令。这个人很粗暴，不会办外交，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说上面指示要我们退出沈阳。彭真同志和我反复向他说明我军的愿望，讲不应撤出的理由，他却只搬他们上面的指示，说不能讲价钱，必须这样做。最后他竟说，你们不走，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彭真同志马上抓住他这句话，说从来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去赶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同他吵了一架。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答复我们说，这是苏方当时的政策所决定的，不是他们下级的事，他们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最后，我们不得不尊重苏方的意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东北局及直属部队有组织地撤出沈阳，向本溪转移。在转移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有一些单位没有及时通知到，如陶铸同志等，他当时在省委工作，就没有得到撤出通知，他是看到情况不好，自行退出来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做细，造成一些人对我们的埋怨。

开始撤离沈阳时，指导思想还离不开大城市，还是在沈阳附近转，先撤到本溪，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随着形势发展，又转到抚顺，在那里召开了抚顺会议。在那以前，对东北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

另一种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正在此时，从中央发来了毛主席写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针。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肖劲光等和我。抚顺会议以后，考虑到北满形势比较好，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区都连成一片，东北局决定将指挥部机关向北满转移。还在本溪时，就派人到梅河口修了些房子，准备利用这个据点建立新的指挥机构。抚顺成了转移途中的跳板。会后不久，我们就到梅河口开始工作了。在那里成立了东北军区司令部，肖劲光同志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他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一到就召集各有关单位，布置了司令部的工作。

十三、在军调部执行小组

(1946年4月——1946年底)

一九四六年四月初，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饶漱石乘美方的专机到达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降落。因我们事先已得到通知，彭真、林枫、李立三与我，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去机场迎接，与饶漱石见了面。他向我们传达了北平军调部和叶剑英同志的意见，说要在沈阳成立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下属几个分组，小组成员由东北局派主要干部参加。彭真、林枫等同志研究后，决定李立三和我参加小组，并让我们马上随饶漱石乘飞机去沈阳，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就去了。

到沈阳后，第二十七小组正式成立，饶漱石任小组长，李立三任政治顾问，我是手下没有一兵一卒的参谋长，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的七层楼上。国民党的代表叫赵毅，他原来是东北军的中将师长，在抗日战争中同我们党有过联系，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好。后来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发现他与我们的关系相当密切，对我们的斗争不坚决，很快把他撤换了。后来替换赵毅的叫蔡宗濂，东北人，也是中将。美方代表开始是戴梯乐上校，后来是泰勒上校。第二十七小组下属几个分组：沈阳以东地区的抚顺方向，组长是莫文骅，本溪方向组长是肖华；沈阳以北地区的四平方向，组长是耿飏；沈阳西部地区组长是王首道。当时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尚未大批到达，我军与他们收容的地方部队经常发生小的冲突，小组会议上就为这些事天天争吵，总而言之是光吵架而得不出结论。

接着，我军在四平作战，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打了近一个月。因为战线太宽，敌人兵力远远超过我军，我们兵力有限，没有能够打好，不得不结束战斗。这时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陆续进到沈阳和周围地区。我军撤出四平后，曾一度占领长春，并俘获了一部分敌人。但据当时局势，在长春也站不住脚，只得从长春撤出。接着又向哈尔滨撤退。最后只能以松花江为界，南岸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不过我们在江边留了一个据点，叫陶赖昭，放了一个连的部队，警戒江南的敌人。国民党部队进到松花江边，也就不敢再贸然前进了。撤出四平后，饶漱石调回北平，他在二十七小组工作只有一个来月。他走后，小组由

李立三负责，我作他的副手。小组的位置也由沈阳迁到长春。我们住在比较小的东北旅馆里，国民党代表住中国旅馆，美国人的住处离我们很近，叫大和旅馆。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的主要部队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六兵团，不过开始还没有兵团的番号。不久，东北局又将李立三调回哈尔滨，小组的工作就由我主要负责了。那时小组除了参谋、电台、机要和行政人员一套班子，主要有两个翻译：一个是北京来的李汇川，他原是西南联大机械的，因为人不多，他还兼着秘书，小组的工作报告都由他草拟出来，向总部报告；还有个翻译是他的爱人周砚，他们原来订了婚，到长春后才正式结婚。他们现在都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二十七小组下属的分组也有了改变，原来抚顺、本溪和四平等地的分组都撤销了，重新成立了几个分组：德惠一个组，组长是袁任远；双城一个组，组长是高铁；齐齐哈尔一个组，组长是朱光。因为长春、德惠在国民党占领区里，国民党也在我们的双城等地放了两个组。

执行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调解国共双方军队的磨擦，实际上却天天吵架打官司，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宣布实行停战的那一天，我军占领了吉林市东边拉法车站，国民党指责我们违犯协议要我们退出，我们遵照毛主席的一条原则办事，即枪杆子夺到的东西，决不能在谈判桌上放弃掉。还有一件事，国民党方面说中共部队正在松花江北岸准备渡河，想进攻长春。我们从内部知道并没有这个打算。军调部就派了一架飞机，由

我代表中共，和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三方面共同去松花江上空视察。看了一番，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军要渡河，这样，国民党代表才无话可讲了。

小组内三方面都有翻译，一争论起来，我们的翻译最有本事。国民党的翻译名义上是个美国留学生，可是他在讨论时，什么问题都说不清楚。而美国人的翻译又不作口译，只做记录，结果全靠我们的翻译，把所争论的问题讲得很清楚，美国人也不得不表示佩服，说国民党的翻译不是选拔出来的人才，而是靠的关系。因为那个翻译的职位很高，他拿钱不少，翻译得却并不好。那时差不多每天都开会，我们有问题总是据理力争，国民党的代表却毫不讲理。我们的女翻译周砚气得要命，说国民党怎么这样不讲理。我总劝她耐心一点，他们不讲理，我们要讲。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已经发动全面内战，和平调处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小组还没有停止工作，一直继续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那时我们的三人执行小组也已无所作为，我向东北局提了个意见，建议派李初梨同志来当小组长，他当时正好没有什么事，东北局同意了，我便离开了军调部第二十七小组。

这期间经常有飞机在东北、北平和延安之间来往，我利用了一个机会，坐军调部的飞机从长春到了北平。在那里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叶剑英同志，他见了我也很高兴，约我到 he 住的地方去，在院子里一块照了相，还参加了晚会，气氛十分亲切。我到北平是为了等个机会去延安看看爱人和孩子。正好军调部又有飞机去延安，我就乘飞机回

到了延安。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离开延安时走得很仓促，曼曼的妈妈正怀孕，延力还没有出生，她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出生以后，我还没有见过她呢！我到家以后，一家人又终于团聚了，当然非常高兴。不过，孩子的妈妈身体很不好，五个小孩中，曼曼、望生、连连、延力在身边，延力还不满周岁，天福还寄养在外边别人家里。因为我那时已在东北工作过一个时期，还希望到那里去，就同孩子们的妈妈商量，准备带他们一起去。开始同军调部的人讲好了，再搭他们的军用飞机，将我爱人和孩子一同带到东北去。谁知他们临时又变了卦，不同意带家属和小孩。当时也确实不方便，四个小孩，小的还不到一岁，曼曼的妈妈又生着病。我们又商量，是不是把最小的延力暂时留下来，交给老百姓先带着，以后再来接。跟我们一起的公务员老吴，真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见我们想把延力留给老百姓，心里很难过，自告奋勇让我们把孩子交给他带。我们觉得他一个老头子带一个小女孩，也是很困难的，但是他说，只要他不死，就一定把孩子带好。少奇同志生前说他的孩子是人民养大的。同样，我的孩子也完全是人民养大的。这个老同志从我一九四一年调回延安时，就分配到我身边来作公务员，我到现在还很怀念他。当时我们见他这么热心，就把延力交给了他，还买了些奶粉留给他们，组织上也帮助我们作了安排。但是当时我们仍然不能一起走，我又不能在延安久等，只好下决心独自先回北平。好在这时经常有飞机往返北平和延安，一九四七年初，军调部的董越千同志去延安联系工作，叶剑英同志交代他，帮助把我爱人

和孩子带来。他果然替我们向美方交涉好了飞机，将她们母女四人带到了北平。到北平后，住在翠明庄，人多地方小，孩子们只好打地铺睡。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过了春节，我让曼曼的妈妈到当时的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去检查，发现病情很严重，但是她很坚强。早在一九四五年我离开延安时，她就向我说：“我们孩子多，我也不想别的，只要把他们都带好，也就尽到革命责任了。”她后来带着四个孩子，确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军调部正在解散，李初梨的爱人刘钧利用机会从长春来到北平，约我们观光一下北平。我们去了前门外、雍和宫等地方，领我们的是徐冰同志，我同他在莫斯科就相识，比较熟悉，他又是北平人，正好作我们的向导。以后，我们从北平搭飞机去哈尔滨，乘的是一架美国双引擎飞机。起飞以后不久，一个发动机失灵，机上人员都很紧张，赶紧系上降落伞。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惊慌的，刘钧同志也很沉着，她还帮助我们照应孩子，因为飞机上冷，她让孩子躺在飞机过道上，用被子盖上。飞机发生事故了，我想自己虽然带了降落伞，是死是活也很难说，几个孩子就更难想象了。那几位美国飞行员还比较负责，说我的三个孩子没有带降落伞，到发生问题时，可以由他们负责一人带一个跳下去。尽管后来采取了措施，赶紧飞回北平，飞机总算安全降落，没有跳伞，但当时能这样说还是难能可贵的。北平机场迅速准备好另一架飞机，重新起飞，我们一家和同行的十多人一起安全到达哈尔滨。我们的孩子们就是这样靠党和群众的关怀在战斗的环境中逐步

长大的。我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牢记党和群众的养育之恩。我也希望千万个干部子弟都能这样做。

十四、在东北军区

(1947年初——1949年底)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们到达哈尔滨，正是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时候。我们在招待所住下，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当时林彪主持东北工作，从内战时期起，到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总部，我都和他有过接触，一直没有什么个人之间的美好关系。这时，他已任命了原来一军团的、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当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我回来后仍然是参谋长，分配主管军工生产。我当时很希望到部队去锻炼，罗荣桓同志找我谈话，说到部队锻炼总有机会，根据部队长期的经验，战争的规模越大，军工生产就越是重要，还是希望我去干。那时人们分配什么就干什么，很少有讨价还价的事。罗荣桓同志说得有道理，我就接受了任务，管起了军工生产。

我们没有成立专门机构，只找了两个秘书，一个是徐良图(现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一个是任忠浩。我们的基本工作方式是到各个军工基地去了解情况，就地指导工作，实行面对面领导，随时解决问题。那时有哈尔滨、北安、鹤岗、鸡西、牡丹江、琿春和大连共七个军工基地，能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和六〇炮、火药等，条件最好的是大连军工厂。当时大连是受苏军管制，他们对我们还是支

持的。这几个军工基地我每个点都跑到了，随时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和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我一直带着秘书任忠浩到处跑，留徐良图在家坐镇，整理有关文件和材料。各个点的负责人我记得有如下几位：哈尔滨是王盛荣（现在武汉），鹤岗是王逢源（后来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已病故），鸡西是乐少华；珲春是韩振纪（后来是驻苏中将武官）；牡丹江是王厂；大连是朱毅（抗战初期在河南当县长，后来参加了新四军，以后转到东北搞军工）。我们都认为自己这项新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一年半，有一半时间在外面到处跑，只有一半时间在哈尔滨为各军工厂做计划，搜集、采购和提供各种原料。后来，东北局看我们忙不过来，正式成立了军工部，调来何长工任部长，王逢源和江泽民任副部长，马文任政治部主任，我是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那时职务高低无所谓，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就干，业务不懂就钻，受了党的委托就认真工作，靠这种精神，还是解决了不少的问题的。

一九四八年夏，我到大连甘井子军工基地去，那里是东北最大的军工基地，对外叫“建新公司”，由朱毅任经理，张珍任副经理，在技术上主要靠张珍，他很懂得一套。厂里生产是多方面的，除了子弹、炮弹和火药外，还生产六〇炮。那里还出过一个英雄人物，就是吴运铎同志。他就是在那里试验炮弹时，因伤致残的。我在那里还参与处理过一个问题。当时负责旅大地方工作的是韩光同志，他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我听了一些反对意见，觉得不对头，

如说他在旅大没有独立的政策，是苏联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旅大是苏军管制的，你和他们对抗，另搞一套行吗？我看这些意见都根据不足。因为我当时是东北局委员，军区参谋长，又是老同志，韩光特别希望我讲讲公道话。正好何长工同志、李一氓同志也在。李一氓同志还是个大秀才，他下笔很快。我们商量了一下，他把我们要讲的内容在一个晚上写出来了，第二天由我在会上讲，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的，少数人不赞成。以后总有人说我有偏向，支持了韩光。但是就今天看，我认为对干部的一般性缺点抱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还是对的。

这一期间，我的家庭发生了不幸的事。我的爱人张毓兰同志一直病很重，到哈尔滨后找了一个日本大夫为她治疗。大夫每周来一次，每次都用汽车接送，也给了他相当的报酬。但是他对我说，病情很严重，最多还可以活半年，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却不能告诉病人。大夫每周来给她吃一些药后又好一点。以后又请了一个奥地利医生，他看了以后直叹气，说病已经难治了。就这样，拖了整整一年，治疗无效。一九四八年初的一天夜晚，她病逝了。临终前我在她身边，她自己也很明白，对我说：“我不行了，你坐在我边上，‘看看我！’”我说不出话，坐着，看着她闭上了眼睛。我意识到她去世了，心中充满了悲哀！张毓兰同志是陕北葭县人，一九三五年就参加革命并入了党。她为了使集中精力搞好工作，长期承担着全部家务和教养子女的重任，终于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过早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去世的当晚，我没让孩子们知道，天亮后先通知了

管理处，因为那时还没有火化的习惯，请他们帮助我去买口棺木。他们马上办妥了，我们就为她入殓安葬。在身边的三个孩子知道了，哭得好厉害。我让孩子们和妈妈的遗体一起照了相，将她安葬在哈尔滨的一个叫“极乐园”的教会墓地，为她立了碑，围了个圈圈，上面还有个带红五星的架子。解放以后，此处墓地整个迁到郊区，连围圈和红五星都迁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我去哈尔滨还去看过此处墓地，就在大路旁，很容易找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哈尔滨又来通知，说那处墓地也不能放了，遗骨都得火化，我当然只好同意，后来在那里放了一个骨灰盒。这是我个人家庭的一段悲剧。

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东北我军进行了辽沈战役。为了作战便利，指挥机构分为前方后方，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前方，高岗主持后方工作。我被调回军区司令部，协助高岗工作。对于这次战役，毛主席从战略方针到作战部署，曾作了一系列的具体指示。但是，战役的直接指挥者林彪，对毛主席的指示却一直采取了犹豫、拖延以至抗拒的态度。毛主席一开始就指示东北我军应首先将主力调到辽南地区，占领锦州等战略要点，切断北宁线，对东北和华北蒋军实行战略分割，把蒋军卫立煌集团共约五十余万兵力封闭在东北境内，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加以各个歼灭。林彪却要将我军主力留在北线，对长春进行“久困长围”，并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直至毛主席对他作了严厉的批评，令其迅速攻取锦州，并对战役的实施一一作了具体部署，林彪才不得不将自己的指挥

所挪至辽南阜新，按毛主席的指示对锦州发起了攻击。十月十五日，我军攻克锦州。十八日，长春守敌被迫放下武器。我军又于黑山、大虎山地区包围了企图西援锦州的蒋军廖耀湘兵团。

这时，我们分析了战局的发展形势，认为困守在沈阳等地的东北残敌，为逃避被我军全部围歼的命运，在北宁线被切断之后，有很大可能从营口由海上逃跑。为此，高岗和我于十月十九日联名发电报给林彪，指出敌人向营口突围从海路南撤的可能，建议迅速调动部队，抢先占领营口，以堵塞敌人的退路，并具体建议以第十二纵队外加三个独立师，由四平以北乘火车于十月二十四日以前全部赶到清源，然后向鞍山、海城急行军南进，抢先占领营口，堵塞沈阳等地残敌的退路。我们建议林彪迅即下达相应的具体命令。这一建议也转报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即指示林彪说：“高、伍建议……甚为必要”，要他“照此速办，愈快愈好”。林彪对此却阳奉阴违地一拖再拖，毛主席连续给了他七封电报，告知他蒋介石已在天津集中了五万吨位船只，准备接应从营口撤出的东北蒋军，要求我军在东北“不失时机，争取大胜”。但是林彪还是置毛主席的指示于不顾，拒不调动部队去堵塞营口这个唯一的缺口。结果，沈阳等地敌人在廖耀湘兵团于黑山、大虎山被我歼灭之后，所有陆上退路全部切断，便决心从营口突围。终于使敌人五十二军军部及一个师部，带三个团共一万多人，由营口登船从海上逃离东北，造成我军未能完成全歼东北蒋军的任务。毛主席责备林彪“忽视对营口的控制，是一个

不小的失着”。

这是我在辽沈战役中同林彪打过的一次交道。整个战役期间，我大部分时间是协助高岗做支援前线的工作。那时东北支前很有本钱，弹药、粮食、汽油相当充足，前方要多少就可以提供多少。靠近锦州前线的辽西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陶铸，军区司令邓华，起了很大的作用。

锦州战役完成后，部队回师攻打沈阳，进展很顺利，形势很好。军区的后方也由哈尔滨南移向沈阳。东北局确定陈云为沈阳市军管会主任，我为沈阳卫戍区司令，陶铸为政委。我们提前从哈尔滨经吉林、抚顺去沈阳。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我们和陶铸先后赶到。沈阳市郊的我军炮兵还在严阵以待。当我们坐着吉普车穿越阵地时，炮兵部队指挥员提醒我们说，市区战斗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还是进入了市区，因为我在沈阳呆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道路比较熟悉，而且情况也不容许我们迟疑。很快，我们就与陶铸同志会合了，共同制定了卫戍方案。当时市里未放下武器的残余敌人已成瓮中之鳖，他们中居然还有人代表国民党军队来找我们联系起义，我和陶铸商量之后，决定只解除他们武装，不接受他们起义，以免背上包袱，妨碍整个部队行动。当天我们部队和人员大部都到达市内，沈阳市的战斗就完全结束了。

进沈阳后，我们的临时指挥地点设在大和旅馆，那里设备相当高级，给我们指挥机关办公用。陈云同志着重制定接管经济措施，他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手下也有不少干部。被指定担任城市卫戍的部队有两个正规师，我和陶铸

政委按照地图，安排好各个师部、团部的位置，布置各部队负责卫戍的地区。正积极执行这项任务时，接到中央的命令，东北的部队成立第四野战军，下辖四个兵团：十二兵团司令肖劲光；十三兵团司令程子华；十四兵团司令刘亚楼；十五兵团司令邓华；同时命令野战部队尽快进关，另建东北军区，与野战军分开，任命高岗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仍旧担任军区参谋长，段苏权为副参谋长。军区下属好几个独立师和高炮部队，还有军政大学等单位。具体工作主要是我和段苏权做，我们合作得很好，段苏权同志至今还留恋我们这段关系。军区的工作高岗做得很少，只是有时把我们找到他家里，听听我们的汇报，有时到军区来给我们讲讲形势。这也就是同高岗共了一段事。高岗这个人留给干部的印象确实很不好。开始他装腔作势，还给人一点错觉。在刘志丹同志牺牲以后，他就以陕北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到东北以后，又同林彪搞在一起。他几次去苏联，因为东北地方很重要，斯大林对他很感兴趣，老想拉他。新中国成立时，他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但是他这个人在群众中威信并不高，文化也不高，行为也很不检点。

一九四九年二月，国民党海军最大的一艘军舰“重庆号”起义，由上海吴淞口外开到最近的解放区港口烟台，又转来东北的葫芦岛港口。这是英国制造的一艘排水量为七千五百吨的大巡洋舰，它的起义当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国民党空军侦知该舰的位置后，不断派飞机轰炸。为了避免“重庆号”舰完全被炸毁，我们在

采取了各种措施后，使军舰向一侧主动下沉。敌人以为“重庆号”舰已被炸沉，停止了轰炸。之后，东北局派我和朱军同志到葫芦岛会见了“重庆号”舰全体官兵，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为了避免敌机骚扰，慰问大会是在一个树林里开的。在大会上，我首先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东北军区对“重庆号”起义的全体官兵表示热烈欢迎，说他们的起义是正义的行动，参加人民解放军是光荣的，向他们说明了当时的全国形势，指出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无限光明的新中国就在眼前。还鼓励他们慢慢克服在我军生活的不习惯，努力成为我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同时针对他们中有人对沉舰措施的不理解和不安情绪作了些工作，安抚了他们。

在那里时，有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重庆号”起义的经过，其中一位就是当时舰上起义组织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毕重远同志，他当时只有二十来岁。他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准备，团结了一批进步水兵，秘密成立了“士兵解放委员会”，组织了这次起义。我认为他们确实是一些了不起的英雄人物。邓兆祥舰长支持了“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正义行动，保证了“重庆号”舰的起义成功，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重庆号”舰的同志绝大多数都到了安东（今丹东），在那里建立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朱军同志留在那里作领导工作，我也经常就他们的建校和其他工作给予帮助。听说以后对“重庆号”舰起义的宣传有些分歧意见。据我看，“重庆号”舰的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毕重远等二十七位同志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在起义中起了决定性的

作用，这一点似应予以肯定；邓兆祥同志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各有贡献。

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我在东北军区又工作了一年多。

十五、开国和回乡

(1949.10—1950.1)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了！当时我在沈阳，只见到处红旗招展，张灯结彩，人人欢天喜地。我白天忙于工作，晚上才带着孩子坐汽车四处游逛了一番。孩子们兴高采烈，只知道热闹、好玩，看我默不作声，很是奇怪。他们哪能理解一个为这一天奋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士，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啊！这种幸福、自豪的感情，又怎么能用言语来表达哩！

在此之前，我的个人生活又有了点变化。还是在我去大连搞军工生产时，遇到冯铨和李斐义同志，他们了解我的家庭情况，积极为我介绍了徐和同志。当时她在中调部的一个研究机构做资料工作，是从张家口转移到大连来的。在李斐义同志的积极促进下，我和徐和同志见面作了一次长谈。我把我的不幸和子女的情况，如实地向她谈了。她相信我的诚意，并表示对我的同情，谈得很融洽。因为她正在解决入党问题，为了不影响她的进步，我让她在组织问题解决以后再谈。后来，她果然入了党！我们结婚时，李富春、蔡大姐等许多同志都来出席了婚礼。

一九四九年底，我又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毛主席坐火车赴苏联，参加斯大林七十诞辰和进行中苏会谈，我负责自山海关到满洲里铁路全线的警戒工作，由东北军区和铁道部共同组织在沿线每隔一百米距离设一哨兵，互相都能看到，这样，每一公里十人，一百公里就一千人，全线有几万人参加警卫，就怕发生意外。如果专车发生了问题，那可不得了。后来，毛主席在我们的护送下，安全通过东北地区，我们才放了心。

这个时候，我们部队已经打到广西南方边界，祖国大陆基本上完全解放了。年底成立了中南军区，军区领导机关就设在我的故乡武汉。我想自己已经离家二十四年了，从一九二五年离开武汉就没有机会回过家，现在祖国和家乡都解放了，我应该回去看一看，看看生长我的土地和抚育过我的亲人；看看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同学、朋友；特别是看看给了我革命启蒙教育和送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母校、老师。经高岗同意，我回武汉探家一次。记得我连警卫员也没有带，只有我一个在沈阳的表妹作同伴，乘火车回到了武汉。这时是一九四九年底。

我好容易找到家门，老母亲感到突如其来，惊喜万分！儿子出去二十四年没有回家，杳无音讯，现在一下子出现在自己面前；离别时我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重逢时已经是四十开外的壮年人；当年还是军阀、地主和资本家当道的旧社会，如今已是我们自己的新中国了，怎能不高兴呢！我家已搬了地方，位于武昌一个狭小偏僻叫做“戈甲营”的小巷里，几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住着我们全

家人，而我家原来住的地方连房子都没有了。地方变了，家里的亲人也有了不小变化。当年亲自送我到汉口码头上轮船的父亲早已去世，三个哥哥也先后去世，还留下老五、老六和老幺三个弟弟。他们都从事普通的职业，维持着全家的生活，只有我是作为一场几十年战争的幸存者和胜利者回到了家乡。在有些人看来，我当上“官”了，但是我这次回乡，并没有去住什么招待所，就在自己家里，陪着自己的老母亲，同睡在一张破木床上。每天吃着母亲和家人亲手做的粗茶淡饭，只觉得无比的香甜甘美。每日每夜同亲人们有说不尽的往事，诉不完的别情！我又找到一些在武汉的老朋友。很可惜，当初同我谈话、选派我出国学习的钱介磐老师，自己掏出四十块大洋给我作旅费的张朗轩老师都已去世了！只有何春桥老师、江志麟老师还健在。何老师过去是我们小学的英语老师，后来他自费去法国学生物，回国后在武汉大学生物系任教授。我找到江定位等老同学，一同步行到武汉大学专门去看望何老师，他也是喜出望外。他那时除了已会英、法语外，又自学了俄语，一见我去，还念俄语给我听。我在苏联多年，一听就说他的发音不准。我们这几十年前的师生，还是这样友好，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也隔不断我们的师生之谊！

我在家才住了个把星期，忽然接到一份电报，是周总理从北京打来的。他通过中南军区找到我，通知我立即赶到北京去，执行新的任务。总理在电报上还问要不要派飞机来接我。我答复说：我马上搭火车去北京，抓紧时间是来得及的。就这样，我席不暇暖，又一次告别了家乡，亲

人和师友，踏了解放以后一段新的也是更长的历史路程！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罗 明

在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曾经出现过一个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在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结论。近年来，不少同志问我关于“罗明路线”的由来和发展的情况；我还看到一些关于“罗明路线”的文章。这使我感到一些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由于对历史情况不甚清楚，对党的历史经验也就不可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现在，我就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一历史的回顾，以供同志们研究这一段历史作为参考。

一、所谓“罗明路线”的由来

所谓“罗明路线”问题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当时，我任中央苏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也曾经提到：“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时因为我和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一

起，从长期革命斗争的血的教训中，已经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从当时福建苏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他对福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正确指示，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反“围剿”斗争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紧急措施，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此外，并不存在另外的一条什么“路线”。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且总结了这方面的斗争经验，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我在这场斗争中坚决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并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一位“最好的领袖”。“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此极为恼火，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作文章，说我“是一个疯狂的立三主义者”，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闽西这一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继续不断地犯了许多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说“闽西在罗明同志这一长期的领导之下，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他们把我贯彻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说成是什么“罗明路线”，是所谓“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和“取消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歪曲和违反客观事实的攻击。

我自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在福建西

部地区进行建党和组织农民斗争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四月间，我和罗秋天前往闽西永定、上杭、龙岩、平和四县指导工作。八月一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特委又决定我去闽西迎接南昌起义军。九月中旬，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先后来上杭，要我和地方组织做支援大军的后勤工作，并要我们部署闽西各县的武装斗争。我们在“八七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指导和影响下，在上杭、永定、龙岩、平和四县，采用建立农村据点包围县城的部署，工作了五个多月。

一九二七年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来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一步发展了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伟大斗争。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我到厦门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三月九日，平和县农民以长乐乡为据点，在县委朱积垒同志领导下，举行攻占县城的武装暴动。这是福建省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炮。省委立即讨论和加强对平和及闽西各县的领导。同年四月上旬，我和许土森、孟坚两位同志作为福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由刘乾初接任省委书记。闽西在省委和各县县委邓子恢、郭滴人、张鼎丞、罗秋天、阮山、陈正、曾牧村、蓝为仁、傅柏翠等同志领导下，龙岩、永定和上杭三县继平和之后于

四、五月间先后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县连成游击区，成立了闽西特委以加强党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闽西这一时期的斗争。

我于十一月由苏联回国到达福州，接着，在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六大”决议。省委又决定我到厦门和闽西游击区进行传达。闽西特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六大”精神后进行讨论，并部署游击区更加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我还由三县游击区到上杭和长汀两县城，参加地下组织会议进行传达和部署工作。一九二九年春回厦门后，因刘乾初调外省工作，我又接任省委书记。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从三月中旬起，三下闽西，消灭了国民党军阀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等部，并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红四军的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使杭、永、岩游击区逐步发展为革命根据地。从此，闽西的武装斗争有了坚实的基础，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一九三〇年六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诬蔑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是什么“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为了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们下令各地红军进攻大城市，组织城市武装暴动。同时，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命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出席上海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闽西代表和省委宣传部长回来传达，表示坚决执

行中央的“左”倾命令。但我和王德等省委多数同志认为，厦门、福州的工人运动正在恢复，不同意发动武装暴动，也不同意把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进军东江。我们把意见上报中央，因而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尽管如此，我们仍保留不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的意见。但由于省委执行中央关于成立行动委员会、在城市搞飞行集会等指示，犯了“左”的错误。同时由于执行红军向东江出击的决定，结果出击三次，每次都受强敌截击而被迫后撤，使闽西苏区和红军遭到重大损失。显然，说我“是一个疯狂的立三主义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奉调去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正在这个时候，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机构，成立了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从而开始了历时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比李立三更“左”，它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重复了、并发展了立三路线时期的错误。王明及其支持者强迫集中主力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他们的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很快“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地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冒险主义主张。为此，他们要求“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实行总罢工，在苏区猛烈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以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决战。这就是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照搬照抄俄国

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而提出的一条所谓的“进攻路线”、“国际路线”。我到达上海时，四中全会刚刚开过，由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找我谈话，他认为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线影响所采取的一些“左”的做法倒不是什么错误，却指责福建省委在农村搞游击战争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并威胁说，如果我不承认路线错误，就不分配我的工作。

在这前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和红军，纠正了李立三“左”的错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二年春，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江西南部建立了以瑞金为首府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但是，临时中央却诬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是“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先后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闽粤赣边区特委成立，邓发任书记。四中全会后，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特委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犯了分兵把口、消极防御的错误，在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损失。特委和政府机关被迫从永定的虎岗撤退到上杭的白沙。我于一九三一年四月被派到闽粤赣特委任组织部长，特委为保卫虎岗，决定派我到永定一带参加游击战争。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我和张鼎丞率领红军独立团在上杭、永定坚持游击战争。十一月间，闽西主力红军攻占汀州后，根据中央苏区前委指示，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由卢德光任书记。卢佯称奉中央命令出外联系工作携巨款逃跑

后，前委命我接任临时省委书记。此后，临时省委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以汀州为中心，西向武平扩大，东向连城、新泉扩大，北与宁化、清流连接，南通饶、和、埔游击区，使闽西苏区扩展达十余县，并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成了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福建苏区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我任省委代理书记，张鼎丞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四至六月，闽西苏区又配合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主力红军攻占漳州，并胜利回师。这对巩固闽西根据地，为第四次反“围剿”作好物质准备起了重大作用。这时，闽西苏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面对这些事实，怎么能够说是“在罗明领导之下，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呢?!

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继续不断犯“左”倾错误的也不是罗明，而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某些负责人。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领导下，抵制了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灵活运用了一、二、三次反“围剿”经验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纠集了五十万大军，疯狂地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主力红军迅速转到北线广昌、宁都一带，闽西的红十二军和独立第七师也奉命调往江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驻漳州的第十九路军向闽西苏区进犯，占领了龙岩全县和永定的坎市、虎岗一带；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占领了上杭县城，并不断向上杭的卢丰、茶地、白沙等地进犯。而我们与敌

人作战的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三千人。因此，闽西的情况，尤其是上杭、永定、龙岩地区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怎样才能有效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闽西苏区党和人民的面前。

这时，毛泽东同志在汀州傅连璋同志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他仍时刻关怀着革命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安危。那时，我因随中央主力红军进攻漳州时跌伤腰部，进医院开刀治疗。八月间伤势好转后，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他概括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毛泽东同志和我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次日我出院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同志，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决定我任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我离开期间，由刘晓同志主持省委工作。

我辗转经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分别召开了各县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检查和部署了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同志在

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由于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先后经永定、上杭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们路经上杭白砂时，就指责我：“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我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他们又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说没有听到传达。他们对此很不高兴。他们还问我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我回答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还没说完，他们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当时，我和许多同志对临时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都很不理解。

他们到瑞金后，就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被迫把县独立团、区独立连、乡独立排，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一时来不及进行补充，敌人便乘机向边区大举进攻。赤卫队由于缺乏地方武装的配合，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眼看着敌人进行烧杀抢掠，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群众也产生了很大的恐慌。干部和群众对这样改编地方部队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大主力红军确有困难。当时，上杭、永定、龙岩三个县城的敌人受了我们三次重

大打击之后，集中几团兵力，三路配合进攻闽西苏区的中心点白砂。我们分析了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心照前次的经验坚壁清野，暂时退出白砂。我们进行紧急动员，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加紧扩大地方武装，从四面包围白砂，打击敌人。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决心将敌人驱逐出白砂。我们召开县级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又和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同志一起开会，总结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五个多月来游击战争的胜利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面对这种形势，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里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和其他地区参考。因此，会后我连夜赶写了给省委的关于上杭、永定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在此之前，我于一月二十一日曾到新泉了解情况，听到汀州以东的地主武装很猖狂，经常攻入苏区，还袭击我们长汀县委所在地河田。我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全局出发，就长汀、连城和新泉的工作向省委报告，提出了几点意见（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附本文后）。显然，这个报告和意见违背了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因而后来就被说成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重要“罪证”。我在《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一开头就写明，对杭、永、岩工作另作报告；只提出对汀、连工作的意见，建议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其目的——一是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破敌人的“围剿”；二是防止驻龙岩的十九路军向连城、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但是，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却说我“没有一句话说到闽西原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

展”，说我“根本上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苏区根据地，向后方逃跑退却的”。这不但完全违反当时的事实，而且也是断章取义的。

从我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两次写给省委的报告和所提的意见，以及从当时闽西杭、永、岩反“围剿”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左”倾冒险主义者攻击“罗明路线”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取消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

第一，我拥护、传达和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关于反“围剿”斗争的各项指示。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总结的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指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是完全正确的。闽西杭、永、岩苏区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采取“分兵把口”的战术，以致被迫退出虎岗，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闽西苏区认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部署工作，取得了许多胜利。一九三三年七月下旬，连城群众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的运动战，在朋口消灭了由漳州经龙岩向连城进犯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正确。

第二，我们总结了五个月来在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胜利经验，其中主要的是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第一次，由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独立第七师，集中优势兵力，夺回了被漳州和广东敌人占领的永定县城，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以后由县独

立团配合地方武装，又打退了敌人对合溪的进攻。第二次，驻上杭县城的广东敌军以一个足团的兵力进攻白砂，我们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领导地方武装和群众在距离白砂十几里的山区隐蔽，晚上袭击进占白砂的敌人，使敌人坐卧不安，三天就退出了白砂。我们地方武装进行追击和沿途截击，敌人死伤很多，狼狈逃回上杭县城。第三次，驻永定县城的敌十九路军一营人，配合地主民团进攻白砂，我们地方武装于中途利用地形伏击敌人，敌人死伤严重，只好从山路逃往龙岩。上述三次打击敌人的胜利，使地方武装和广大干群受到鼓舞，更加相信游击战争的威力，更加相信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就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保卫杭、永、岩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由于猛烈扩大主力红军，迫使边区各县把地方红军独立团、独立连连人带枪编入主力红军，新的地方武装还未能及时建立，敌人乘机向我们各边区进攻。到了二月下旬，龙岩和永定县城的敌十九路军与上杭县城的广东军阀部队配合，以几个团的兵力向我们上杭县中心区白砂进攻。我们估计敌人较强，就照前次的经验退出白砂，县委各机关退到上杭旧县，并动员地方武装包围白砂，袭击敌人。上杭中心县负责同志开会总结游击战争经验和部署工作后，我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心的问题是要杭、永以及闽西党要集中力量依靠我们。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自然要配合其它力量），很艺术的来组织和发展胜利的武装斗争，要从这样胜利的（就是很小的胜利也是好的，只是要常常胜利）武装斗争中来减少敌人对群众的摧残和减少群众的痛苦，从这样的斗争中使

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要从这样的斗争中来发挥我们群众的斗争力量，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力量，来开展我们的斗争。”这是当时边区实际斗争所提出的要求。

第三，临时中央关于“猛烈地扩大红军”的错误指示的贯彻执行，给我们的群众发动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认为，当时杭、永、岩党的最中心的工作，是动员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战胜敌人的斗志和信心，才能使群众相信地方武装的力量，才能克服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我在报告中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的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显然，我不仅反对离开发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工作，而且反对那种脱离群众和脱离客观现实的空谈。我对毛泽东同志这样的革命领袖是极为尊敬的。当然，这种尊敬也不等于迷信。我认为不论是谁领导，如果离开了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同样也不能获得成功。

第四，在闽西的整个斗争部署上，我在报告中提出，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将新成立的独立第八师、第九师的主力向北发展，用最大的力量，迅速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连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连结起来，向永安方向发展。这样，一是可以巩固闽西苏区的后方，迫使十九路军不敢向汀州、瑞金进犯，使中心区免

受威胁；一是能够和江西的广昌、宁都一线的中央红军相策应和配合，牵制从北面向苏区进犯的敌人；三是能威逼和打击进犯新泉、汀连和上杭、白砂的敌人，使杭、永、岩避免陷于孤立，迫使敌人分散兵力，暴露弱点。此外，这一带团匪的力量较弱，还没有得到敌军的配合，容易消灭。如果失去这一有利时机，这一带团匪得到了白军的配合，就会在我们的后方和侧翼进行捣乱，增加我们的困难，象过去那样处于被动的地位。

第五，各边区在开展游击作战中，地方武装要以基干队伍为核心，更多地参加实战，在作战中经受锻炼。苏区内地的地方武装最好调到边区，和比较能打仗的部队一起参加战斗，通过实践来学习战争的经验。要向外推进，先抓住较弱的团匪进行打击，然后就能更好地同白军作战。不估量地方武装的实际战斗力，一开始就硬打强敌是错误的。

第六，在扩大红军方面，我在报告中提出，要加紧动员，迅速造成能战斗的主力，使当地的两个师扩大成三个师。但扩大主力红军，边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应以长汀等苏区内地为中心和重点。因为长汀等县是新苏区，人口多，还没有与敌人直接作战，有潜力扩大主力红军。因此，我提议请省委抓紧时机进行动员，多帮助长汀等县进行这一工作。至于边缘区县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扩大主力红军比较困难。特别是杭、永、岩地区，于一九二八年夏秋间就举行武装暴动，开辟了三县游击区，在长期斗争中，大部分青壮年已参加了红军，一部分青壮年和五十岁

左右的中年，参加了地方红军独立团、独立连和不脱离生产的赤卫队，此外便是老弱妇孺。在敌人的进攻和摧残下，很难大规模地扩大主力红军。但群众愿意参加保卫家乡的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这些边缘区县应先抓紧时机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先解决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较为有利。在这个基础上，再从地方武装中逐步抽调力量去扩大主力红军就比较容易了。但不能整团、整连的都收编为主力部队。这是适应当时群众斗争的情绪和斗争的需要，绝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

第七，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方面，我在报告中提出，为贯彻执行党的整个任务，要首先抓住中心县中心区，使中心县区能在其他各县区中起带头作用。同时，要依照各县区的环境和当地的群众斗争力量和情绪，以及党的力量等具体情况，确定各县区的具体任务。过去党和政府的领导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采取一样的方法，一样的计划，特别是忽视边缘区县和新开辟区县的工作，这是不能巩固地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边缘区县以至新开辟区县，千篇一律地上下层讨论，简单地作政治动员，机械地分配扩大红军的数字，这是不正确的。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也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

此也就极少成绩”。这说明当时的工作方法是需要大大改进的。

第八，在财政方面，我在报告中提出，杭、永、岩边区是游击战争环境，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有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人员的生活就无法维持。

上述报告和意见，是从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事实证明，当正确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的时候，上杭、永定、龙岩老区的形势就不断好转；而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不考虑边区的战争环境，把地方武装硬编入主力红军后，情况就急转直下，遭到了损失。由于地方武装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不能有力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因而使群众产生了恐慌心理。有些群众对我们说：“我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但我的心还是红的，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关于扩大主力红军问题，永定县溪南金沙乡贫农开会讨论提出，在边区边乡应从独立团独立连中以三分之一的比例，分批逐步抽调战士去扩大主力红军，使地方武装能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我和县、区的领导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又如，主力向北发展，赤化连南、汀东南的问题，过去就有过教训。在争取北四、五区，争取岩西北问题上，由于失去时机，当敌人进攻时，就出现了被动的局面。另外，有的地区地方武装也不算少，但由于没有基干队伍为中心，没有经过实战的锻炼，出现了一打大仗就大散特散的情况等等。当时，我作为福建省委和

杭、永、岩的主要负责人，完全从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出发，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按照组织原则由内部向省委报告。但是，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却把报告和意见视为大逆不道，大兴问罪之师。这完全是违背党内民主原则，主观武断、横蛮无理的作法。

他们从反对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和急于贯彻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进攻路线”出发，不区分中心区和边缘区的不同情况，一律要求猛烈地扩大主力红军。当我如实反映他们这一政策在边缘区造成严重恶果的情况后，他们竟不顾事实，反而指责我错误估计形势，反映了“地主豪绅的残余和富农”的情绪，诬蔑我反对扩大主力红军。甚至我反映边缘区因避免暴露，“少先队不戴少先队帽，妇女装假发（原先剪短了，国民党军队来后看见短发要抓要杀），用布包头，恢复旧装”的情况，也被他们说成是对工农群众作了“惨淡黑暗茫无前途的描写”。我在报告中明明指出，如果去杭、永、岩不抓住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根本，即使请毛泽东、斯大林等领袖来演讲也解决不了群众的斗争情绪问题。但是，他们却不顾“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句话的重要前提，抓住后半句对我进行攻击，说“罗明路线”是一条什么“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路线”。

他们不了解在敌强我弱的总的情况下，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不懂得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战术；更不了解当时闽西主力红军只有向北积极行动，才能有效地牵制和打击

进攻的敌人，巩固后方，并有效地配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这一基本事实。他们要求各地分兵把口，硬打硬拼，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进攻路线”。他们也根本无视我主动到杭、永、岩领导游击战争，无视我在报告和《意见》中反复陈词要在杭、永、岩坚持游击战争的事实，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向北积极行动的建议，“根本上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根据地，向后方逃跑退却”，甚至进一步推论说罗明“所以主张向汀连一带发展，不外是因为这一带只有团匪没有白军的缘故。如若白军一来，那当然只有象杭、永、岩一样又是逃跑了”。所以，他们攻击“罗明路线”是一条什么“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

他们不懂得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而只是空喊口号，照搬外国的经验。他们根本不顾中国革命的条件，不顾苏区特别是边缘区斗争的具体环境，不仅要在苏区实行义务兵役制，搞红军的所谓“正规化”，机械地分配扩大主力红军的任务，而且还要普遍搞什么拥苏同盟、反帝同盟等等名目繁多的“正规化”的群众团体。我提出反对千篇一律的、简单化的政治动员，要规定适合地区特点的具体任务；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主张边区为适应战争环境，要精简一些机关团体，以便集中精力领导战争。他们就攻击我们反对政治动员，取消党的领导，犯了“取消主义”的路线错误。

从上述的情况看，所谓“罗明路线”并不是什么错误路线，而是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相对立的、毛

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福建、闽西的具体体现。

二、反“罗明路线”的经过及其恶果

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到瑞金不久，为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钦差大臣满天飞。中央特派员到福建检查工作，抓住我给省委的报告和意见，武断地咬定福建省委已经形成了“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一九三三年春，正当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开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从福建蔓延到江西，波及到整个中央苏区，从党内到团内，直至工农红军内部。这个斗争从一九三三年春开始，至红军被迫长征，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时才结束。

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的紧急任务，要求全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决战。在这个总目标之下，闽赣两省原一、二月份扩大红军的数量，限期于二月二十日完成。从二月二十日起到三月二十日止，两省必须再输送一万新战士到前方。为此，中央局还强调，必须展开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接着，于二月十五日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闽粤赣省委实为福建省委）。这个决议认为，省委已经“处在一

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已经“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即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二月二十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给“罗明路线”戴上了“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帽子。这样，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就在福建苏区开展起来了。

苏区中央局发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我是在上杭看到《斗争》报的文章时才知道的。后来，省委通知我立即回汀州。我在赶回汀州的途中，遇到了从汀州来的张鼎丞同志。我便问他，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说，他们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我说，我们工作上有许多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如果是路线错误，为什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根据地能得到这样快的扩大？我们并没有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和边缘区应有所区别。就是在杭、永、岩地区也没有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哪里是什么路线错误？

我回到汀州，又接到通知，要我赶往瑞金进行检查。到瑞金后，中央局几个干部找我谈话，批判我的“错误”。接着，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我谈话，对我进行批评。当时，我就问他：我自己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由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县区参加游击战争，为什么说是“退却逃跑”呢？他说：从路线上说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打就变成“游击主义”了。他反问我，在边缘县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我说，边缘县区要进行游击战

争，随时打击敌人的进攻，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逐步地、分批地扩大主力红军。他当即武断地说：这是“富农路线”；你说听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么听吗？我说：这是永定县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正如列宁所说：“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后来，中央书记和我谈话。他劈头就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缘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缘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他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最后，他要我回福建在省代会上进行检查。

我在瑞金期间，住在叶坪中央局的一个房间里，白天由中级干部开会批斗，晚上由一般干部开会批斗，一连批斗了好几天。有一个晚上，就在附近召开了一个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气氛很紧张，不断高呼口号。有个青年干部提出要把我枪决。后来中央局的杨尚昆同志上台讲话，作了解释，气氛才缓和下来。

福建省委于二月二十四日在汀州召开省临时代表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央局派人参加。福建省委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真等同志都出席了。我照党中央的决定在会上作了检查。会上虽然对我进行了

批判，但是各地代表在讨论中仍有许多不同意见。例如，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就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进攻的。否则新泉根据地就不能巩固。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说：毛主席号召开展游击战争是正确的。罗明同志和我们一起照毛主席的指示打了好多次仗，取得了胜利。当时我们对敌人每次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都侦察估计得很准确，打击敌人的部署很细致。如果各区乡切实这样做，可以使敌人受到更大的打击。中央代表插话说：“对敌人的估计是一般参谋人员的常识，没有什么奇怪的。”上杭、永定的代表坚持赞成采取逐步分批扩大主力红军的办法。他们说：“留得红色区乡在，可以不断出红军。”大会由中央代表作总结，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和撤销杨文仲的新泉县委书记职务的决定。杨文仲也曾经给省委写报告，汇报新泉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他写报告和报告的内容我都不知道。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把杨文仲说成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并且怀疑和追查我和他有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光明磊落，彼此只有革命工作关系。杨文仲被批斗后调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后来在长征途中光荣牺牲了。

正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和三月上旬，中央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当时，周恩来、朱德同志和中央主力红军的领导同志，在实际的战斗中发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方针行不通，所以坚决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原则，诱敌深入，二战宜黄，缴枪万余，并继

续追击敌人取得了胜利。后来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于闽西连城，在地方武装的游击战配合下，消灭了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收复了连城、清流、宁化等大片地区。但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同志，反而以为这是他们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因此，他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福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首先在省级机关展开，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一直搞到每一个支部、区乡。在这一斗争中，他们往往采取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和处理党内斗争，提出了“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将他粉碎”，“无情打击”等等口号。不仅对我，而且对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也是这样。例如中央代表就曾指着张鼎丞同志的鼻子说：“你张鼎丞之流，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也要“无情打击”，“用铁拳进行粉碎”。特别当时是在一九三一年肃反扩大化之后，突然听到要与“罗明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人就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罗明是“反革命分子”。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许多很熟悉的同志都不敢同我和其他所谓犯了“罗明路线”错误的同志接近。

当时参加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志，不少人并不真正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省委派李明光、黄宜章、张思垣等同志到前线去开展这一斗争。当他们了解情况后，反倒同情起“罗明路线”来了。有的随随便便应付了事，好回去交差；有的抵制了这一斗争。例如，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

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李明光，不愿在连城前线开展这场斗争，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压制下，不能打游击战，因而在同敌人硬拼硬打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党的这些优秀干部，都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受害者。特别是象李明光这样的同志，是值得党和人民永远怀念的。当时群众为纪念李明光同志，把连城县改为明光县。

在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还实行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口号下，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几乎都不能倖免。例如，福建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同志，由于不愿检查所谓的“罗明路线”错误，被指责为“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上来向党进攻”的机会主义者，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在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军区党代表大会上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军区的一切职务。张鼎丞同志由于不同意反“罗明路线”而被扣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的帽子，被撤销了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是一九二六年的党员、广州全国农讲所毕业的学员，是龙岩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左”倾机会主义者说他是“罗明路线”的拥护者，不断遭到打击。被斗争后，先把他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调到省军区宣传部，后来又调到一个地方去领导几十人修筑工事，最后，把他调到军区当勤务员的教员。郭滴人同志随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病逝。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和省团委书记陈荣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而受到批

判。省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事部长游瑞轩、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都被调离了原职，另行分配工作。其他县区的领导干部，也不断有人受到批斗、撤职。如永定县委的罗禄山、关坤林等，武平县委书记陈玉梅、汀东县委的陈玉珍、熊丁州等都遭到打击，并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这都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发动反“罗明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三、在福建反“罗明路线”与在江西反邓、毛、谢、古的关系

“左”倾教条主义者反“罗明路线”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不仅反映在福建，而且反映在江西。

因为“罗明路线”问题，我不仅受到批判和斗争，而且被撤了职。接着，把我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我从苏区《斗争》报上，看到当时党中央的宣传部长发表了一篇题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继续对我进行批判，而且把斗争矛头指向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和江西省委。该文强调批判“江西的罗明路线”，并要求把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我看到这篇文章后，曾向中央宣传部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到江西工作，为什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中央宣传部长回答说：江西省委的错误，同你的错误一样，所以也这样批。

事实很清楚，邓小平等同志在江西，曾经抵制了王明

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江西省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不仅在福建大反“罗明路线”，而且在江西大批邓、毛、谢、古。

早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央局代表为在江西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方针，在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大批所谓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又作“报告”，又作“结论”。并且在三月三十一日作出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说什么“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并且说“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那种“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同年四月十五日，在中央局的《斗争》报上，又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接着，于五月四日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文章和决议都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击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同年五月五日，中央局又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继续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样，大反“罗明路线”就从福建发展到江西。在中央苏区，在党、团组织内部，在工农红军之中，“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各级干部大受其害，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

了很大的损失。

四、反对“罗明路线”的实质

前面的事实已经说明，罗明和反“罗明路线”者的根本分歧，说到底，就是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要不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问题。

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发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打击中央苏区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苏区得以全面贯彻。

很清楚，他们可以撤销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无法消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在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深刻影响，无法消除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尽管他们诬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是什么“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奇怪得很，在苏区还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套办法灵，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那一套就是行不通。为了贯彻他们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他们必然在整个苏区进一步大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大整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干部。他们对“罗明路线”的大加讨

伐，只不过是公开打出的旗号而已。

他们在批判我的文章中明白地宣称：“毫不迟疑的、坚定的同罗明、杨文仲等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是我们党顺利执行进攻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在批判邓小平等同志的文章中也写道：要“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边县党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其报告中也谈到：“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

毫无疑问，我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决不是反对我个人，也决不是反对我的缺点和错误，而是因为我和苏区广大干部坚信和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福建苏区传达和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指示。我给省委写报告之所以成了弥天大罪，也就是因为我在报告中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闽西的实际情况，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同时，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早已被他们撤销了，而我在给省委的报告中仍然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最好的领袖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个莫大的刺激。当时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就责问我：你为什么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

论？后来，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竟然讽刺地说：“企图拿罗明与斯大林比较，那正象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耍弄“指桑骂槐”的手法，公开骂的是罗明，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同志。

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批判我的一段寓意深长的话。他们写道：“他在闽西这一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继续不断的犯了许多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一贯的不相信闽西群众的革命力量，对于闽西群众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处处想依靠中央区的大红军来打平天下。大红军一来他立刻高兴的发狂，大红军一去他立刻失望的哭泣。一九三一年八九月间红军占领汀州，罗明跟着卢德光立刻抛弃了原有根据地，把省委搬到汀州。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东下占领漳州，罗明又发疯般地把省委一切工作丢开，随大红军同到漳州，至于如何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如何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巩固党的领导作用，如何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如何在发动群众积极性的上面扩大地方武装，创造铁的红军，坚决打击和消灭国民党的进攻部队，一切这些问题，在罗明同志看来始终是次要的。罗明同志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现在，发展成为公开的、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是毫不足怪的”。这不仅是歪曲事实，而且是别有用心。

所谓“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之一，是“处处想依靠中央区的大红军来打平天下”。但是，我在《意见》中明明写着要“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这一点他们当然

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我一贯地不相信闽西群众的革命力量，那么又怎样说明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不断获得发展和壮大呢？他们单单挑出两次军事行动作例子，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闽粤赣特委主要负责同志决定闽西红十二军进攻汀州。虽然我没有参与作出这一决定，但我认为，这次军事行动在客观上起到了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相配合的作用。当时我与张鼎丞等同志一起随红军独立团行动，在永定、上杭进行游击战争。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向白区新泉进击，占领了新泉。红十二军占领汀州后，进攻杭、永、岩的敌人受到我们地方武装的打击，已经退走了。前委决定把闽粤赣边特委改为省委，通知我和张鼎丞同志回汀州。卢德光携款逃跑后，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红军前委命我接任省委书记的。当时省委抓住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形势，领导群众和地方武装，不仅恢复了杭、永、岩老区的大部分，而且扩大了许多新区。向东扩大到连城、新泉，与宁化、清流等县相连；向西扩大到武平；向南扩大到平和、饶平和大埔游击区。闽西根据地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后，省委不仅在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而且还在新老区动员了大批青、壮年补充中央主力红军。毛泽东同志曾先后三次去调查的上杭县才溪模范乡，当时就是扩大主力红军最多、最好的典范。这怎么能够得出“抛弃原有根据地”的结论呢？

一九三二年四月，因中央红军久攻赣州不下，中央在

江口会议上决定，把红军调往福建攻打敌人守备较弱的漳州。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等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到了汀州后，通知我召集福建省委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上述领导同志外，还有省委常委张鼎丞、刘晓、谭震林、郭滴人、李明光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分别作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作战部署和省委如何做好政治动员、供应粮食、组织运输、地方武装配合行动等方面的指示。会后，我陪同周恩来同志到长汀县地区检查准备动员的情况。后来，毛泽东同志亲自打电话给省委，要我随主力红军行动，以便与漳州、厦门地下组织联系，及时做好配合工作。我们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积极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在取得了攻占漳州、消灭敌张贞师的巨大胜利后，我们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进行开辟新区、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开展抗日宣传、向中央苏区运送缴获的军事物资等工作。所有这些，难道不是省委应做的工作吗？他们把我们贯彻上级指示的正确行动，当成什么“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地打击，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他们所以这样毫无根据地对我横加指责，原因就在于这两次军事行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并且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这违背了他们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我的“错误”不在于“抛开原有根据地”和“丢开省委的一切工作”，而是在于我拥护并积极参加了这两次军事行动。他们拿这两次军事行动来攻击我，这倒是“毫不足怪”，其矛头所向，是

十分清楚的。

他们把曾经给毛泽东同志扣上的什么“富农路线”、“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大帽子，也一古脑儿地扣在我的头上；同时，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在福建闽西根据地，而且在整个中央苏区展开，进而扩大到各苏区和全党，这就清楚地表明，这场斗争是他们早已开始的反对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活动的继续和深入，是他们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

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极大地削弱了党。”

由于通过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把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打下去，就使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一系列“左”的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得以进一步的全面的贯彻。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他们完全抛弃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用阵地战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正规战来代替人民战争。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

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批判“罗明路线”时，曾声称他们要“创造出罗明、杨文仲这类怯懦的机会主义者所不敢梦想的光明灿烂的新的苏维埃的世界”。事实的进程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所创造的不是光明灿烂的苏维埃新世界，而是“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的危机关头举行的遵义会议，在军事上彻底纠正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这才真正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标志着我党已从幼年时期走上成熟时期。

遵义会议的精神是林伯渠同志给我们传达的。当时，他还对我说：过去党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前两次“左”倾错误，曾得到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同志的启发和帮助；这次党反对在国际“进攻路线”影响下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完全靠我们自己起来纠正的。这说明了我们党是英明、正确的，是大有希望的。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进行了机动灵活的大规模运动战，四渡赤水，以各种佯攻迷惑和调动敌人。一月底首渡赤水；接着又回师二渡赤水，反攻桐梓，重越娄山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击溃和消灭大部敌人之后，又三渡、四渡赤水，再渡乌江，佯攻贵阳，然后，中央红军以急行军向贵州西部挺进，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经历了千难万险，最后胜利地到达陕北根据地。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也是遵义会议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取得的光辉胜利！

五、几点经验教训

我们的党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战斗历程，经过无数次的艰难曲折，终于取得了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每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这种体会尤为深刻。

我总是想，党对我培育了五十六年，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要忠心耿耿地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我们党的事业是发展的，而发展党的事业，是需要借鉴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可以教育和鼓舞我们继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前进。

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说，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中央苏区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严重的灾难，从根本上说，就是他们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不论是谁，一旦离开这个基本原则，即使是毛泽东同志本人，也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但他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就是因为脱离了这个基本原则。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左”并不比右好，指导思想上的右和“左”的错误，从陈独秀到王明，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莫大的危害。

其次，要始终如一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应当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党过去坚持这个立场，使革命转败为胜，化险为夷；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开创振兴中华的新时期，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的困难，甚至遭到新的挫折。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也必将能够战胜困难，夺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从历史上来看，一个革命者乃至革命领袖，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立场，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那是要经受长期历史考验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我们党的时候，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都程度不同地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然而，由于他们能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终究冲破了“左”的指导思想的羁绊，实事求是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几十年如一日，不断为党和革命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立场，即使是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会犯错误。然而，由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我们党的中坚骨干，也终究能够坚持这个立场，领导党和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历史证明，我们党不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郑重的、大有希望的党。

再次，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精神，正确对待党内斗争，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根除那种“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同时改变那种涣散软弱的毫无战

斗力的状态。

最后，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的是非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当纠缠过去，也不应当计较个人恩怨。而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增强党性，增进团结，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关于“罗明路线”的问题，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党、国家和各族人民有了巨大的进步。让我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由于这个问题时过已久，现在的追忆和叙述，难免会有不准确或者错误的地方，我诚恳地希望了解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共同研究，给予指正。

（编者注：罗明同志现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省委：（杭龙工作另作报告）

依据敌人在大举向中央区中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第一，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联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面发展，这是巩固闽西与闽北打成一片发展计划中最迫切的工作，我们要抓紧这个最好的时机来进行这一工作。

我虽向震林同志提过几次，要依照这点来布置军事的工作，党和政府工作也要找到这一重心。据震林同志说东南指挥部和省委省苏这一方面还是采取缓进的计划。我认为缓进是失了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可以抽出很多力量（关于军事力量、党和政府的力量），应该采取猛进急进的速度，完成这一工作。

我的理由是这样：

（一）这一带团匪的力量很弱，目前还没有得到白军直接的配合，很容易消灭他，在消灭这一带的团匪斗争中，可以锻炼我们汀、连、新泉一带的地方武装（只要一个小的主力来领导），在许多小仗当中来强大他们的战斗力，以便很快的能与白军打仗；同时，可以在这样的发展斗争中，取得许多小小胜利，来提高汀、连、新泉一带群众斗争的情绪，锻炼群众中在战争的自信力，这是大战紧张中一点非常必要的工作。

（二）这一带区域的争取与开展，不但是汀、瑞最及时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开展，可以威迫敌人打击敌人，对新泉以及对白砂的前

进，使我们多很多时间来加紧长汀、连城、新泉、上杭各地紧急动员的工作，多发挥我们战争的力量，威迫敌人，打击敌人，使敌人不能前进，不能急进，不能顺利与各路配合，使敌人疲倦削弱，暴露更多的弱点……争取时间……，一天一点钟都要争取。

(三)要在这时才比较好争取这一带新区域的群众工作，和巩固我们党和政府在这一带群众中的坚固领导。

(四)过去争取北四、五区，争取岩西北，虽然在工作上有许多严重的错误，但失了时机，不能及时的争取与巩固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错误。

现在争取连南、汀东南……这一工作，要学习北四、五区与岩西北的严重教训，再不要失了这一最好的时机。自然不是说以后就不能进行。但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抓到这个时机，我们可以得到多倍的成绩。

过去因北四、五区工作垮台，以及北四、五区邻近区的工作很差(上杭的华家亭、新泉的新泉、芷溪一带)，十九路军和傅柏翠最近就有可能向新泉方面游击，如果敌人向这方面游击时，就要增加我们在连南、汀东南工作一带的困难。一方面匪、地主、富农得到白军直接的配合，要更加活动起来，在我们后方、侧面及内面来捣乱；主要的群众方面，因为我们过去工作弱，在战争紧张中生活方面和情绪方面都要受到大的影响。我们要估量到那时的情形，及时建立这一带工作，不要到那时来慌忙，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就可以消灭那时慌张应付的状态，这也是龙岩和宁化方面所得到的教训。

根据上面四方面，我们应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

第二，集中红军行动及扩大红军方面：我们应注意到十二军头上了，我们要迅速造成新的主力，要抓紧第八师、第七师，扩大和加强政治军事上的领导，使这两师能扩大到三师，成为能集中行

动，与十二军一样的主力。这个主力的行动，应该向闽西与闽北之间一带积极行动，以争取永安、消灭卢兴邦为比较常定的目标，这样就更加更有利与北面主力配合而又能与闽西联系。

我认为这要迅速做到。

我认为独立八师可以留一团配合特务营（可改为八师第七团）在杭、永行动，配合杭、永二个独立团及岩太游击队（永定独立团只有一连配合游击队等有一团的兵力；上杭不久即可成立一独立团；岩太游击队有二百余人，等于一个独立团，我认为名义可以不拘束）来行动，来打击向杭、永进攻的敌人；同时，要配合各种力量各方面力量以夺取龙岩、上杭城为比较常定的目标，配合第十师向武平与江西会昌、寻邬联成一片。

在杭、永应保存八师的名义，使在群众中不致产生不好的影响（……）。

现在的八师可抽一团，及再扩大一团，由七师调一团，新成立一师，可以用十二军第××师的名义。因十二军在闽西有威信了，很迅速的调动连城、□□来行动。在连城方面还有第三、四独立团及第九师一团来配合。

必要时，第七师、第九师可以配合起来集中行动。我认为军区指挥部应立即搬到南阳来和政治部一块，多注意布置新泉、连城向闽北发展的军事行动与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工作。一定要迅速加紧这一方面向北发展，使闽西、闽北巩固的打成一片，积极的与北面主力来配合行动，来消灭敌人，从北面的进攻；同时，消灭十九路军向闽西方面的进攻。

如放松一点，如放了这样最好发展的时机，那就是大大的罪恶！

这样不但不会妨害闽西的巩固，相反的，只有如此才能配合闽西的斗争，才不致使杭、永孤立。

在杭、永方面可以成立一个分区来指挥。

上述的意见我已和谭震林讲述几次了，他还没找到这个时机，及时的迅速的做到这一点。

在这时扩大红军应特别以长汀为中心，不要放过这一时机。长汀在目前战争环境紧张中，比较容易进行政治动员，打破党内和群众太平享乐的观念；同时，又不会产生很恐慌的状态。这是最好动员的时机。

上杭环境就比较不同了，扩大红军就比较困难了，当然我们要加紧动员……。

省委请作多帮助长汀进行这一最中心的工作啊！

我们在上杭会再找到扩大红军最有经验的来长汀，帮助扩大红军工作。

以前派了五个人，不知工作如何？

至于其他各县如永定、武平以至上杭，我认为在敌人进攻比较紧张当中，应先抓到这个时机来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从这样的地方的紧急动员中来提高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斗争情绪，从中来扩大主力红军，不但在群众比较容易直接动员，就是独立团、独立师、赤卫模范营、模范中队中也可以比较有组织的抽调大部分来到主力红军（过去有这样的事实）（鼓动中来抽调不是改编硬编）。这是适应群众的斗争的情绪和目前的斗争的需要，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

我们强大地方武装中要与主力红军的扩大和联系、宣传鼓动中与组织上都是如此。

关于扩大红军问题，我以前有两封信，此处不再说了。

第三，关于地方武装方面：我以为目前最中心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去实际参加作战，从作战中来锻炼。

在边县边区的地方武装，要向外抵进，抓到团匪来打击；对白

军，不硬打，采取游击和运动战，要从打小仗中来锻炼，要从打仗中胜利中来提高他们的勇气和斗争情绪，学习战争的经验。

分兵保口自然是绝对错误；不估量地方武装力量，硬打强敌也是错误的。一定要地方党和政府很小心的领导，在比较内地的地方武装，最好调到边区参加作战，最好时常配合比较能打的部队多打仗。

照中央政府命令，加紧政治军事训练和党的领导是对的，特别是检查阶级成分和政治军事成分。

同时，我们应特别注意：

打一次胜利的小仗，胜过关门训练十天，胜过打三次野操。

先有一连基于能打的赤卫军来领导，胜过三五连大家同样的赤卫军。

上杭过去编了很多赤卫军模范营、模范队，也打过了一些仗，这次打大仗，大散特散，这是因为实际作战没有中心基于能打的部队来领导和配合。

我们要了解推动地方武装发展，不断对主力红军一个很好的配合，而且推动群众斗争，转变当地群众斗争情绪一个主要的工作。比于江西打两次大胜利，对这方面群众中自然一个大鼓动，但如果当地地方武装时常打败仗，群众时常受摧残，群众斗争的情绪还不能更积极发挥，就是这个原因。

第四，关于各县区工作：我认为整个任务之下，要找到中心县中心区，使中心县区能在其他各县区中起领导作用。

同时，要依照各县区的环境和当地群众斗争力量和情绪，以及党的力量，以找到各县区特殊的任务。

过去党和政府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一般的方法，一般的计划，还是不好的。特别是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巩固的、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的在上下层讨论，一项一条就是扩大红军，分配人数，各区……，第二条，就是简单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动员不能照计划做到我们应做的工作，而且会妨害我们的工作。

省委在过去计划上，都机械的规定永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

我认为目前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界，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地方武装不断的在胜利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使群众更相信地方武装的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

“永定上下溪南地方武装顽强的斗争，对整个发展的配合与对主力红军行动配合的力量，胜过出三百红军送到前方的主力。”近来永定、上杭工作比较有点好转。

如果这样来领导当地工作，又会进步又更好，出更多红军。

近来上杭、永定方面，我们就靠这样的领导来转变，来在目前的环境中来动员群众斗争，已得到了许多战绩了。

罗 明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新泉

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黎 玉

山东是我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在党组织建立之前，以王尽美、邓恩铭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先驱者，就在济南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一批先进的教师和青年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山东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王尽美、邓恩铭两同志作为山东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从此山东建党的活动蒸蒸日上。此后参加党的领导工作的有王翔千、马馥塘，以及刘俊才（刘子久）、傅书堂、丁君羊（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侄子，后脱党）、杨一辰等。刘少奇同志曾告诉我说：“我们党的组织在北方来说，除了河北省外，就数山东党组织了，是有基础的。”

党组织建立后，领导山东人民进行了反对德、日等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党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批革命者倒下去了，又一批新生力量起来了，前几年被打散了，过几年又聚集起来了，显示了共产党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

但是，革命的发展是曲折的。由于山东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经验不多，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期间，也盲目地执行了“左”倾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不考虑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轻率地领导暴动（如一九三二年的苍山暴动、沂水暴动、日照暴动、博兴暴动等），遂使党组织经过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力量毁于一旦，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和屠杀，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并中断了与北方局和党中央的联系。山东党组织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基本上处于无组织领导的状态。但星星点点未被破坏的支部与零散的党员，并没有被一小撮叛徒如王复元、王天生、宋鸣时、陈衡舟等的嚣张活动与韩复榘的捕共队的追捕所吓倒。他们有的揩干身上的血迹，勇敢地与群众一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有的自己拿出路费到上海、北京找上级党的关系，也找过进步的教授，虽经多次努力也没有达到目的，甚至险些遭到危险。为了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美好的理想，他们仍然毫无畏惧地继续战斗着。这一期间，积极活动的有赵健民、林浩、王文轩、徐运北、鹿省三、刘盛玉（又名刘仲莹）、单洪等同志。特别是赵健民同志，主动地收集零散的组织，谨慎地发展党员，形成了一个核心。

但是，革命的发展是曲折的。由于山东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经验不多，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期间，也盲目地执行了“左”倾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不考虑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轻率地领导暴动（如一九三二年的苍山暴动、沂水暴动、日照暴动、博兴暴动等），遂使党组织经过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力量毁于一旦，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和屠杀，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并中断了与北方局和党中央的联系。山东党组织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基本上处于无组织领导的状态。但星星点点未被破坏的支部与零散的党员，并没有被一小撮叛徒如王复元、王天生、宋鸣时、陈衡舟等的嚣张活动与韩复榘的捕共队的追捕所吓倒。他们有的揩干身上的血迹，勇敢地与群众一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有的自己拿出路费到上海、北京找上级党的关系，也找过进步的教授，虽经多次努力也没有达到目的，甚至险些遭到危险。为了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美好的理想，他们仍然毫无畏惧地继续战斗着。这一期间，积极活动的有赵健民、林浩、王文轩、徐运北、鹿省三、刘盛玉（又名刘仲莹）、单洪等同志。特别是赵健民同志，主动地收集零散的组织，谨慎地发展党员，形成了一个核心。

以上就是我去山东之前山东党组织的一些基本情况。

1935年秋 去山东开展工作的经过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春，我在河北省直南特委任特委书记，不久又担任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以河北省委

代表的身份领导这两个特委的工作。一九三五年秋冬之际，在冀鲁豫边区特委统一布置下，我到山东濮县、范县巡视，并在濮县古云集徐庄支部蹲点，开展工作。我发现这一带有许多贫苦农民没有饭吃，支部里的大部分成员也缺粮、缺衣。这时，河北省委指示各地区发动武装斗争，成立红军（这又是一种“左”倾盲动性质的错误决定，后来刘少奇同志来北方局纠正了这个错误）。根据省委指示，特委也布置了几个县的行动，但均未成功。徐庄是个穷村，座落在黄河大堤之下，常闹水灾，收成不好。我发动支部把穷人会组织起来。穷人会和支部同志反映，群众卖儿鬻女，冬天缺衣少粮，生活贫困不堪。经过讨论，决定首先对地主户进行调查，然后进行分粮、吃大户，夺取武器的斗争。斗争连续进行两次，参加的群众都得到了一些粮食和衣被等物，同时夺得了少数枪支，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徐庄农民斗争取得胜利后不久，支部有位姓徐的同志向我报告：有一个济南乡师的学生失掉了组织关系，想见见你。当时我想，既然是和上级失掉联系的同志，一定心急如火，就立即回答可以见面。大约过了几天，这个人就来到了徐庄，他就是赵健民同志。我接见了，他向我详细地谈了他同上级党失掉关系的经过。大致是说，一九三三年山东省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再也没有找到山东省委关系（实际上他们已经组织了济南市委，当时没有说到这个情况）。他是济南乡村师范的学生、支部书记，听学生们传说濮县分粮吃大户斗争胜利了，心想一定有领导同志在此，所以来找。我把当时全国抗日运动形势和红军北上

抗日以及八一宣言内容等情况向他谈了，并且告诉他，我是河北省委驻冀鲁豫边区的省委代表，这次是来濮县、范县蹲点的。山东省委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我可以给你问问河北省委，把关系接上。

赵健民同志把接关系的人名、地点留给我，同时我们还约定了代号。他很迫切地要求参加濮县的农民斗争。我未同意，嘱咐他：“不要参加濮县以至范县的斗争，回济南后，一般也不要搞什么斗争，好好巩固乡师支部，以便接关系时，省委好找你们。”这时我还不知道山东已无省委，健民同志也不太清楚。总之，我们初次见面，就谈了很多，彼此有说不完的话要说。健民同志的诚恳虚心和热爱党的事业的精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理解一个与组织失掉关系的同志找党组织的迫切心情。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天亮以后健民同志才告别回去。

重建山东省委

一九三六年初，我回到冀鲁豫边区特委的驻地——河北省磁县，把在鲁西濮县见到赵健民同志的情况、赵健民的要求和通信关系报告给河北省委。约在一个月后，河北省委负责同志高文华来到邯郸一带，传达北方局的决定，派我到山东恢复与重建山东党组织，担任省委书记，其他负责人和工作由我酌情办理等等。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要求将冀鲁豫边区所属鲁西一带的党组织关系转交山东，并同特委巡视员刘宴春同志（又名刘耀先）解放后在

河南省担任农委和监委负责工作，十年浩劫期间被“四人帮”在河南的党羽迫害致死，已平反)一起过来。当时我没有再去天津北方局接受具体指示。因为北方局说对山东具体情况一点也不清楚，也就无必要再去北方局，只好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去工作。

一九三六年四月，我带着中央北方局给予的庄严任务，骑上一辆破旧自行车，告别磁县，途经成安、清丰、大名进入山东，当晚抵达濮县古云集徐庄，一天赶路近三百里。沿途油菜满地，小鸟飞翔，春意盎然，景色宜人，真是“鸟鸣杨柳青，遍地黄花香，彩蝶在引路，助我到徐庄。”在这里，党支部的同志纷纷前来看我，大家互相都很熟悉，希望我再领导他们向地主豪绅们进行分粮斗争。我询问了支部工作情况，并向他们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政策，说明不能再搞这种形式的斗争了，目前应该好好地巩固支部，发展穷人救国会，把工作中心转到抗日救国、团结广大农民群众方面来，要他们警惕豪绅地主和韩复榘的破坏活动。同时告知他们，我到山东来工作了，以后会有人来领导你们的。……翌日清晨，我告别徐庄的同志，登上黄河大堤公路，直向济南府奔去。途中遇两个匪徒，想劫我的车子，被我机智地甩掉。傍晚，到了预先约定好的接头地点——济南全福庄小学姚仲明同志那里。

姚仲明同志（姚梦龄）是济南乡村师范的毕业生、全福庄小学教员、地下党员。他热情地招待了我。我们畅谈了抗日救国的形势，真是一见如故。我请他尽快地通知赵健民同志来接头。大约过了两、三天，赵健民同志来了，这

是我同他的第二次见面。我向他传达了北方局的决定，他很高兴地表示拥护，并且说：“从一九三三年山东省委被破坏以来，失掉与上级党的关系，几年来千方百计找上级党，均未能实现，焦急万分，数年愿望今日得以实现，真高兴极了。”以后，我和赵健民同志在野外又谈了几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他向我反映：（一）党组织情况；（二）我们的朋友和社会关系的情况；（三）敌人统治的情况，即韩复榘统治的情况。关于党组织的情况：济南市的党组织不仅有济南乡师支部，还有济南高中支部、济南新城兵工厂支部；此外还有育英中学、第一师范、正谊中学、惠商职业学校等的一些党员以及零星小支部和零星关系。其中发挥作用最大的要数济南乡师支部，其次是济南高中支部。济南乡师党支部在赵健民同志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追捕、破坏，保存了党的力量，并且正确地运用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既发展了群众组织，又掩护了党。如他们发动党员通过学生读书会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同学读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的书籍，以提高他们的觉悟。领导这些工作的相继有赵健民、姚仲明、王文轩、自学光、景晓村、于杰、高启云、刘少悦（刘士侗）等同志。

济南高中支部比济南乡师小一点，负责人是林浩（尹圭璋）、徐运北等同志，他们对这个支部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此外，济南兵工厂也保留下来一个工人支部。在这些支部的基础上，曾组织了济南市委，赵健民同志任市委书记，王文轩同志任市委宣传部长，兵工厂支部某同志任组织部长；还成立过山东省临时工委，刘盛玉同志任

X 21

书记，赵健民同志任组织部长，鹿省三同志任宣传部长，黄仲英同志任农民部长，但是个空架子，没能起到组织作用。外县还有一些党的关系：如莱芜县委、寿光县、东阿县、单县；鲁北有平原师范以至聊城乡师。这些地方或有支部，或有党员关系。在鲁西北地区还组织过临时特委。但这些地方上的组织力量不强，形不成领导作用。这些组织和党员同志在恢复山东党组织的工作中是一批很宝贵的关系与线索。

我们的朋友和社会关系不多，最著名的有泰安范铭枢老先生和冯玉祥在泰山上的卫队长魏风楼，还有若干山东救国会会员。济南乡师左派教职员田佩之、杜云庐、武新宇、钟星帆、杨荆石、王绍洛等同志在掩护进步青年，配合党支部开展工作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敌人的统治情况是，韩复榘搞法西斯统治，实行白色恐怖，经常派警察清查户口，禁止抗日救国宣传，设立了捕共队。叛徒宋鸣时当队长。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我们考虑到全福庄小学情况比较复杂，长期住下去对姚仲明同志不利，遂商定离开那里，暂时在北园沃家庄西头路南租一间房子，俩人一起住在那里。在此期间，我和健民同志还研究了干部情况，并亲自同干部见面谈话。基本上掌握了全面的情况后，我们认为重建省委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正式建立山东省委。

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郊外一个有松柏树的坟地里召开会议，宣告重新成立。根据北方局的意见，由黎玉任省委书记，赵健民任省委组

织部长，林浩任省委宣传部长。在这次会议上，我说明了重建山东省委对山东抗日救国运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形势确定了今后的任务。今后我们的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一切抗日爱国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发展壮大抗日救国运动的力量。为此，我们要接受过去省委遭受大破坏的教训，既要小心谨慎地、又要积极地恢复那些与党失掉联系的县委、支部和党员的组织关系和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发展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反对关门主义，注意发展新党员；巩固党和一切群众团体组织，同时防止敌人破坏。我们的机关人员要短小精干，选择那些对党忠实可靠又能脱离生产、愿意为党跑工作的同志到省委机关来工作。我还指出，赵健民等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克服了重重困难，联系了不少的同志，积聚了力量，所以乡师支部的经验可以作为学校支部的典范加以推广。在这个会上，我们决定抓紧挑选一批干部，首先建立各地区特委（即等于今天的地委）。济南市委可逐步建立，先由赵健民同志负责兼任，林浩同志协助联系各学校组织。因为建立市委需要这样的干部：既要有领导地下工作的经验，又要对革命忠诚、热情，能脱离家庭和职业限制的党员，而当时还挑不出来具备这样条件的同志，所以就放慢一点配备。同时还决定下达通知和文件时，用山东省工委名义，并且尽量用口头下达，以便于保密。

当时，正值刘少奇同志与党中央在北方局地下刊物《火线》上连续发表决议、文章，批判和纠正王明的“左”倾

路线错误，但尚未点明王明“左”倾路线，而是以批判立三路线为名，来批王明路线。当然也点出了立三路线之后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倾向。于是，根据这个精神在济南市组织党内学习，以纠正山东工作中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为此，我们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不再专门布置庆祝活动，各自在许可的环境下，和群众一起学习抗日救国文献，研究如何解救劳动人民的苦难，停止了过去那样把五一节或其他纪念节日当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的做法。也不再搞散发传单、宣言，组织罢工、游行示威等活动。

省委建立之后，迫切的工作是首先物色一批能脱离家庭与学校的干部，担任党的机密工作。经与健民同志仔细研究决定，调寿张县乡师支部学生刘懿祥同志（改名章士劳）担任刻蜡版文印员的工作；惠商职业学校孙洪同志担任省内交通；濮县徐庄的徐宾同志担任省委与北方局直接联系的交通，往返于济南与天津之间。这些同志服从组织分配，迅速地开始了工作。

一连串的不幸事件

省委建立后直至发动抗日游击战之前，山东我党一直处在韩复榘法西斯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各个组织和大多数同志都能细心谨慎地注意掌握秘密工作的原则，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如警惕在接头与会议地点、宿舍、街道有无形迹可疑的敌探、警察及其耳目的尾随等等。所以在省委重建后的最初几个月没有出什么问题，工作开展得比较顺

利。但是，后来有几个同志被捕，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小的损失。

一、姚仲明同志被捕。七月初的一天，房东（和赵健民同志较熟）急急忙忙地来告诉我们说，有大批警察到村东头你们的朋友（指的是董临仪）住的那家搜查，象是抓了人，你们赶快躲躲吧。于是，我和赵健民同志沿着菜园走出城，在大道旁一个破厕所边蹲下观察动静，果然看到有一群警察。第二天才知道是姚仲明同志被捕了。被捕的原因是，韩复榘的特务队在邮政局查出上海给他寄来的《救国报》。姚仲明同志被捕事件发生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出现，当即采取了措施：第一、凡是订《救国报》的同志，赶快采用假名字和地址。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永生》等刊物可在市内书店购买，不要邮购。针对邮局检查抗日救国期刊这一事件，可在读书会内讨论蒋介石、韩复榘反对抗日救国的倒行逆施，并通过报刊写文章批判这种反动行为。第二、进一步发展抗日救国会员，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组织在山东抗日救国会内及学生救国会内，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在党内要进一步进行秘密工作的检查。第四、指定专人打听姚仲明同志被拘押的地方，设法营救。

我和赵健民同志于当晚离开驻地，到济南商埠小店去住。这些小店住的大都是从农村来济南打官司的。我和健民同志就装成来济南打官司的人，起了临时的姓名，分别住在两个小店里。第二天又换了个小店住。如此三、四天，情况缓和了，我们便离开了这里，想办法再找一个居

住的地方。和我们同住在北园沃家庄的董临仪是东平县人，也是乡师毕业的，他在民众教育馆做事，他的同县张老太太（在南圩门内上新街甲三号住）是张若谷（上海救国会工作）的母亲，家中只有张老太太一人。董临仪找到她，对她说我是张若谷的朋友，救国会的人，张老太太也很开明，关心政治，就同意我住下。赵健民同志和北园老房东说他暂时不住了，到乡师同学处去了。我们离开了原住处，继续按计划进行工作。

二、大约是八月间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在济南的油印机关被警察破坏了。事情的经过是：章士劳小同志接受搞油印工作任务后，和徐宾同志共住一间房子，身份是来济南投考学校的学生。印刷机关规定白天不准刻印，防备警察查户口。这天下雨，章士劳同志以为警察不会来查户口，为了尽快地把《火线》印出来，就摆出蜡纸、钢板、油印机工作起来。突然，警察闯了进来，把北方局出版的《火线》和我们的地下刊物《山东团结》一并搜出，连同油印机等全部抄走。章士劳同志和徐宾同志也被逮捕了。徐宾同志急中生智，哄骗了敌人，被看守所押了二十几天，取保释放（现在空军工作）。章士劳同志直到七七事变后，经党营救出狱。为使各级领导同志能够及时看到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和刘少奇同志的文章，以便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进行工作，我们在济南乡师又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室，印刷工作迅速恢复了。

趁着躲避敌探搜索的机会，我和赵健民同志去肥城县了解情况。这个地方我们的同志多在民众教育馆系统内工

作。馆长是王西城同志。当时在民众教育馆做事的还有于一川、董临仪、马馥塘、徐宾等同志，他们大都是从乡村师范毕业后，考进民众教育馆的。党便利用这个机构对农民、工人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我们与王西城同志研究如何进一步通过民众教育馆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深入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和组织各界抗日救国团体等工作。过了几天我们就回济南了。

回济南后，我们着手分批建立鲁西北地区、鲁东地区、淄博矿区的地方组织。分别调刘宴春、鹿省三、张天民等同志到这些地区去工作。赵健民同志到鲁西南、济宁地区的金乡、单县关系点去检查和联系工作。

三、一个更大的不幸事件发生，赵健民同志被捕了。我记得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九月间，赵健民同志准备到鲁西南金乡、单县走一趟。大概是在下去之前，和济南一师支部的同志在街上接头时被捕的。我和他约定于九月二十日左右碰头，没有等到。后来是他从拘留所来信，我才知道他是在电灯公司西铜元局大街一带，被韩复榘的捕共队长、叛徒宋鸣时逮捕的。以后知道，是宋鸣时的爪牙、莱芜县的叛徒方春荣在街上认出他而被捕的。我们从各方面打听他被关押的地址，并计划营救。党通过武中奇同志（我住在他家里，那时他还不是党员）去找韩复榘的上尉副官任赞宇。此人原系西北军的一个旅长，失业后在韩复榘的部队里混饭吃，韩给他个上尉副官衔。他思想进步，赞成抗日。武中奇在西北军时和任有过来往，知道任赞宇在韩复榘的军法处看守所有熟人，所以就找任带他到看守

所，并把被子、钱和信送给赵健民同志。赵健民同志的被捕对省委工作影响很大，当时有些外地的部分关系他还没有交给我，由于他的被捕，这些关系又与省委失掉联系了。赵健民同志对保存山东党组织是有贡献的。在遭到几次大破坏之后，他能够在艰难困苦下战胜重重困难，把一些关系接上并有所发展，为党积蓄了不少的力量，成为恢复与发展山东党的有力基础。所以省委把营救他和其他在狱的同志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但一直到七七事变后，营救才逐渐有了效果。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在重建山东省委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遭受到如此重大的损失，使我很难过。检查这四个多月的工作，主观上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第一、对韩复榘的捕共队没有搜集更多的情报，特别是对捕共队长叛徒宋鸣时和他的爪牙没有进行足够的研究分析，也未充分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第二、对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情况未进行认真的检查。例如：姚仲明同志做全省救国会的工作，因为用真姓名、真地址订《救国报》，被敌人察觉而被捕，就是对秘密工作还不熟悉。在全福庄我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又没有严格检查和采取断然措施。第三、对秘密工作没有严格要求。例如，印刷机关与交通住在一起，是不符合秘密工作要求的。章士劳同志与徐宾同志租赁一屋，我与健民同志住在一起，虽然为当时因找房子困难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但这都不符合秘密工作的要求；加之又没有职业，得不到社会关系掩护，身份也不适应当时的环境，是很容易暴露的。根据存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

下述新的措施。

第一，党的秘密文件刻印工作，转移到比较稳妥的济南乡师支部，并决定由景晓村同志负责管理。第二，济南市的工作由林浩同志负责。第三，开辟社会关系，扩大交朋友的工作。我的房东张老太太由于其子张若谷的关系认识了何思源先生。何是韩复榘的教育厅长，盛传他和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派系有来往。于是，我又搬到正觉寺大街朝山街曹家巷武中奇家中去。武是我在张老太太家认识的，他有兄弟三人（大哥武迹沧、弟武思平），都很好客，爱交朋友，慷慨仗义，好路打不平，又有爱国主义思想，对蒋介石不抗日非常气愤。他们全家，包括其父母对我都很热情，提供了不少方便，帮助掩护过省委林浩、张霖之等同志。通过他们的关系，又结交了四、五位可靠的朋友：有在银行工作的孙揆一同志，有在省政府财政厅工作的小职员傅亚平同志（负责掩护林浩、张霖之同志）等。在这些有利的社会关系掩护下，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武中奇、武思平两同志都参加了泰安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武思平于一九三六年冬季由我介绍入党，后担任山东与延安党中央的交通。武迹沧在三八年到省委做联络工作，后在胶东遇害牺牲。后武中奇同志在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任团长，作战勇敢，又是扩军能手。（解放后在上海工作，曾受饶漱石诬陷关押几年，现已平反，是南京著名的书法家）。傅亚平同志在鲁西北聊城地区当了游击支队的司令员后，被派到北京做地下工作。上述事实说明，在秘密工作时，开展交朋友的工作是相当重要

的。通过这项工作，使一般同情我党的群众逐步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进而在政治上向我们靠拢或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说，与朋友来往的过程，就是将朋友关系转变为有觉悟的革命同志关系的过程。省委的同志在这些朋友的掩护下，开会、接头、出出进进，都没有出过问题。加上其他秘密工作的措施，不仅保证了这一时期省委的安全，而且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我们长时期内在敌人的眼皮下工作，来往自如，韩复榘的特务、爪牙东奔西窜，毫无所获。这项工作不仅是恢复与重建山东党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也是我党在白色恐怖下，能顺利地进行工作的一条宝贵的经验。

恢复与建立山东各地区党的组织

山东各地区的党组织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举行了几次暴动均未成功。由于韩复榘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出卖，党组织遭到很大损失和破坏。除了健民同志收集了一些关系和线索之外，其他都失去联系，所以各地区党的组织迅速恢复是困难的。我们只能发现一个关系，就联系一个关系。办法是：第一，动员学校支部党员回家找老党员关系，首先是发动济南乡师支部的同志。这个支部里有很多学生党员是来自山东许多县份的，如王文轩、朱春和是寿光县人，白学光是博兴人。我约他们个别谈话，要他们在假期内回家找老同志关系，并组织抗日救国会、小学教员救国会等。第二，就现有的地区关系建立地

区特委、工委、县委。这一工作从健民同志被捕前起，到一九三七年底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一直在进行着。当时恢复组织生活的原则是：1、凡是县区一级组织失掉关系的应查明情况，清楚的可批准恢复，如需加强或调整的，则就地选拔充实，事后报告省委。2、凡属于个人失掉关系的，查明原因，如在失掉关系过程中能坚持工作的，则立即恢复关系，没有工作可先参加抗日救国会，其他面目清楚者可恢复关系或重新介绍入党。3、过去是青年团员失掉关系的，如本人要求可介绍入党，以利于工作开展。

一、建立鲁西北地区特委。这个地区的基础是由冀鲁豫边区特委所领导的濮县、范县、莘县、朝城、临清等县和健民同志过去所接受和发展的寿张县八乡师、聊城三师的师生中的党员；冠县、阳谷、莘县、东阿等县，主要是小学教员中的党员。省委将冀鲁豫边区特委巡视员刘宴春同志调任鲁西北地区特委书记，徐运北同志为组织部长，莱芜县的刘盛玉同志为宣传部长（后为申云浦同志）。濮县、范县除有少数小学教员外，绝大多数为贫雇农成份，群众组织有穷人会、小学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等。

二、调整莱芜县委。记得健民同志曾反映一九三五年莱芜县委遭受破坏时，县委有个刘北戈叛变了，并且捕获了六、七个同志。县委书记刘盛玉怕刘北戈破坏区乡支部，经常在一些支部同志掩护下，十分困难地进行工作。我们研究了这种情况之后，认为莱芜党组织不安全，还潜伏着危险（这时不知道莱芜还有个叛徒方春荣，更不知道他也是在韩复榘捕共队的），所以决定把刘盛玉同志调到鲁西北

特委担任特委宣传部长，调济南的刘莱夫（刘家典）同志去担任县委书记。对支部的措施是：凡是刘北戈认识的都隐蔽起来，并改组了支部领导。这样莱芜县委以后没有遭到破坏。

三、建立鲁东特委。（最初是建立工委会，）派莱芜县的鹿省三同志前往铁路北寿光、潍县、昌邑、益都一带（称做鲁东地区）担任工委书记。济南乡师的王文轩同志回寿光县又找到一些关系，随后建立了寿光县委，陈少卿任书记，陈梅五任组织部长，陈耀三任宣传部长，还有王文轩、王登瀛等同志。潍县由张振一同志负责，昌邑由陆升勋、王义之负责，并都成立了县委。七七事变后，还找到了鲁东工委委员张文通、王义之，以后又增加杨涤生同志。这些同志在小清河与潍河之间的地区活动。

四、建立淄博矿区工委。首先由健民同志推荐平原县的张天民同志参加工委。张天民同志能吃苦耐劳，在煤矿当煤炭工人，与工人打成一片，深得工人群众的拥护。以后又派孙学之等也打进煤矿当工人，成立了淄博矿区工作委员会。

五、建立鲁北地区特委。一九三七年三月，河北省委将津南地区特委关系转到山东省委领导。这一地区包括津南、盐山县（党的老县区）、庆云、东光、宁津、南皮等县，加上鲁北乐陵中心县委管的乐陵、无棣、商河、惠民、阳信五个县委组成特委，派于文斌同志（河南人）为鲁北特委书记，组织部长为马振华，宣传部长为赵明新（赵杏村）。参加特委的还有邸玉栋和乐陵中心县委书记杠

步舟以及七七事变后派去的红军干部周凯东同志。后来特委改名为冀鲁边区工委会。一九三八年夏，肖华同志去后，改为冀鲁边区党委。这个地区党的工作是有基础的，掌握有四、五处的乡农学校（韩复榘和梁漱溟办的“寓兵于农”的学校）。

六、恢复胶东特委。胶东党组织关系在七七事变前一直没有找到。本来烟台县的吕志恒同志与北方局个别部门有联系，而且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时，还有个代表参加，好象是叫“水子”。当时因白区工作条件限制，没有打通关系，北方局也没有转这个关系。胶东在一九三五年因搞暴动又遭到破坏，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原名游健铎，河南太康县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被捕。七七事变后，林一山同志从北京回来，省委首先派他到胶东去，以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和山东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名义，通过抗日救国会找党的关系。经过很多曲折，终于接上了关系。随后，省委把被关押在山东监狱的同志营救出来，其中有胶东理琪同志。省委当即派他回胶东，很快与林一山同志汇合一起，恢复了胶东特委。在特委的努力下，相继恢复与建立县委的有文登、牟平、荣成、海阳、蓬莱、烟台、威海卫、黄县、招远等县。

七、再次调整莱芜县委的领导。派济南乡师的刘莱夫（莱芜人）回莱芜县负责县委工作后，发现叛徒刘北戈的间接关系也知道他，省委只好再物色人选。后调济南市中国银行仓库的莱芜人秦云川同志回莱芜担任工委书记。他回莱芜后，将支部逐个整顿，凡是叛徒刘北戈知道的立即

改变支部领导，并采取安全措施。莱芜县委的组织任务还有寻找新泰县的党组织关系。此外还派林浩同志去费县当短期教员，开辟费县工作；选拔景晓村同志为省委巡视员，到鲁东寿光联系工作；白学光（白子明）负责济南市委工作；董临仪到东平、长清检查工作。

恢复党的工作是千头万绪的。使我们感到困难的是：

（一）老同志骨干不是被迫外出，就是被捕关在监牢里。

（二）新骨干一时培养不了多少，在学校的一般未毕业，亦不能随便旷课或离校；毕业后还有家庭负担、职业的安排、父母之命的约束等问题。一般的职业就是当小学教员。当然小学教员是可以承担一些联系当地农民、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教师救国会、读书会并向群众进行宣传等工作的，但是尚需一定的脱产干部来跑工作。这是急也急不出来的。党的经费也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我们的同志经常典当衣物或向有条件的党员教员、亲戚朋友告借；有的时候告借无门。但是困难总是缚不住我们的手脚，革命事业总是要向前发展，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省委决定利用这一大好形势，把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当成第一位的任务，同时进一步抓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这时既要反对关门主义，也要反对冒险主义。这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方针。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而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当时最主要的具体工作是组织与扩大各种抗日救国会，如学生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

队、小学教员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实际上农民组织的救国会不多）、工人抗日救国会等。当时的组织原则是：可以随群众的自愿，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救国会名义，如抗敌自卫团、抗日救亡团、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等，只要组织起来就好，组织得越多越好。那时，这些为群众所乐于接受的组织形式，推动了群众救国力量的发展，对于发动和组织抗日游击队，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发动敌后抗日武装起义

一九三七年四月，北方局通知我去延安开会。我先到西安，经办事处安排到了延安，住在中央招待所。这时我才知道是党中央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许多著名的红军将领。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了我们。我和直南、冀鲁豫边区特委的代表们住在一起。在代表会议上，毛主席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当时发展阶段的特点，规定了党在新阶段的方针和任务，着重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责任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加强群众工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随后，我又参加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开会期间，我向中央组织部汇报了山东工作恢复的情况，并

要求将直南特委张霖之同志调山东省委工作。中央同意了，并指示山东省委：以后对外不要用省工委名义，就称为山东省委。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在我离开延安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回到山东之后，我首先把中央两个会议的精神、毛主席的报告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向省委同志作了传达，并进行了讨论。同时充实了省委机构，张霖之同志为省委组织部长，林浩同志为宣传部长，景晓村同志为省委秘书长，李均同志为秘书，武思平同志为山东与中央的交通。省委与地区之间的交通也作了调整充实。同时还决定由张霖之兼任国军工作部工作。

抗战开始后，战局急转直下，北平、天津很快失守。国民党军队或不战而逃，或一触即溃。国民党官员家属也纷纷乘车南逃。整个华北人心惶惶。平津流亡学生大批转入济南或南下到泰安。省委讨论了这一形势，决定立即掀起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韩复榘抗战到底。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北方局发出的“脱下蓝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省委还决定发动与组织抗日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作战；发展抗日救国民众团体，如民族解放先锋队、战地服务团、抗日动员委员会、抗敌自卫团、抗敌后援会等。主要工作情况是：

一、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对韩复榘军政系统的争取工作。当时韩的第三路军下辖五个师、一个手枪旅，号称十万大军，此外还有地方保安部队。每个专员公署的专员均兼保安司令。根据党中央

早在八一宣言中确定的只要对日抗战，不管过去与我们有任何旧仇宿怨及任何分歧，我们都愿意与他们亲密携手、共同抗战的精神，省委决定作争取韩复榘军政系统的工作。我们要求韩复榘对尚在监狱里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一切政治犯，根据国共两党协定立即予以无条件释放。当时我们对韩复榘的基本估计是：韩部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他想借抗战之名保存实力，所以并不积极抗战，对我党主张只是表面应付。七七事变后，他仍然禁止济南学生救国会、民先队等公开集会宣传抗日，逮捕救国会员。针对韩复榘的顽固态度，我们决定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中下级军政人员中。这时韩设立了政训处和政治训练班。政训处长是西北军的老参议人员余心清（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是个进步人士。当时中央联络部的张经武、张友渔同志向他介绍了北平一些左派教授，如张郁光、黄松龄等，去政训处与政训班讲课，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同时我们还把一部分平津流亡学生介绍到政训班学习，结业后在韩的各师、各区保安部队任政训员。我们原想用政训班学员打入韩复榘各师、旅、团去，以开展对第三路军系统的士兵工作和上层的统战工作，但因韩对各部政训员防范甚严，不让接触他们的士兵。这些同志后来有的退出来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

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最有成绩的是鲁西北，那里建立了地方政权和武装力量。山东第六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先生，是一位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的老人，他反对日寇侵略，拥护我党抗日主张。党派了一批同志去工作，

张郁光同志任第六专区总参议，张维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十支队司令员，姚迪红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齐燕铭同志为参议、报社总编辑。在党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郁光与姚迪红两同志一直协助范筑先将军在聊城守土抗战，后一齐以身殉国。山东省委把平津流亡同学中的许多骨干和党员、民先队员转移到聊城，或任县长，或任支队政治部主任。这样，不仅加强了鲁西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还培养了整个山东的后备干部。至于韩复榘方面，虽然有中央联络部派张经武同志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和他联系，但由于韩非常顽固，为抗日游击队要点子弹、装备，他也不答应。

二、营救狱中同志。

在青州（益都）、烟台、济南、济宁各个监狱里，关押的政治犯很多，但名字我们一点也没有掌握，赵健民、姚仲明、章士劳三同志还没有送到监狱里。我们首先请张经武同志与韩复榘交涉，要求韩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山东各地监狱、看守所、反省院里关押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政治犯一律无条件释放，越早越好，以利抗战。当时，我们没提名单（因为提不出名字来，怕漏掉反而不好）。经过党的努力营救，韩复榘迫于形势，只好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从九月开始到十月间，狱中同志都释放出来了。我们在泰安接待了大批同志。他们当中有张晔、李林、张北华、程照轩、夏辅仁、侯得才、魏思文、李仲林、刘特夫、董茨，还有胶东特委理琪和姚仲明同志等。赵健民同志出来时，我因到山西太原开会，没有见到他，他就和张霖之同

志回到鲁西去了。出狱后，有些同志直接回到家乡工作，在小清河、寿光一带的有王云生、王永周、李希晨、胡维鲁等同志；在胶东一带的有刘坦、王甫、宋澄、宋竹庭、刘中华、潘复生等同志。省委对来到泰安的同志给予热情接待，慰问，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央与国民党关于“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协议，讲了省委营救的经过、当时的抗战形势以及省委希望他们参加抗日游击战的发动工作等等。他们中除个别同志提出要求到延安去外，大都愿意留在本地参加工作，服从省委分配。省委特别高兴，因为这一批同志是党的骨干，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忠诚战士。他们的出狱，给恢复党的工作和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增加了一批生力军。

三、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具体布置。

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是一项神圣的任务。而在山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必须有几支乃至几十支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才有可能。

山东党本来是有基础的，但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影响之下，使一个有基础的党组织变得七零八落、残破不堪。以一九三三年山东省委或临时工委为例，它连续遭受破坏有三次之多；地区、县区因暴动和叛徒告密而被破坏的更不计其数，凡是有基础的县区，无一幸免。虽经过一年半的工作，也并没有完全恢复，发展也很不平衡，可见“左”倾冒险主义已把革命推到了失败的边缘。立三路线在北方的危害不过半年多时间，而王明“左”倾路线对党的危害在北方竟达四、五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更大。上述

情况，就是我们开始组织和发动抗日武装队伍这一工作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另外，省委几个同志又都没有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当日寇大举进攻、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有可能把一些失散飘流的共产党员重新集合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在山东（山区、平原以至湖泊地区）组织起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武装队伍来。因为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支柱，是山东人民的希望，也是山东党组织发展壮大的依托。在党中央号召下，我们遵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规定和山东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组织和发动抗日游击队的十条纲领。关于选择发动武装起义（或暴动）的时机问题，纲领指出：韩复榘军队开始撤退或溃散，而日寇尚未到达，或虽到达而立足未稳之时，是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过早发动有被韩复榘的三路军或其他地方保安部队镇压下去的可能；发动过迟，国民党地方武装与土匪队伍乘机而起，我们就会丧失有利时机。再者，及时发动起义，枪支弹药可向地主借，向“联庄会”借，用“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向乡农学校及一切有枪、有武器的单位借枪，甚至动员他们参加起义也是可以做到的；迟则易为国民党、土匪乘机抢去。当时我们感到最缺乏的是带兵打仗的干部，于是省委请求北方局和中央派一批红军干部和抗大学员到山东来。

一九三七年十月，省委再次讨论如何领导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首先分析了敌情，估计敌人会沿铁路线和主要公路线设立据点，分割我地区，还会组织汉奸队伍协同维

护。为了对付这一情况，省委决定分散掌握，派张霖之同志到聊城地区，通过范筑先的统战关系，以及我们派遣的许多平津转来的青年干部，组织各种名义的抗日游击队。并给张霖之同志以省委代表名义，以便领导鲁西及鲁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张霖之同志过去是将平津青年干部和民先队员转移到聊城地区的具体负责人，又是省委和冀南、冀鲁豫党组织经常进行联系的人。这样安排有利于省委对鲁西北、鲁西地区的领导。省委其他同志则留在津浦路东坚持游击战争。会后，张霖之和赵健民同志便去聊城地区执行这项任务。

关于发动、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具体布置如下：

(一) 鲁北地区即冀鲁边区。原先，鲁北特委成员赵明新同志汇报过鲁北乐陵中心县委情况及惠民、阳信一带的一些乡农学校等零星组织关系。后来河北省委将津南特委转交山东省委领导。这个地区有河北的盐山、庆云、宁津、东光、南皮；鲁北的乐陵中心县，无棣、商河、惠民、阳信等县，两区合并后，特委改名为冀鲁边区工委，肖华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夏天带部队去后，又改为冀鲁边区党委。七七事变后，曾调冀鲁边工委组织部长马振华同志来济南汇报并研究在该区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我们估计平津失守后，敌人可能首先向冀鲁边之盐山、庆云、新海（黄骅县）、沧县及津浦路沿线实行伪化，以保障天津及津浦铁路线的安全；这里也是我们首先要组织敌后抗日武装的第一个地区。因此，我们布置组织抗日救国第一军，派红军干部周凯东同志（原红军第五军团团级干部，宁都暴动过来

的)和陕北红军营级干部郭盛云同志前去担任军事指挥。参加领导的还有当地老同志刘子芳、李子英等同志。这一地区党员约有三百余人。

(二)鲁西北聊城地区。这个地区党的基础和平津流亡学生、党员、民先队员等的力量在山东都要数第一,约计有五百多名党员;又有很好的统战朋友——抗战老人范筑先将军,在他的左右又有大量得力的政治和军事助手。他的政治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因此,凭借这个优势可以组织很多抗日队伍。

我们认为,游击队在名义上可以多种多样,如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军或第二军,或打上范筑先保安部队的番号等,但必须保证党的领导。在聊城地区组织的第六专区第十支队,张维汉同志任支队司令员,实际上就是党的武装(以后改为筑先纵队)。随后又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游击队共三十几支队伍。这一工作由鲁西北特委刘宴春、徐运北及省委代表张霖之等同志负责组织,并且由张维汉、姚迪红、张郁光、袁仲贤等同志协助。

(三)胶东。九、十月间,原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出狱后,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派他回胶东担任原职,要求迅速恢复与健全胶东特委。在大力发展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番号序列是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军之上可组织军政委员会,由特委根据胶东情况决定人选。胶东地区党员约有近三百人。不久,北平学生张家洛同志(胶东掖县人,曾在东北军学兵队呆过。)到泰安来联系,省委随即派他回掖县与掖县同志一起发动武装

起义，成立胶东第三支队。这两支队伍组织领导人员有：理琪、林一山、宋澄、吕志恒、曹漫之、张修已等同志；崑崙山的于得水、于寄吾等同志；还有王甫、柳云光、刘坦、宋竹庭、刘仲华、倪弄畔、李耀文等同志；掖县的郑耀南、李佐长、张家洛、高松以及王台、王亮、黄再、于眉等同志。

(四)以泰安、莱芜、新泰、泗水、沂水为泰山区，又名鲁中区(即沂蒙区一部分)。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泰安徂徕山起义，番号第四军或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这几个县有党员约二百人，莱芜就有一百人。起义由省委机关黎玉、林浩、景晓村、李林、李均等和军事干部洪涛同志(红军一方面军第十二军罗炳辉军长所属小团团长)、赵杰同志(红军四方面军营级干部)组织领导。参加组织起义的干部还有泰安县委书记鲁宝琪、夏辅仁、朱玉干，鲁中区委的程照轩，泰安县委人民抗敌救国自卫团的马馥塘、周兰田、赵笃生、江海涛，以及封振武、冯平、封虞臣等，还有刚刚从敌人监狱出来的干部侯得才、魏思之、金明、卢冠舟(刘特夫)、周明等。参加起义的骨干有武中奇、武思平；平津转来的党员与民先队员孙陶林、李焕、李萍、孟英、李伯秋、徐仑、胡寅；济南学生刘春、王若杰、孙朝佐(即孙正)、燕遇明、郭济民；平津来的女同志杨纯、赵新、何浩、唐克；山东的大学生及中学生汪瑜、傅生、夏玉英、韩豁等同志。在新泰活动的有县委董炎、李梅庆、王宪廷、单洪、刘少悦、王学吾、王德一等同志，还有董超、周星夫、朱国平、郑文清同志和医生张一民等同志。

担任联络巡视员的是孙汉卿同志(从北平回鲁的大学生), 济南乡师党员刘少悦也担任县委并负责与省委的联络工作。在莱芜县, 有北方局介绍来的北大学生党员刘居英同志担任特派员, 协助县里组织游击队, 这里的党员开始活跃起来。莱芜工委书记秦云川, 老同志黄仲华、刘子正、刘夏峰、周绍南、王其人等同志, 还有社会关系比较多的民先队员方象岑同志, 也都参与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工作。省委又派红军营级干部程绪润同志给予协助。在沂水县, 派李仲林同志前去组织县委, 刚出狱的邵德孚同志和失掉关系的党员干部李道德、李怀德、王汉卿、秦昆、李清和等同志参加了抗日武装起义工作。

(五)在胶济线路北。以长山中学为依托, 省委派姚仲明带廖容标(中央苏区一方面军团级干部)、赵明新同志等前去组织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同志原为林一山介绍的民先队员, 以前是国民党员, 是有爱国热情的有志之士; 此外, 马耀南同志的两个兄弟(均在抗战初期牺牲)和从济南一师回去的救国会员、民先队员如孙铁民等, 都参加了组织发动游击队的工作。临淄一带有从监狱出来的李希晨同志和李人风、李清桂同志、博兴县有张文弢、马巨涛、陈竹村、相炜、蔡思茂、高苑有、孙凤坦等同志都组织了游击队, 后来参加了三支队。

(六)泰西、肥城、大峰山地区。派张恩堂(即张北华)同志带程重远同志(济南高中党员)、倪冠英同志(泰安县党员), 和以前派到夏张镇的远静仓同志(刚从敌人监狱中出来, 北京师大毕业生, 在山东第四师范当语文教员时被

捕的)前去,和当地几个小学教员如崔子明等同志,以泰安人民抗敌自卫团为基础,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原计划这支部队属于四支队的一个部分,后来因为泰安大峰山和东平、长清、肥城、郓城一带是个战略要地,所以又单独成立一个支队,即以后的第六支队。随后又派刘海涛(东北义勇军的军事干部)、段君毅、李冠元等同志前去工作。当地有万里、万晓塘等同志,党员共有四十多人。

(七)原计划在昌(邑)潍(县)地区组织一支武装,番号是救国军第七军或第七支队;在寿光、广饶、博兴一带发动组织第八军或第八支队。省委和鹿省三同志商定:这支武装如纪律好,就打出山东八路军的旗号,如不好,就叫抗日救国军,以免影响八路军的声誉。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红军干部韩明柱同志(四方面军团级干部)由省委交通带到省委机关,于是派他到寿光工作。在昌潍方面活动的有王义之、陆升勋、张振一、李福泽、薛少庚、何凤池、李怀章等同志;在寿光方面活动的有工委会委员张文通、杨涤生和县委陈少卿、陈耀三、陈梅五、王登瀛、王文轩、朱春和等;此外还有从韩复榘监狱释放出来的王云生、王永周等和马保三、张子明、赵修德、王少白、孙聿修、马健生等同志。在广饶的有王日津同志。鲁东地区党员约有二百余人。

(八)在鲁西南地区济宁、菏泽、微山湖一带的金乡、单县、丰沛、肖碭有一点组织,以前没有成立起地区特委。七七事变后,派济南市委书记白子明(即白学光)同志和孙衷文、江明同志前去担任特委书记和宣传部长,也

布置了组织一支抗日起义队伍的任务。他们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郭子化同志打通了关系，利用第五战区的合法名义，打出第五战区抗日义勇队旗帜。一九三八年派去红军干部李发同志（鄂豫皖边区红军干部）前去工作后，改为挺进支队（后拨给一一五师）。此地党员约有一百余人。

（九）对于薄弱地区，也派了一些同志去开展工作。莒县派郭有邻同志回乡组织县委，在莒县珍珠山发动组织抗日游击队；邹县派的是冯起同志，王见欣同志到滕县、邹县去联系，传达省委意见。当时滕县保安队及李乐平同志与省委有关系。王见欣、李乐平在鄆固一带也发动组织了抗日部队，王见欣同志又和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打通了关系。在莒县还有谢辉发动的一个大队和张岗、汪洋、崔介、赵昭等同志的队伍合在一起，这个大队参加了四支队。安邱县有老党员崔杰千、孙季武同志发展了徐欣三、潘墨卿等，组成县委，并以抗日救国团为基础组织发动武装斗争，成立了独立营。

（十）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我虽与郭子化同志在延安见过面，认识了，但这个地区还没有划归山东省委领导，所以不便谈论工作情况，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鲁南枣庄开展工作。我们在枣庄除有北方局派的关系宋子成同志尚未接头外，没有别的关系。郭子化同志在枣庄工作了几年，很有成绩，并且在丰沛、肖碭、永县、徐州、邳县一带都分别建立了县委。李宗仁在徐州当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他经过长江局关系进行了统战工作，以当地士绅、名流名义参加了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

利用合法地位进行了许多抗日动员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有张光中、郭致远、郭影秋、李绍九、王文斌、万众一、朱道南、张福林(工人领袖)、于化琪、童陆生、褚雅青、杨士法、王永福、刘剑、李微冬、邱焕文、李乐平、王见欣、董尧卿、董一博等同志。

总之，上述安排布置都成功了。各地武装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成长壮大起来。从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而言，山东的重点是山区湖泊，但遍及东西南北中都有一支或几支武装部队在活动。这些抗日游击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千锤百炼、南征北战，终于发展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敌人是残暴的，战争是无情的。加上地方同志又缺少军事经验，以致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山东战场上，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贡献出他们的宝贵生命。他们当中有胶东特委书记兼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理琪同志；鲁东工委书记兼第八支队、第七支队政委鹿省三同志（原名鲁效增，山东莱芜县人，九一八事变后，曾支援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带头卧轨，是当时济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被托匪张宏礼、金岩刺死）；七、八支队联合政治部主任王翼之同志；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同志；冀鲁工委书记于文斌同志（河南人）、组织部长兼冀鲁边区抗日救国会长马振华同志；七、八支队联合指挥司令部副指挥韩明桂同志（红军干部）；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政治部主任远静仓同志；鲁南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政治部主任何一萍同志等。正是这些先烈们的流血牺牲和共

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换来了山东人民的新生。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3 0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